文物参考资料

一九五七年　第四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目　录

一九五七年第四期（总第八〇号）

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發現
——陝西郿县發掘出四件周代銅器……李长庆　田　野（5）
弥足珍貴的天宝遺物
——西安市郊發現楊国忠进貢銀鋌……李問渠（11）
几年来的內蒙古文物工作……內蒙古文物工作組（12）
內蒙古革命文物的調查与收集……張　郁（18）
伊盟薩拉烏苏河考古調查簡报……汪宇平（22）
清水河县和郡王旗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李逸友（26）
內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李逸友（29）
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內蒙古文物工作組（33）
西藏的佛教艺术……刘艺斯（37）
記劍川石窟……宋伯胤（46）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清理初記……陈丽琼　馬德嫻（57）
广西明江左江两岸的古代岩壁画……黃增庆（59）
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認識……吳澤霖（63）
再論"保存什么，如何保存"……陈明达（66）
八年来安徽地区的革命文物征集概况……李　嘉（71）
征集鄂南大幕山区革命文物总結簡报……湖北省博物館革命文物征集小組（74）
积極准备条件为加強博物館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奋斗……黑龙江省博物館（76）
記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館（續）……李文信（79）
如此保护文物……黃家忠（32）
上海博物館举办"从廢銅中搶救文物展覽"……徐孝穆（45）
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奬品怎样征集和处理的意見……卢少忱（62）
文物工作报导（十三則）……（82）
讀者·作者·編者　要采取积極措施消灭破坏文物事件
兰亭八柱有了下落

封面：內蒙古自治区蒙族妇女头带

插頁：內蒙古自治区蒙族、达斡尔族、鄂倫春等族的服飾和用具（三色銅版）

內蒙古錫盟中年妇女服裝

內蒙古蒙族男子用的刀、火鐮、錢褡子、靴子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內蒙古呼盟達斡尔族人制的樺木盒子

內蒙古呼盟鄂倫春人用的針線袋、皮帽子、皮手套、靴子

上
舍
没
文
家
的
未

米
組
文
国

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發現

——陝西郿县發掘出四件周代銅器——

李长庆　田　野

陝西郿县李村的李焜同志在一月十七日給陝西省博物館送来三件青銅器，两件是彝，一件是牺尊，上面都有很重要的銘文。陝西省博物館于次日即派人前往了解，并带回一件尊和三件陶鬲。据李村李含章同志說，这是他哥哥在一九五五年三月挖苜蓿时發現的，出土后取回放在楼上，一直沒有动，也沒有給人知道，后来他侄兒李焜說："古物应該交給政府"，这才把它送来博物館。为了表揚这种保护文物的精神，政府特給予了奖励。在二月十九日又去勘察了一次，銅器出土地点在县城东二里許的李家村北的牛塬上。这里是一处古代人类居住的遺址区，从断崖上的一些灰層灰坑中撿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殘石器小塊、周代的陶片和秦汉时期的磚瓦陶片。銅器即出土于周秦遺址附近，經探掘后，未發現墓葬痕迹。遺址情况極复杂，面积很大，短期还不能勘察清楚。

四件銅器的体积都不大。方彝两个，一个高18厘米，蓋和器都有銘文，腹隔为二室；一个高22.8厘米，蓋和器也都有銘文。这两器形制全同，唯有大小之差。方足尊口內有銘文。这三件器物可能为一組，其上均鑄有精細的花紋。牺尊像一只騾子，胸前有銘文，背上有一兽系蓋可以啓閉，蓋上也有銘文，另有一蓋出于腹內，銘文相同。牺身两旁有旋斡的花紋，头頸部分还鑄出鬣毛。这批銅器实为我国历年出土文物中一批少有的珍品，从銘文中初步鑑定它是西周时代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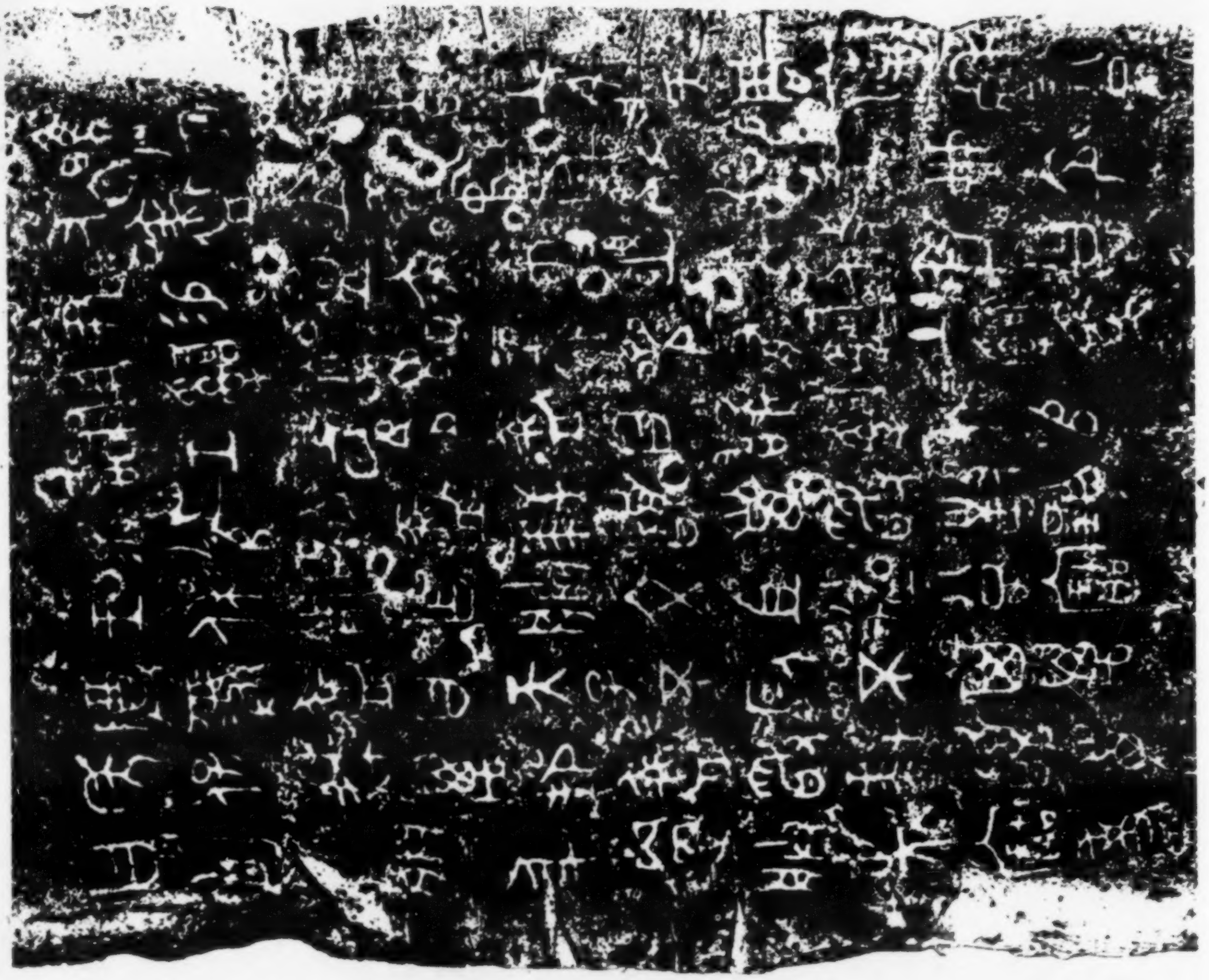
牺尊　通耳高 32.4 、通尾长 34 厘米

牺尊胸前銘文拓本

牺尊腹内取出器盖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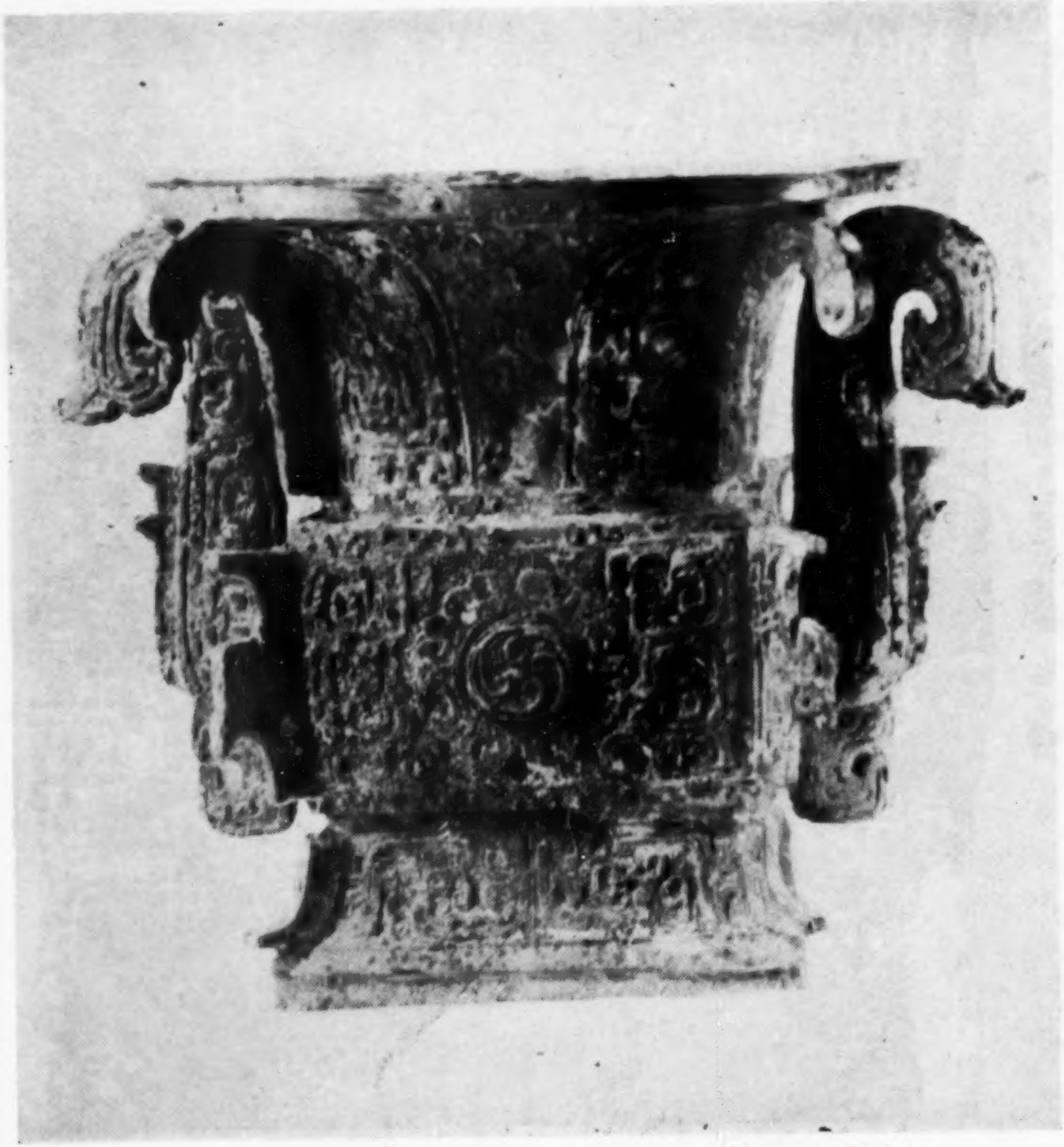
牺尊原盖銘文拓本

方彝　通高 22.8、口徑 11、口横 14.4、足徑 13.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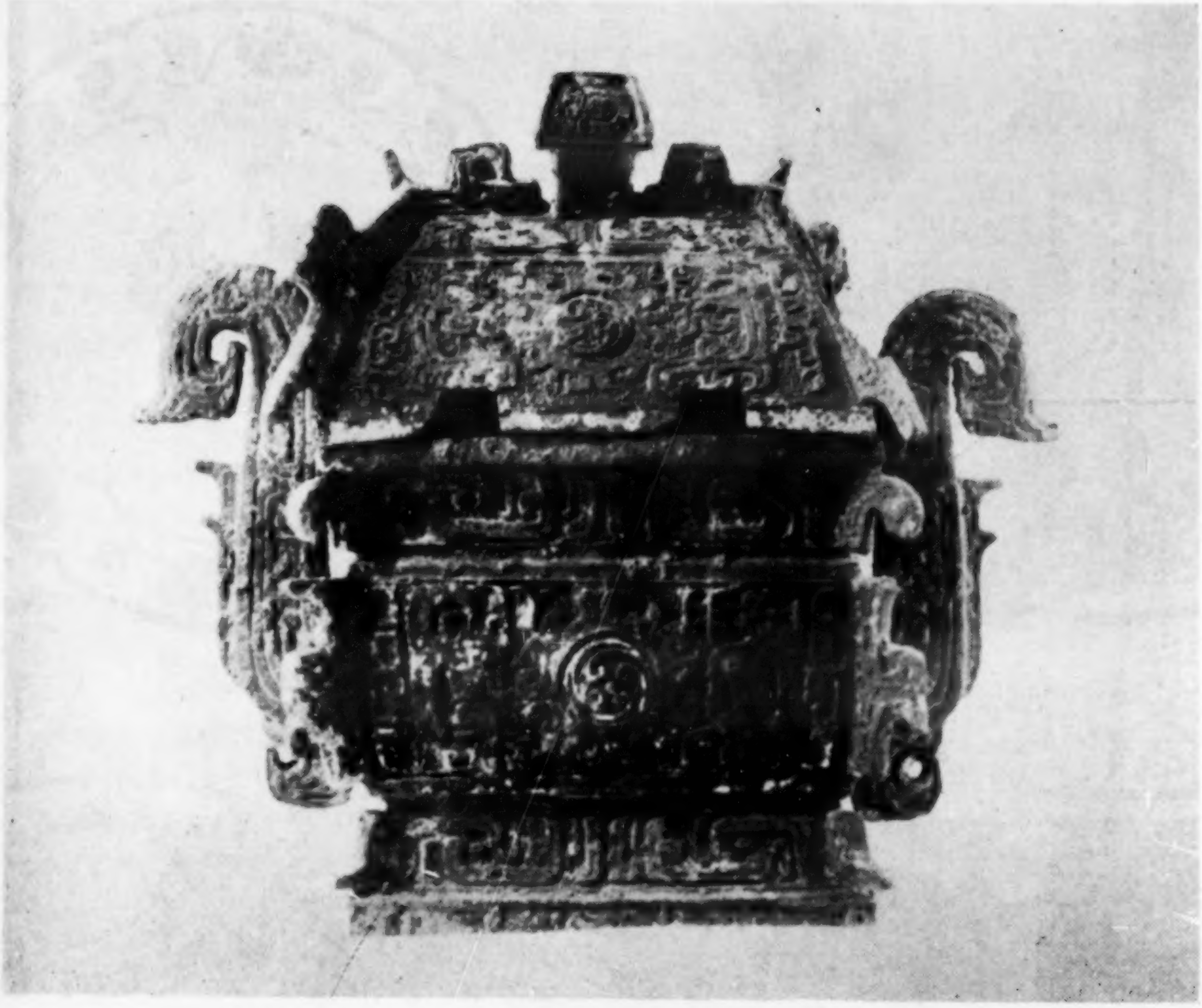
方彝器内底銘文拓本

方彝蓋内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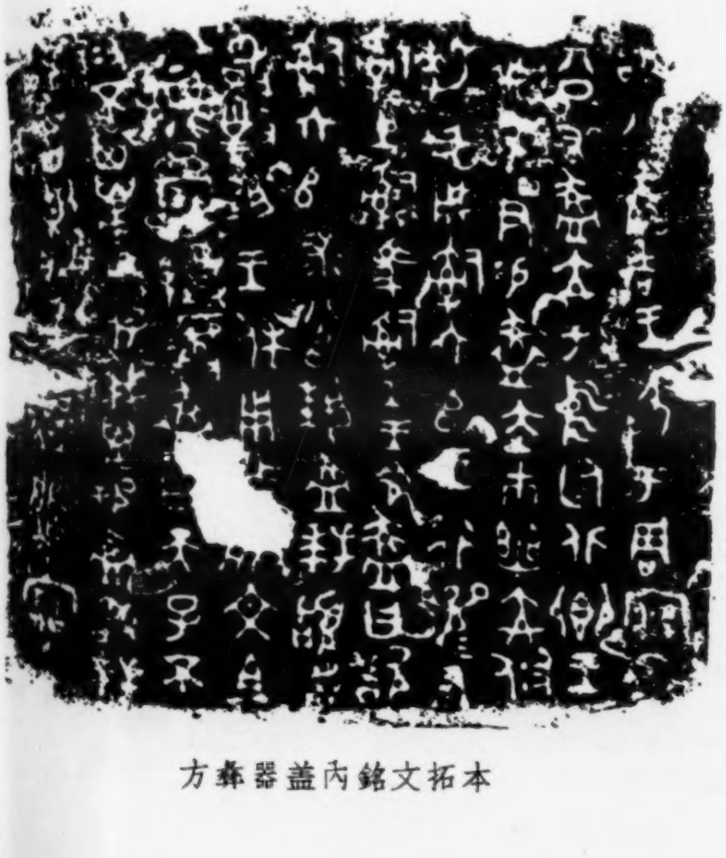


方彝　高 17.4、口徑 17、足寬 11.1 厘米

方彝器內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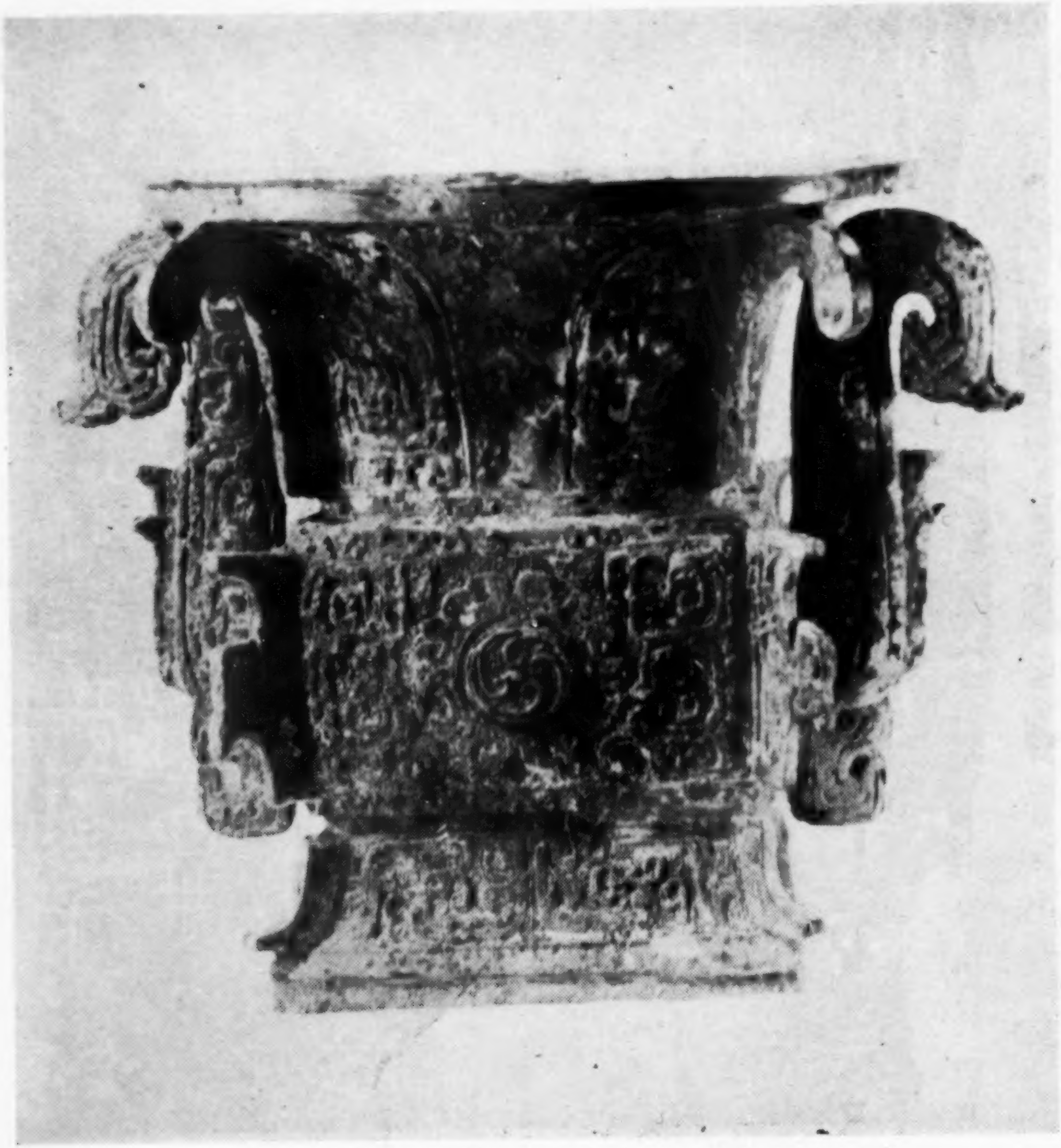


方彝　通高 18、口徑 8.4、口横 11.6、足徑 10.8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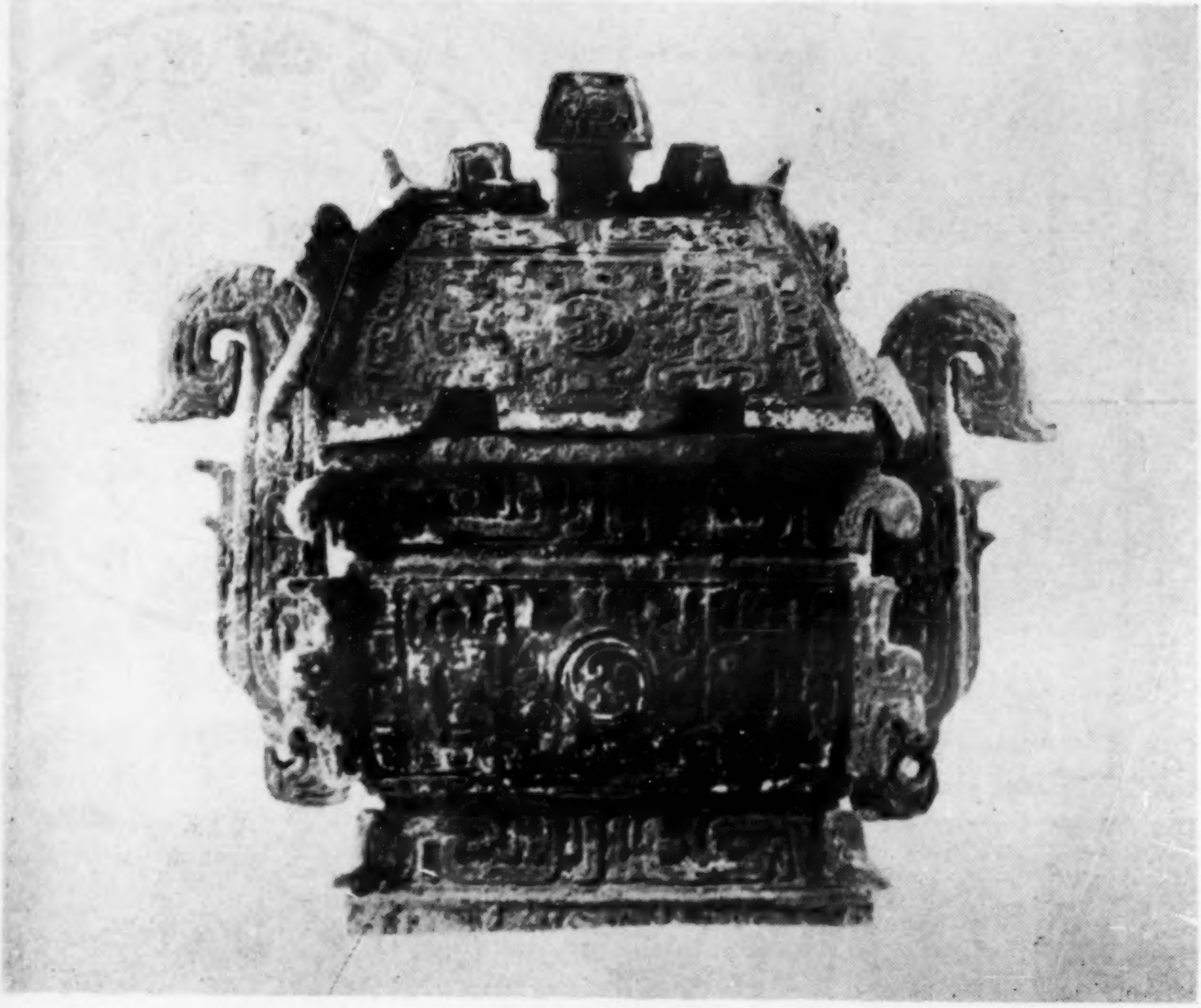
方彝器蓋內銘文拓本

方彝器內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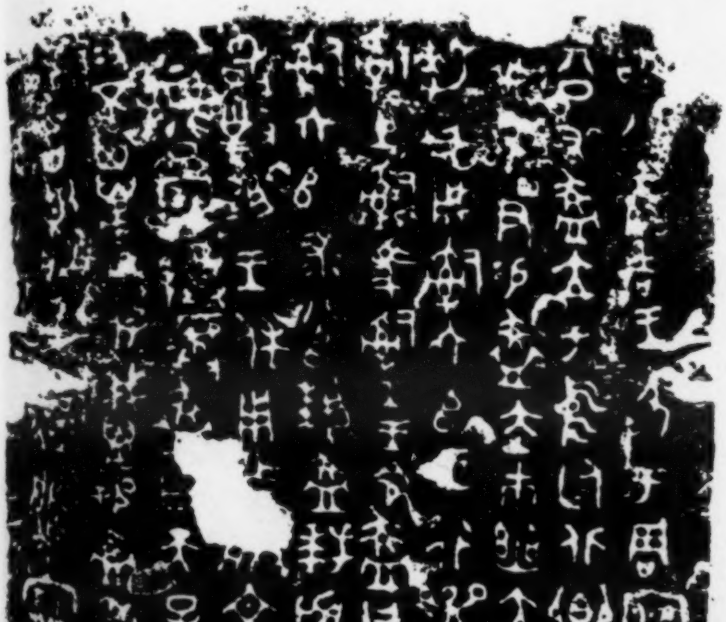


方尊　高 17.4、口徑 17、足寬 11.1 厘米

方尊器內銘文拓本



方彝　通高 18、口徑 8.4、口横 11.6、足徑 10.8 厘米



方彝器蓋內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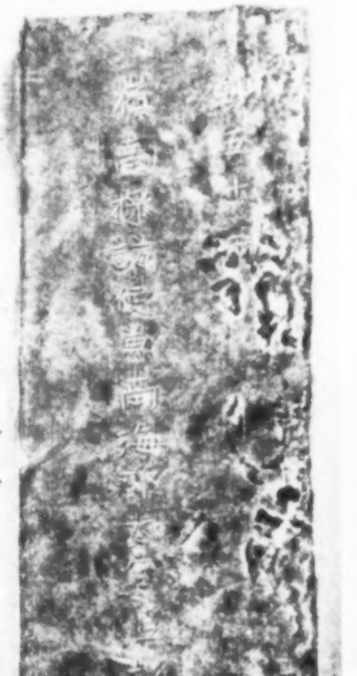
方彝器內銘文拓本

西安市郊發現的銀盘

銀盘花紋拓本

西安市郊發現的銀鋌之一(正面)

同左(背面)



銀鋌之二

弥足珍貴的天宝遺物

——西安市郊發現楊国忠进貢銀鋌——

李問渠

1957年1月2日，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会郑自毅同志去东北郊第一磚瓦厂檢查保护文物情况，和該厂李生桂同志接談，得知1956年12月30日上午，該厂工人寇新奎取土时在地下1公尺深处，發現一个小銀盘复在大銀盘上，另有四塊銀鋌叠在一起。郑同志当即前往發現地点重作勘查，确已再無别物。該厂于1月3日将这些文物送交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会。这些文物是：

1.唐代鍍金花紋銀質大盘一个，直徑市尺1尺2分，形如花朵，中心突起大獅子一只，四周有不同形式的花紋，盘底三足脫落（銅鑄卷叶式），現存二个，高市尺2寸，盘重市秤37两6錢。又小銀盘一个，無花紋，已压扁不能复原。

2.銀鋌：第一鋌長市尺9寸6分，寬2寸1分5厘，重市秤六十七两二錢，正面中間刻字一行"专知諸道鑄錢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楊国忠进"，背面字三行，第一行"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郡諸軍事檢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巖"，第二行"信安郡专知山官丞議郎行录事参軍智庭上"，第三行"天宝十載正月日稅山銀一鋌五十两正"。第二鋌，长市尺1尺1分，寬2寸2分5厘，重市秤六十七两七錢，正面中刻字一行"专知諸道鑄錢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楊国忠进"，背面字三行，第一行"宣城郡和市銀壹鋌五拾两"，第二行"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諸軍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第三行"天宝十載四月二十九日"。这两塊銀鋌的厚度約一分許，由于中厚边薄不能量准。第三鋌，长市尺7寸6分，寬2寸1分，重市秤六十二两四錢，正面中間刻字一行"岭南采訪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右上角有"銀五十两"四字，背面無字。第四鋌，长市尺7寸4分，寬1寸7分5厘，重市秤六十五两，背面無字，正面字也模糊不清，詳細辨認，第一行为"郎宁郡都督府天宝二年貢銀壹鋌重伍拾两朝議郎权怀澤郡"，第二行"太守权判太守兼管諸軍事上柱国何如璞专知官"，第三行"戶曹参軍陈如玉、陈光远□□仙"（注）。这两塊銀鋌的厚度为市尺3分5厘，中边一样。这些有官职姓名的銀鋌，是統治者剝削劳动人民血汗的証据。流傳到今天的已不多見了。銀鋌上的人名，楊国忠見新唐書外戚傳，其余的职銜都是中上層官吏。

銀鋌之三（拓本，正面）　同上（背面）

这些銀鋌上有进、上、貢等字，或即当时进奉貢献之物。

这批文物出土地点，在西安市东北郊八府庄东北附近，其地适当唐大明宮东內苑遺址之內。鍍金大銀盘和大塊銀鋌，也不是平民能有之物，因此可能是安史乱时，宮人倉皇出走临时埋藏下来的。千余年后，又被我們發現了出来，归还到人民手里，可算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銀鋌的形式像笏，可証一笏就是五十两之意。十、拾、伍、五、和、合等字，在唐时已相互使用。唐时京城的五十两，折合今市秤六十七两。楊国忠进的两鋌，重量相同，其他两鋌，南海郡的重量为今市秤六十二两四錢，郎宁郡的重量为今市秤六十五两，証明唐时衡制尚未統一。唐天宝三年改"載"，銀鋌上有天宝二年、天宝十載之分，皆与史合。稅山和专知山官，是何种稅何种官，尚未查出，但可証明天宝間捐稅的繁重了。我們将这些遺物的摄影、拓片报导出，作为专家研究的資料。

注　銀鋌上的地名：信安郡，屬淮南道，隶东道采訪使；宣城郡，屬江南道；南海郡，屬岭南道，岭南采訪使治广州；郎宁郡，屬岭南道；怀澤郡，屬岭南道。（节新唐書地理志）

几年来的內蒙古文物工作

內蒙古文物工作組

1957年5月1日是內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紀念日，就內蒙古人民甚至全国人民說，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胜利，象征着中国各民族团結友爱大家庭的巩固与發展。十年来內蒙地区各項建設事業所得的成就，是空前巨大的。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之一部的文物工作，虽然只在近几年間才逐漸展开，但在各級党政的重視和支持之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回想解放以前內蒙广大地区之內文物工作的落后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內蒙境內盗窃活动的猖狂，就会認識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之下，內蒙地区的文物工作才能發揮它所具有的积極作用，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才能建立起今后的發展基础。现在把內蒙古境內的文物工作和几年来的發展情况，摘要介紹于后。

一、历史文物

內蒙地区的历史文物，有它的特点。现在先把古代历史文物工作几年来的情况，說明如下。

1. 旧石器时代文化　1956年4月和10月內蒙文化局两次派遣文物工作組人員前往伊克昭盟烏审旗的薩拉烏苏河进行調查，在大沟灣村以及滴哨沟灣村發現旧石器、人骨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充实了过去我們对于所謂“河套文化”的有限資料；也提供了今后薩拉烏苏河地带进行大規模調查發掘的許多綫索。

2. 细石器文化　全区各地都有細石器文化遺物。几年以来我們調查过的地方，主要的，在呼倫貝尔盟內計有：海拉尔市的西山崗、扎賚諾尔矿区的北沟和南沟、呼倫池东北方木德吱牙河北岸和东新巴旗的阿木古郎鎮。所得的石器，以海拉尔市西山崗出土的比較精致而典型。在扎賚諾尔矿区这个据說出土过中石器时代文物的地方，在几次調查中，只在地表砂砾層里得到过細石器，它与陶片共存，从来没得到可以叫做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任何資料。

大代太和八年鎏金銅佛

哲里木盟境內，只在庫倫旗得到一件磨光石斧，很精美。出土細石器文物資料最多的地方，是昭烏达盟。这地方的西喇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畜牧和狩猎，是細石器文化很發达的地方。所調查的遺址計有：赤峰县紅山、三眼井；林西县西山坡、鍋撑子山、櫻桃沟；巴林右旗的益司毛刀；克什克騰旗的瓦盆窑、富順永和土城子；宁城县西方的門面山、头道营子和喇嘛洞山；喀拉沁旗的公部府和楼子店等地。

昭盟境內的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器物非常丰富。小型的石器有石鏃、石叶、刮削器、石核和石杵等等；而赤峰紅山遺址出土的石鏃很精美。大型的石器以經棚街瓦盆窑村出土較多，計有石磨盘、石鎬、石鋤、石鍬、石斧等等，磨光者少，打制者多，而且大半在刃部有显著的使用痕迹。所得的陶器有陶瓮、陶碗和陶鬲殘片等。还在經棚街北山崗和土城子等地得到过彩陶片。至于阿魯克尔沁旗德博勒庙出土的大型石犁，和巴林右旗益司毛刀出土的中型石犁，都說明了当时当地农業耕作的發展情况。

在西部，当配合集二鉄路修筑进行文物調查时，仅在二連南方約50公里的仇奴姑庙，得到磨光石斧一件，很可宝貴。在包头市东門外轉龙藏發現遺址一处，經試掘，得到文物計有石鏃、石核、石磨盘、有孔石刀、石斧、石砌和石鏟；还得到一些骨針、骨錐和骨鏟。另得到很多陶片，經修复的，有鑑料陶鉢数件。遺址灰坑內出土許多猪、羊、馬等家畜骨骼：土默特旗的哈拉沁，也有細石器文化遺址。在清水河县的棋子峁和郡王旗的尔吉拉曼沟的遺址里，都得到許多細石器和花紋簡单的彩陶片。可見不仅在东部，而且在西部也有細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

悉尼喇嘛像

另在伊克昭盟的西部和南部，都發現过少数細石器，可見內蒙古各地一般都有細石器文化遺存。即当細石器文化时期，內蒙許多地方都有人类生存。他們生活在河边或湖畔的台地上，用各种各样的石制工具，从事农耕、畜牧和狩猎；会制造陶器，并且在陶器上面刻划美丽的花紋，在数千年后，讓我們对于他們那种辛勤創造的精神，还不胜贊嘆。

3.战国时期　当战国时期，內蒙区的經济文化生活，由于与汉文化發生了密切的关系，而更加發达了。当时在东部区有燕国，在西部区有赵国，分別在內蒙区內建筑长城。現在，东部区和西部区都有汉前长城遺址。我們曾在东部区的赤峰一带，得到明刀和陶鬲；在伊盟郡王旗的枣兒核沟得到陶鬲、銅鏃、繩紋鬲足、陶瓮棺以及云紋黑色压光大陶罐等物，它們都可說是战国时期的遺物。另外，托县的古城村，也有战国时期文化遺物。

4.鄂尔多斯文化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內蒙区各地散布的鄂尔多斯文化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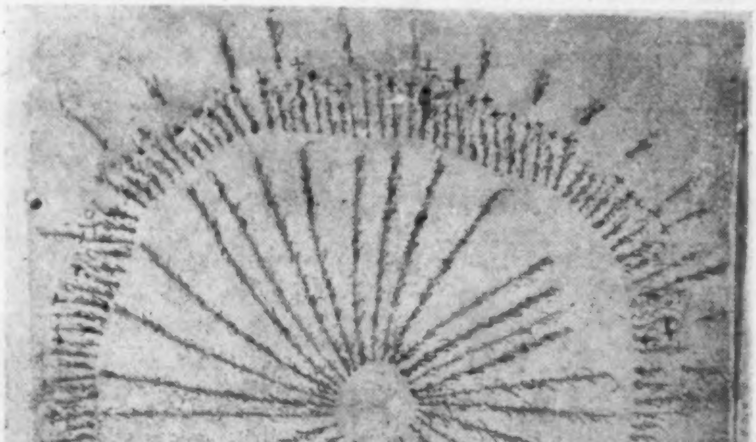
在几年的工作中調查到的重要地区只有察右后旗二兰虎沟一处。在那里征集到的器物，主要是双耳銅罐、鳥兽形花紋的銅飾片、銅鏡、褐色陶罐和籃紋陶罐等物。这个墓群，規模很大，足以和辽宁省西丰县出土斯基泰文物資料的墓群相比美。可惜的是这个墓群早就破坏很重，应該考虑清理。

5.汉　代　在东部区出土汉代文物資料的地方，照理应有一些，但我們所了解到的并不多。在林西县的西山坡得到过印紋大瓦殘片，是汉代遺物。在喀拉沁旗暖水村北一公里，有古城一处，城址不大，地面上有很多汉式繩紋陶片。在西部区，有許多汉代古城和遺址。它們有些分布在包兰路沿綫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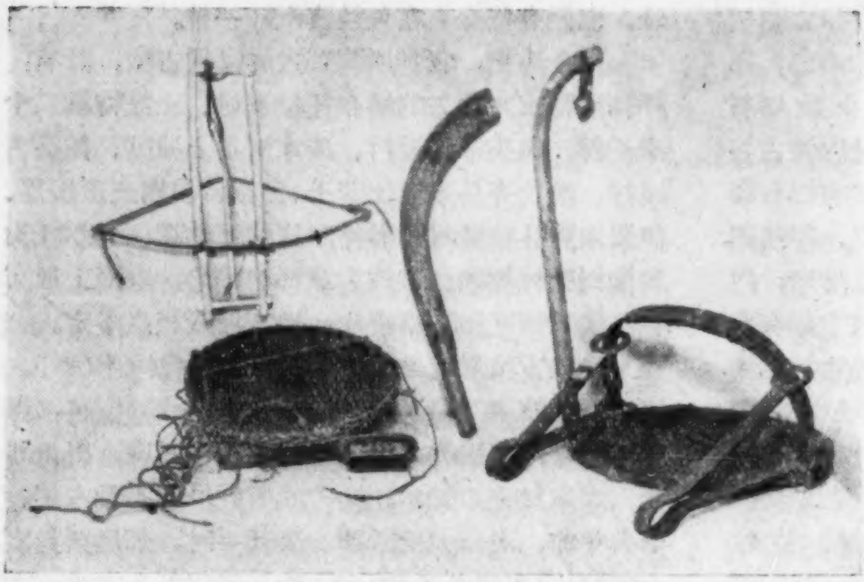
至今为止，我們所調查过的汉代古城，計有：呼和浩特市东北方的塔布托拉亥村、土默特旗二十家子村、包头市麻池村、清水河县上城灣、托县古城村、沙拉齐县东老仗营子、烏拉特前旗三頂帳篷、伊盟东胜县城梁村、准格尔旗的那林鎮、瓦尔吐沟和榆树壕村等地。这些古城都有城墙，地面上散布着汉代的磚瓦和陶器殘片，地下埋藏相当丰富。

这些古城附近，都有汉墓，但早已大半破坏。伊盟达拉特旗的白泥井区，有許多汉代磚室墓，保存相当好，可惜的是近年来破坏了十三座，出土器物，大半散失。瓦尔吐沟古城附近，有大量古墓。十多年前，出土大批銅器，轟动一时。那里据說出土过"左賢王第八子"銅壶一件，落到外人之手。在1956年秋季調查时，曾得到銅鼎、銅甑、銅勺、銅印、銅鈴、銅簪、銅壶、鉄劍等物，很有特点。至于陶罐，更是常有出土，当地五十多戶人家中，几乎每戶都有十多件。这座古城，大半冲毁，可能是西汉时代遺物。包头市以西汉代古墓出土的銅器，有銅刷、銅灯、銅博山爐等；陶器常是陶俑、陶屋、耳杯、陶罐、奩、井、灶、盆、勺、盘和鸡、鴨、猪等模型。还有"单于天降"大瓦。1956年夏季，托县古城村汉代"閔氏墓"發現了九幅壁画，画上描繪了汉代地主阶級的生活情况。

汉代文物的大量發現，尤其它与鄂尔多斯文化的混合，說明了早在两千年前，內蒙区已成为民族杂居地区，多民族間，已經有了文化艺术的交流。



参加"独桂龙"运动的签名文件



（自左至右） 打黃鼠狼夹子　打魚簍子
打兎拐棒　打狼夹子

6.北 魏　北魏起初是在內蒙区和林格尔县境內建邦。我們曾在和林格尔县城北方的土城子調查到大規模古城一处，是否是北魏的早期都城，因資料不足，难作定論。曾在武川县烏兰布浪等地，發現北魏式“万岁富貴”瓦当。在土默特旗美岱村一座被破坏的古墓內有虎符、銅釜和金戒等物。还由供銷社的廢銅堆里搶救出来北魏“大代太和八年”銅佛一座，1956年夏季出土于托县古城村。

7.唐 代　唐代文物內蒙区出土不多。伊盟南部烏审旗巴兎灣村的白城子古城，很像是唐代遺物。和林格尔县城北的古城，也有唐代遺物。另在昭盟阿魯克尔沁旗白晋花区的烏兰斯木村發現“大唐营州督都許公德政之碑”碑首一塊，上刻龙紋，但还沒發現碑身。

8.辽 代　內蒙古东部区昭盟的西喇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是契丹族人長期生息的地方。他們在公元907—1125年間，建立了国家。契丹人本是游牧部族，他們的統治者重視农耕和工艺，常用汉人为他們耕作、生产，所以当时的农業工業也頗为發展。

至今为止，我們所調查过的辽代古城，在巴林左旗計有林东街的辽代上京临潢府城、四方城、石房子村祖州城；巴林右旗的崗崗庙村怀州城、白塔子村庆州城；林西县城南的小城子、樱桃沟村大城子；宁城县辽代中京大名城；呼和浩特市的白塔村丰州城以及土默特旗的五十家子古城等等。

这些古城都有城墙遺迹。其中，巴林左旗的祖州城，業經日本侵略者破坏。其他如辽代上京、中京和庆州古城，都曾在近年挖渠时發現重要文物資料，保护問題，很是迫切。

契丹人崇尚佛教，当时各大城鎮和山林胜境，都有寺院或石窟寺。內蒙区所遺留的寺院遺迹計有：巴林左旗的洞山、后召、上京城內石佛、前召、南塔和北塔；巴林右旗的白塔子；喀拉沁旗的塔子沟；宁城县大名城的大塔和小塔；阿魯克尔沁旗石人沟的石佛；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白塔以及土默特旗蟠龙山的殘塔等等。

辽代寺院遺迹，至今共調查了十多处。其中，就石窟寺来說，后召內部的遺迹比較丰富而精致，那里的佛涅槃像和金剛力士像很有名。就塔来說，白塔子的白塔、大名城的大塔和呼和浩特市的白塔，都很堅固精致，給人以崇高、純朴和庄严之感，为內蒙区有名的辽代建筑物。

辽代遺址遍布內蒙区各地，而昭盟境內更多。昭盟各旗县的农村中，大半都有“老房身”或者“高丽房身”，那里常有房屋建筑遺址、綠釉牛腿瓶、銅鏡、瓷器或陶器、鉄器之类發現，若能加以發掘，对了解辽代农家生活必定大有帮助。近年在林东街北山坡發現的辽代遺址，比較特殊。它是辽代牧民所住帳幕的遺址，在生活类型上很有特点。在土默特旗的陶卜乞附近，也有几处辽代遺址。

关于辽代墓葬，几年来了解到一些情况，在陵墓方面計有：巴林左旗石房子村水泉沟的辽代祖陵、巴林右旗穿心沟辽代怀陵和白塔子村的庆陵。庆陵是早为軍閥和外国侵略者所毁坏，祖陵和怀陵

呼盟鄂温克族用具（自左至右）打猎上山背的木夹板　喚鹿用的木号　妇女用的針綫盒　馴鹿馱东西用的簍子

呼盟鄂倫春族的女皮袍

都很完好。

一般辽墓近年来發現許多处，主要計有：阿魯克尔沁旗白晋花区的宝山村、巴林左旗龙泉村、林东街北山坡、南塔附近、巴林左旗的駱駝井子以及哲盟庫倫旗勿力不格村和呼盟突泉县郭家屯等地。其中，宝山村、駱駝井子和庫倫旗的辽墓，規模都很大。

9.金　代　1954年和1955年，曾在巴林左旗林东街的白音高劳村，清理許多金代磚墓。出土器物計有"大定通宝"、白瓷瓶、黑釉碗、仿鈞窑碗、陶硯、銅簪、銅鏡和陶罐等。在呼盟阿荣旗境內有金代界壕遺迹，西行伸向滿洲里，尙未調查。我們所調查的，只有巴林右旗白塔子村、錫盟西苏尼特旗温都尔庙北方和土牧尔台附近的界壕遺迹，从这中間可看出它們当初的連接綫索。在呼盟突泉县的双城子也有金代遺址。1956年在清水河县下城灣發現了金代古城；在王三窑子發現了金代遺址，得到"大金泰和四年"的經幢和梵文石碑等物。另在察右前旗土城子村附近，發現金代刻有"明昌叁年(公元1192年)二月十五日王世謙子王忠祭"等字的石棺一件。这些器物对于研究金代文化的分布情况很有价值。

10.元　代　元代时期在內蒙区遺留了很多文物資料，業經調查的古城，計有察哈尔盟太僕寺旗兆奈曼苏默城（即元代的上都城）、多倫县白城子古城、呼市白塔村元代丰州城、包头市古城灣、察右前旗土城子(元代集宁路总管府)、四子五旗城卜子古城（元代汴州路所在或所屬）、伊盟烏审旗大石砭村古城；鄂托克旗城川区和巴拉烏苏两地都有古城。另外还在百灵庙东北方調查了鄂倫斯木古城。

这些古城出土了許多元代文物，其中，兆奈曼苏默城的石刻很有特点；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比較丰富。城卜子村古城出土过元印及其他陶瓷器。而鄂倫斯姆古城的石刻和十字紋的墓碑，也很有研究价值。

元代的遺址，在昭盟阿旗白晋花区發現过一处，出土九件銅盆和銅鍋；昭盟宁城县大名城，本是辽代中京遺址，但古城的西南部，散布着許多元代文物資料，1956年內出土"武平县尉司印"元印一方，表面刻有"武平县尉司印　尙書行部　至元二年"字样。元代大宁路武平县治的所在地，至今不明，"尉司"是公安官吏，并非县令，因此，虽不足以証明武平县即在大名城，但得到一些綫索。大名城的土山城瓮城里，在1953年出土石碑一塊，一面是八思巴文，另面汉文是，"宣武将軍益都路总管府达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奥魯总管府达魯花赤管內劝农事也里帖木兒祖塋至正口一年十一月口日"。益都路在山东省东部。墓碑旣在中京城內發現，可見中京城內外一带，能有許多元代文物資料，若加調查發掘，必有相当收获。土默特旗的黑土凹曾發現元代遺址；托克托县的伞盖村在1954年破坏元墓一座，出土黑釉

呼盟布科雅特人中年妇女服装

細頸侈口瓶、白瓷鉢和“至正元宝”等物。伊盟准格尔旗在1956年出土元代墓碑一座。

至于元代墓葬，至今所知，以察盟太僕寺旗的兆奈曼苏默城附近和察右前旗土城子附近一带出土較多，但尚未进行清理發掘。

11.明 代　到明代，內蒙区的主要遺迹是，在平地泉行政区南部一带与山西省的长城相邻接。当时佛教比較發达，現在呼和浩特市的大召、舍力圖召、巧尔气召和薩拉齐县的麦达召，都是著名的明代遺迹，而在清代加以扩充和修理。托县的黑城和和林格尔的大紅城、玉林城，都有明代古城，但是出土文物不多。

二、革命文物

內蒙地区的革命历史，由于社会环境和民族关系的不同，而有許多特点。內蒙地区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长期之間以蒙族人民为中心，为着本身的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爭。內蒙人民的革命运动，起初是自發地进行的，經历了許多次的失敗；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領导下，并且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进展同一步調，而得到了最后胜利。几年来，从几个重点地区我們搜集到一些革命文物資料。

东部区哲里木盟的科左中旗，曾在1926年暴發过陀达梅林的反王公、反軍閥运动，当时声势浩大，在內蒙人民中間引起了重大影响，至今还到处流傳着他的英勇斗爭的故事。我們在1954年的調查中，了解到若干有关事迹。

与他同时，在西部的伊盟烏审旗，在悉尼喇嘛領导下，展开了“独桂龙”运动。“独桂龙”是蒙語，相当于汉語的“組”。它的目的，是从王公的剝削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的参加者要在一張麻紙上签名，并且把名字签成圓形，以避免王公逮捕他們的首領。它采取武装斗爭的方式，一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連系，一面与南方的工农革命运动相配合。不幸是最后失敗了。但是，悉尼喇嘛的名子至今还受到內蒙人民的無限的景仰。我們在調查中曾得到“独桂龙”运动的签名文件，悉尼喇嘛的圖書和用具、照片等重要文物資料。

在1927年，呼和浩特市旧城的巧尔气召，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員的办公处所，对于內蒙革命运动的开展發生了有力的影响。这时期，多松年和李裕智等烈士的革命事迹是內蒙人民至今所深切紀念的。我們調查到許多革命事迹，搜集了一些办公用具和烈士服装、照片等。

918事变后，党中央特派王若飞同志前来內蒙指导革命运动，王同志在包头的被捕处所和在呼和浩特市被押的监獄，至今还保存着。

这时期，在东部区的呼盟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和鄂倫春自治旗境內，抗日联軍的活动普遍展开。这些地方至今还流傳着当时英勇斗爭的故事，散存着很有价值的文物資料，須待今后深入調查。

在西部区，日寇的大举侵略，使广大的蒙、汉人民站在一条战綫上，为着民族的解放进行坚决的斗爭。当时是大青山、滿汉山上和鄂尔多斯草原，到处都有蒙、汉人民，在党的領导下，并肩进行战斗，并且在战斗中取得了輝煌的战績。我們曾多次訪問当时革命游击战爭时期的重要人物，了解到許多情况，并且征集了許多重要文物資料。其中主要的計有：抗日反汪标語、“共产党人”創刊号、时論选集、識字課本、党員必讀、青年救国会簡章、紀念紅五月宣傳大綱、抗日救蒙会組織大綱以及当时使用的刀、槍等武器。

胜利后，內蒙的軍事、政治形势出現了新的情况，人民革命的力量，澎湃地發展，在党的正确政策領导下，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这一阶段的文物資料，我們征集到的，主要有：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布告、改王爷庙为烏兰浩特市的布告、华北解放軍有关軍事行动和敌我兵力損失比較的布告、內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綱領及目前主要工作、內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对目前东蒙形势与工作指示，以及晋綏日报等書刊报紙。

內蒙人民在长期間进行英勇斗爭所遺留的文物資料，說明了內蒙人民取得徹底解放的过程，对于广大群众具有充分的教育意义。

三、民族文物

內蒙古自治区內居住着蒙、汉、回、滿、鮮、达呼尔、索倫、鄂倫春、鄂温克、藏、苗、維吾尔等各族人民。他們用本民族的方式，过着农耕、畜牧或打猎的生活。几年以来，我們曾一再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風俗習慣和宗教艺术进行調查，在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积極协助下，得到許多資料。其中主要的，在蒙族方面計有：牧养用具，如馬印子（即在馬的后腿外側烙标志的工具）、牛印子、馬鞭子等；生活用具，如燒牛粪爐子、奶茶壶等；生产用具，如赶毡子、制奶酒的方法和模型等；服飾如头带、皮靴、庫錦坎肩等；礼俗用品，如哈达、鼻烟壶等；風俗習慣，如毡子佛、跳鬼用具、薩滿服装等等。它們代表着牧区生活的典型。

在回族文物方面，我們征集到的資料，偏重于

宗教服装和用具。在滿族方面，征集到一些服装。呼倫貝尔盟的达呼尔族人，从事农業和畜牧，畜牧生活与蒙族接近，而农耕用具，有些特点。朝鮮族的服装和耕作用具又与汉族不同。鄂倫春和鄂温克两族，都在大兴安岭里从事狩猎生产，都穿狍皮衣褲、犴皮（大角鹿皮）靴子，使用樺木器具；起初用弓箭，后来用土槍，再后来用单子槍，近年来用三八快槍打猎。随着槍支的改进，打猎生产增加，而生活日趋上升。但他們两族中間，鄂倫春人騎馬，鄂温克人飼养馴鹿，在这方面，互不相同。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注意到他們生活方式的变迁，另一方面对于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成就，也很重視。

不过，民族文物工作所牵涉的問題很广泛，它同內蒙区的古代历史和当前建設都有密切关系。而且我們的社会变化很快，旧有的文物資料，时时刻刻都在散失和损坏，并逐渐为新的所代替，若不加强調查征集工作，也是轉眼就要消失。因此，今后必須适当的發展民族干部，長期間进行广泛調查，深入研究，才能得到良好效果。

几年之間，我們在党的領导和支持下，在古代历史文物、革命历史文物和民族文物方面，了解到一些情况，取得一些收获；但从实际的要求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內蒙的文物工作是与民族政策密切相关，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学習，也是今后我們工作中急須重視的問題。

（执笔人：汪宇平）

国外簡訊

苏联發掘花刺子模文化遺址的工作即将完成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托尔斯托夫不久前在苏联"文学报"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已經进行了六年的对中亚細亚古代花刺子模王朝的一座文化遺址的發掘工作，将在今年完成，并且公布發掘結果。到那个时候，中亚細亚古代人民的生活历史将展現在人們眼前。

这座文化遺址在現在的卡拉—卡尔巴克自治共和国境內。它建于紀元前四世紀到紀元后一世紀，是古代花刺子模建筑的最完整的代表。六年来的發掘工作已經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其中經济、繪画、文学、建筑等材料的整理工作已經接近完成。

托尔斯托夫还說，他所領导的考察队乘飞机考察了古代花刺子模地区的灌溉遺迹，获得了約二千年前花刺子模的农業灌溉历史材料。考察队还研究了古代花刺子模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的遺址，發掘了这些部落的两个遺址，在其中的一处遺址中發現了与游牧帳篷相似的建筑以及古代中亚細亚的珍貴的彩色地毯。

（1957年3月28日新华社新聞稿）

越南發現一千多年前的古墓

河內东南的兴安省最近發現两座古墓；不久以前，河东省也發現了一座古墓。据越南考古工作者估計，这些古墓可能是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李代帝王的坟墓，目前正准备發掘。

据河內博物館負責人說，和平恢复以来，越南文化部收集的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已經有四千多件，其中包括古代建筑物、雕刻、陶器、瓷器以及許多珍貴的革命資料和实物。

在这些珍貴的文物中有越南爱国者陈兴道与中国元朝侵略軍作战的时候插在白籐江上的木桩和公元五四八年李南帝时代的銅鼓等。在革命文物中，有一九三〇年宜安苏維埃成立时候的六面紅旗以及許多其他有价值的革命文物。

在各地發掘出来的古文物和革命資料已經在河內、凉山等十三个省展出。

（1957年3月21日新华社新聞稿）

巴黎盧夫宮許多珍貴艺术品經常不能同观众見面

巴黎消息：号称世界最大美术陈列館的巴黎卢夫宫由于展出面积的限制，半数以上珍藏的艺术品經常無法同观众見面。据报道，目前約有3200幅名画、1200件名貴雕塑品和30000件块及古物和其他大批珍貴艺术品不得不存放在积滿灰塵的儲藏室里，不能供美术爱好者欣賞。作为卢夫宫主要陈列館之一的"百花厅"早在上一世紀末就被法国財政部占用，至今还沒有归还。

巴黎"艺术"杂志指出，卢夫宫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由于經費不足，卢夫宫各陈列館被迫輪番閉館；各主要陈列館的房屋修繕工作已經几乎全部停頓下来；各館雇不起新的管理人員；用国家的有限基金根本买不起任何新作品。它指責政府当局正在"謀杀"这个艺术之宫。

卢夫宫修建于十六世紀上半叶，原来是法国王族的居室。法王路易十四把它变成私人的画廊。法国大革命以后，卢夫宫才正式成为国家美术陈列館。

（1957年3月8日新华社新聞稿）

內蒙古革命文物的調查与收集

張　郁

近三十年来內蒙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內外統治者英勇斗爭的历史，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份。由于民族关系、社会条件和所处时間的不同，內蒙革命斗爭有許多特点。調查研究內蒙地区的革命历史，并搜集革命文物，这是我們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

調查收集革命文物，对我們說是一項新的工作。由于党的重視，我們自1954年来，一再派員前往重点地区进行調查，主要事迹計有：伊克昭盟烏审旗的"独桂龙"（蒙語，小組之意）运动；大青山、滿汉山、馬头山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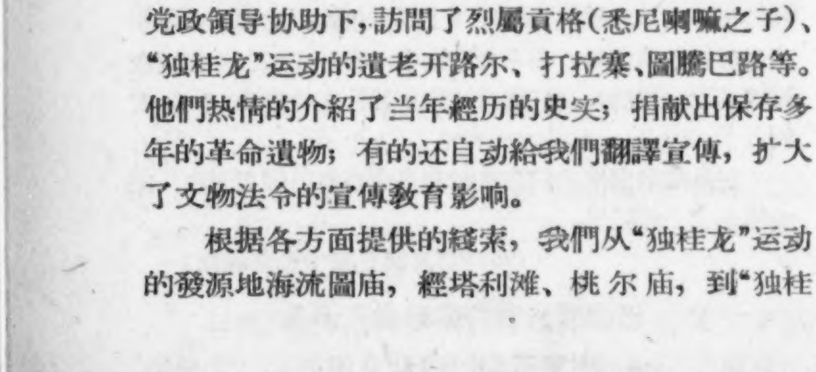
一、伊盟烏审旗的"独桂龙"运动

烏审旗在鄂尔多斯草原南部，是一个蒙族聚居的牧業区，境內辽闊多砂，交通不便。在当地盟旗党政領导協助下，訪問了烈屬貢格（悉尼喇嘛之子）、"独桂龙"运动的遺老开路尔、打拉寨、圖騰巴路等。他們热情的介紹了当年經历的史实；捐献出保存多年的革命遺物；有的还自动給我們翻譯宣傳，扩大了文物法令的宣傳教育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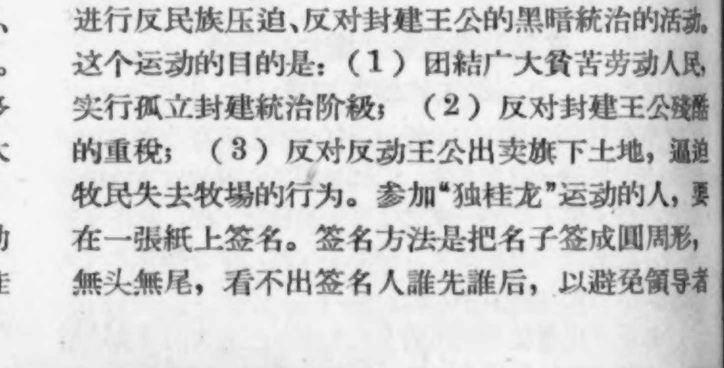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綫索，我們从"独桂龙"运动的發源地海流圖庙，經塔利滩、桃尔庙，到"独桂龙"运动的中心圪拉圖庙、昂拜淖、烏审召、战役地带滿汉圖淖、梅林庙、張果圖、桃圖梁、大不圖等处，进行了調查与拍攝照片。

几年来的調查使我們深深的体会到：勤劳勇敢的蒙族人民，近百年来为了爭取民族生存，曾先后發动过許多次反抗民族压迫的英勇斗爭。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沒有先进的工人阶級党的領导，这些轟轟烈烈的革命运动，最后都归于失败。其中規模較大的，在17世紀有林丹汗、噶尔丹等的反淸起义；数十年前有陶克陶呼达梅林等反对北洋軍閥的斗爭。伊克昭盟的"独桂龙"运动是在40年前从自發轉向自觉的革命斗爭。

"独桂龙"运动是1912年在內蒙西部伊克昭盟的烏审旗發展起来的，領导人悉尼喇嘛（意即新的喇嘛），原名尔吉吉日格勒，他組織、团結劳动人民，进行反民族压迫、反对封建王公的黑暗統治的活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1）团結广大貧苦劳动人民，实行孤立封建統治阶級；（2）反对封建王公殘酷的重税；（3）反对反动王公出卖旗下土地，逼迫牧民失去牧場的行为。参加"独桂龙"运动的人，要在一張紙上签名。签名方法是把名子签成圓周形，無头無尾，看不出签名人誰先誰后，以避免領导者



伊盟烏审旗海流圖庙，为"独桂龙"最初的發源地，悉尼喇嘛曾駐軍于此



烏审旗圪拉圖庙，悉尼喇嘛初次組織"独桂龙"运动时的办公处所

大青山武东县城土沟早期动委会所在地

被敌人發現。文件的中心写明宗旨。这个运动起初由七十多人發展到十一个小組，建立了十九个吱查（行政村）。运动正在蓬勃發展中，遭到反动势力迫害，以武力劫持了領导人悉尼喇嘛，囚禁在烏审旗的圪拉圖庙。后来人民激于义愤，終于把悉尼喇嘛营救出險。1926年党所領导的革命武装——騎兵第12团，为反抗反革命，在悉尼喇嘛指揮下，于烏审旗烏兰特莱亥庙、滿汉圖淖等地，与封建統治所勾結的郑毓秀反动武装，坚持艰苦战斗达一年多。当革命正在向前發展的阶段，敌人秘密打入革命內部，暗杀了运动領导人悉尼喇嘛于特麻亥莱之夕畢，因而使"独桂龙"运动遭到失敗。

調查时搜集到有关烏审旗"独桂龙"运动的文物50多件，計有："独桂龙"組織签名文件、"独桂龙"領导人之一的旺丹尼瑪和他的坟墓照片、旺丹尼瑪給貝勒的信，悉尼喇嘛的照片、笔記本、公文插袋、笔袋、公文皮包、雨帽、朋楚克等給悉尼喇嘛的信，騎兵第12团印盒、大刀、地圖，蒙文書籍文献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圖書館編印的"資本与劳动之間的矛盾"等八本、蒙古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大会決議（第一輯）、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扩大会議決議（第一輯）、蒙古革命青年团第三次全会決議等三种，都是当时傳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件，1926年綏远蒙旗民兵司令部第1团第1营的符号、五大洲（五星）臂章，內蒙人民革命党工作計划、1926年內蒙人民革命党中央証明書、內蒙人民革命党工作証（附党章及宗旨）等。

大青山武川县得胜沟游击司令部所在地

二、抗战时期的革命文物

抗日战爭时期，內蒙各族人民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大青山区建立了重要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屬陰山系的主要山脉之一，当京包路以北，东起集宁以西，西至包头昆都侖沟，南面土默川平原，北接山后草地，是一片东西长南北窄的山岭地带。在抗日战爭时期，它不仅是保衛祖国西北的屏障，并且是反攻的前哨陣地。这里有富饒的食粮和皮毛可供軍需。抗日时期，为了便于掌握、活动，以蜈蚣壩为界，划东部为当时綏中专署的范圍，有圪堵戶、城土沟、寿陽营、东河子、麻米圖、鉄圪旦沟、官庄子、兰旗、白旗、小井沟等崎嶇要隘作据点；以西为綏西专署的范圍，有理气沟、得胜沟、万家沟、水磨沟、井兒沟、灯籠树等丛山峻岭，悬崖絕谷險要。南出蜈蚣壩口，可以直搗日寇占据的据点——当时的归綏；北通各大重要沟口，都能通向武川。

在大青山以南，隔着一条京包鉄路，与馬汉山遙相呼应。滿汉山在卓資县南，凉城县东北，西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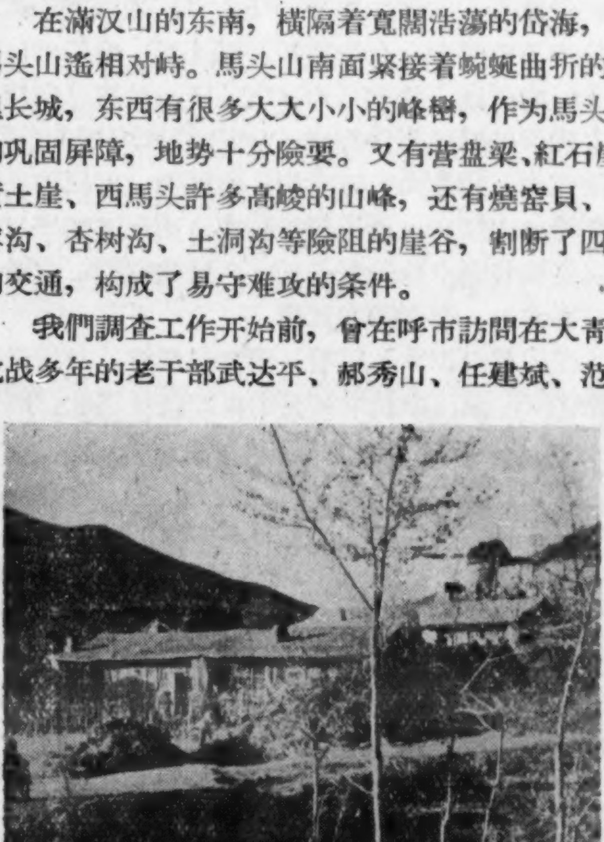
大青山武川县井兒沟馬鞍桥八路軍715团駐扎地

滿汉山佛爷洞高峯，为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带

和林格尔。四面为墻盘山、华山子等山脉所圍繞，里面有四通八达的深邃山谷，如油簍沟、沙湖子、明星沟、滿汉沟、大双圖沟、大車沟、脑包沟、卜連沟等沟口，都是十分崎嶇險峻的地方。我抗日革命政权及游击队的健兒們，經常把这些深山野谷作为活动的根据地。

在滿汉山的东南，横隔着寬闊浩蕩的岱海，与馬头山遙相对峙。馬头山南面緊接着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东西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峰巒，作为馬头山的巩固屏障，地势十分險要。又有营盘梁、紅石崖、黃土崖、西馬头許多高峻的山峰，还有燒窑貝、石窑沟、杏树沟、土洞沟等險阻的崖谷，割断了四圍的交通，构成了易守难攻的条件。

我們調查工作开始前，曾在呼市訪問在大青山抗战多年的老干部武达平、郝秀山、任建斌、范建国、高鴻淼等同志；訪問了曾任綏南专員的楊国兴、成鳳濤同志；訪問了在滿汉山、馬头山革命有年的賈海龙、魯平同志。根据他們提供的情况，决定我們工作路綫及方向。在武川訪問了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区代表，使我們得到了許多宝貴綫索，对工作大有帮助。



滿汉山大双圖沟县区政府所在地

为了有准备的做好大青山革命根据地革命文物的調查收集工作，所以决定先从滿汉山开始。

馬头山、滿汉山的革命文物工作，是以丰鎮、卓資等县，尤其以凉城县为中心进行。

大青山根据地是調查几个主要县旗，如：武川县南、武东县西南、土默特旗以北的大部份地区；察右后旗以西、薩县以东等少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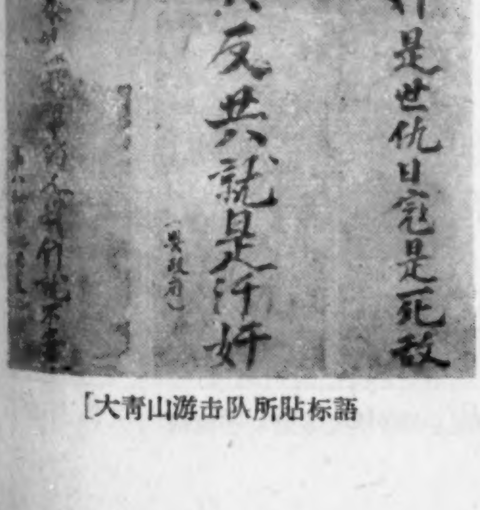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斗爭情况是艰苦慘烈的。当举国燃起了抗日烽火，中国共产党領导了革命的人民，創造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爭，突破日伪的重重封鎖，挺进到大青山地区，并武装起大青山各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政权。因此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力量逐日蓬勃壮大成长。日本侵略者对革命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要制造所謂"無人区"，进行了瘋狂的絕灭人性的"扫蕩"，差不多是村村血泪，处处廢墟。在我們坚持对敌斗爭的艰苦阶段，抗日战士与群众密切联系，互相支援，互相帮助，是贏得抗日战爭胜利的有力保証。老乡們为掩护伤病員，給游击队輸送食物，探敌情，送情报，奋不顧身的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流汗流血，給革命历史增添了無限光彩。那时遺留的許多轟轟烈烈的革命事迹和文物，由当地群众不避艰險地保存記录下来，在我們宣傳了征集革命文物后，都踴躍地捐献出来。其中有：抗日时期的各种武器，生

滿汉山最高峯鴿子堂石洞抗日游击队住处

活用品及炊具、生产工具及設备。有綏西专署的各种粮款单据、粮草票，晋綏边区各种粮食票券。有抗日时期出版的書籍，如中共晋綏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著作”、“組織起来——陝甘宁晋綏边区关于生产运动的文献”，晋綏边区出版的“轉移”、“第四届群英介紹”、“大家办合作”、“留守兵团的英雄們与模范者”等，軍事方面有：“苏联步兵战斗修养”、“抗日步兵战斗問答”、“抗日战爭的战术問題”，“八路軍軍政講話”等。抗日时期的档案文件，有：綏西专署的减租减息法令、物資筹集与配給通令，綏西专署布告頒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綏远省委关于征收田亩税及羊税的規定、托县政府通令等。有关党組織活动的各种重要文件如：“党員必讀”、“党員須知”、“党支部組織工作”、“各級党委开会的秩序与內容的規定”、“半年来巩固党的工作檢討及目前党的組織任务与工作”等。群众团体斗爭文件有：“抗日救蒙会組織大綱”、“青年救国会簡章”等件。宣傳品有：抗日反汪标語，“为襲击岡房营子告同胞書”、“爭取时局好轉十大任务”、“紅五月宣傳提綱”等。另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油印本、“大青山的烽火”詩稿，“抗战歌选”、“共产党人”(創刊号)、“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笔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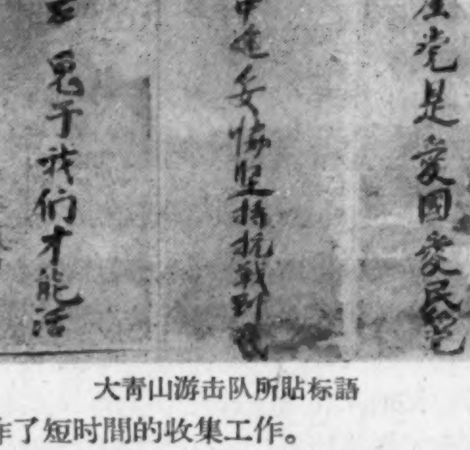
三、內蒙自治运动时期的革命文物

1945年8月內蒙古各族人民从日本侵略軍奴役下解放出来，从此出现了內蒙革命的新的时代。1945年11月，內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于張家口成立，在这时期，党培养了干部，广泛宣傳了民族政策。后来在党的領导下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1946年4月，在承德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蒙統一会議，这是著名的“四三会議”。1947年4月，在烏兰浩特（王爷庙）举行了第一次內蒙古人民代表会議，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关于这个时期的革命文物，我們以自治运动联合会、“四三会議”、



[大青山游击队所貼标語

自治政府成立为重点，进行了征集。另外解放战爭时期，丰鎮为內蒙西部区綏蒙政府所在地，我們以集宁、丰鎮为中心作了短时間的收集工作。



大青山游击队所貼标語

东部区的文物計有：內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木質方印(上有蒙汉两种文字)、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决定、东蒙总分会印發的內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要决議等。1947年4月27日內蒙人民代表会議烏兰夫主席的开幕詞、內蒙临时参議会駐会議長及参議員当选名单、內蒙政府施政綱領及組織大綱、代表会議的各种紀录、內蒙政府成立布告、賀旗等。

有关东部区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維护土改的武器，內蒙人民自动参軍支前的照片等。

烏兰夫同志給內蒙部队的亲笔作战命令、內蒙騎兵、蒙汉联軍作战及协助人民生产建設的照片，內蒙騎兵軍旗等。另外有烈士遺物、和有关起义的資料，苏蒙联軍在多倫、赤峰等地击潰日寇所遺武器，贈給的紀念品等。

西部地区包括丰鎮、集宁、滿汉山、馬头山等地，革命文物有：各式武器，革命文件，如华北区第三兵团进軍布告、晋綏边区軍勤負担办法布告、优待俘擄守則、敌我兵力損失比較、解放区面积人口發展統計、蔣軍起义通行証、綏远和平起义通电原稿等。

在丰鎮、集宁方面，有追悼王若飞等烈士、向綏西进軍游行、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等照片，以及許多有关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書刊报紙等。

从上述調查征集革命文物中，說明內蒙地区的革命运动，早期虽然有許多次的艰苦斗爭，但都遭到失敗，后来“一經取得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与中国革命相結合，就使內蒙民族的解放运动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烏兰夫1951年5月1日“繼續加强党对內蒙人民的領导”)，并且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成为新中国大家庭的一部份。今天，內蒙各族人民已經在党的領导下，走过了光荣胜利的十年，并且正在用坚定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們从內蒙革命文物的調查工作中，深深的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并非輕易得来；因而要为加强民族团結、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而更努力奋斗！

伊盟薩拉烏苏河考古調查簡报

汪 宇 平

一、薩拉烏苏河的概况

薩拉烏苏河位于伊克昭盟烏审旗和鄂托克旗的南部，即鄂尔多斯草原的南端。它發源于陝西省西北部定边县境內，在鄂托克旗的东南角，流入內蒙，然后东北流，进入烏审旗，又东北流約40公里（按地面里程估計），在巴吐灣村东折，繼續前流入陝北，与响水河会合；再东南流，称無定河，到清澗县入黃河（圖1）。

蒙語"薩拉"是黃的意思，"烏苏"是水，是由于河水終年渾黃而得名。在汉語叫"紅柳河"，是由于河的沿岸生長許多紅柳(即檉柳)。俗称"大河"，是由于这条河"大"。如它的河谷，在內蒙境內，一般寬度可达500多米，深度有时可达80米。河水的寬度，一般是4米左右，深度不过0.50米而已。

这种河谷深闊而河水淺窄的情况，說明了薩拉烏苏河流水的侵蝕作用是很大的。它的原因，第一当地的地層构造，是湖相堆积，由黃砂土層、黃砂層或藍灰色砂層所构成。地層比較松軟，对于薩拉烏苏河水的侵蝕，抵抗力量較低。第二，砂層下面有中生代的紅色砂岩層平鋪着。有几处是上部的砂層已經冲刷淨尽，而直接由下部的紅砂岩層作河床。这种河床减低了河水的冲刷作用，减低了河床的坡度；使薩拉烏苏河的流水速度降低，而增加了向两岸侵蝕的力量。因此，河水在比較密致堅硬的黃砂土層地带流过时，它的侵蝕力量减弱，河谷比較狭窄，而两岸形成了悬崖。但一到比較松軟的黃砂或灰砂層地带时，河水向两岸的侵蝕力量，立刻增大，河谷的寬度可达500米以上，并且正在繼續侵蝕中。

薩拉烏苏河的流水，到处是曲曲弯弯，成U字形，向前流着。U字形的外緣部分，繼續受着河水的侵蝕，逐漸塌陷，形成大峭壁；而內緣部分，隨着河床的向外移动和降低，而繼續伸長，形成阶地。因此，在薩拉烏苏河上，到处可以看到新近侵蝕成的大峭壁，可以看到长舌形或馬蹄形的阶地；另外还有一种孤立阶地，是由于河水把長舌形或馬蹄形的阶地，从中間冲断，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阶地，高高低低地散布在薩拉烏苏河的河谷中間。它們有的在一面有剖面，有的在四周有剖面；同时，各个阶地还都有个表面；在許多的剖面和表面上，遺留着許多化石或文化遺物，使我們在那里进行考古調查，感到很多便利。

这一地带，早在1924年經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調查，發現过一顆人牙化石和許多兽骨化石，他和德日进两人都用法文發表过报告。中国科学院賈兰坡先生在所著"河套人"一书中也介紹得很詳細。我曾两次前往調查，現在把所得的資料，分別說明于后。

二、大沟灣村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

遺址的所在地是烏审旗河南区大沟灣村的西沟，在一处由黃砂构成的舌状阶地的表面上。阶地高出薩拉烏苏河的水面約15米，由西北向东南方伸展；它的东南方的尖端部分，有一处黃砂土層，高出水面可达20米。阶地中部稍低，而西北部逐漸增高，一直与河崖相連接。这个河崖的高度可达80米左右。阶地的西南面是旧河床，而东北面还有河水流着（圖2）。

这个遺址就处在阶地的西北部逐漸增高的这一段上。它本身寬达18米，長达33米，全由堅实的黃砂构成。河水把它冲刷成阶地，狂風暴雨把文化遺物从砂層揭露出来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还埋在砂層里（圖3）。所得的各項資料如下。

圖1 調查路綫和薩拉烏苏河所在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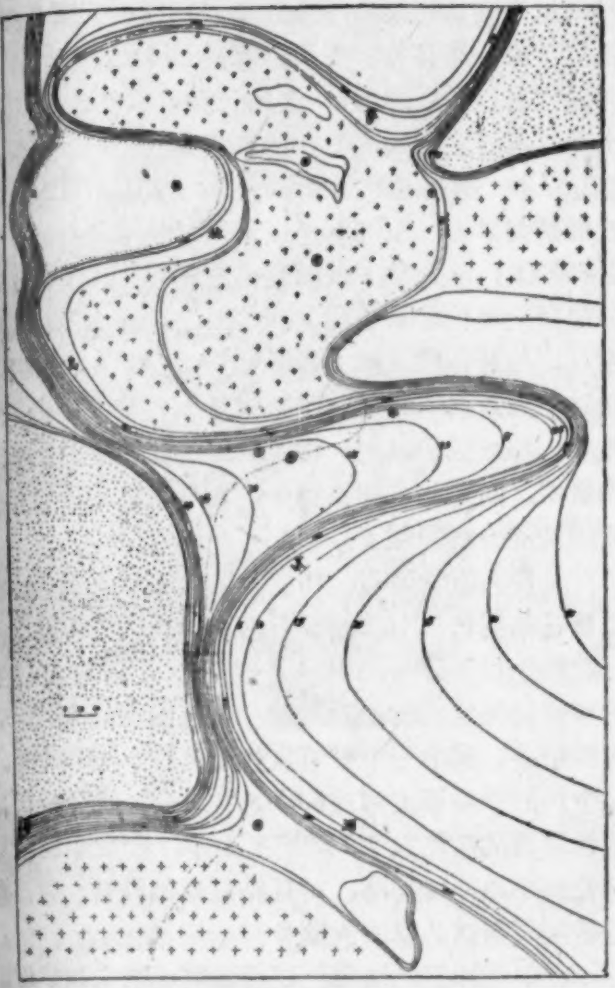


圖2　薩拉烏苏河地形略圖

（1）旧石器

两次調查中，在这个遺址上所得到的人工打成的石片共达76件。其中只有两件在正面似乎有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而背面保持着劈裂状态。另外也似有两三件略有加工情况。其余全是人工砸出的石屑（圖4、5）。

这两件石器所用的材料，一件是褐色火石，另一件是淺黑色石英石。它們都很小。一件較大的長度只有2.10厘米，最寬处不过1.60厘米；那件小的还更小些。从用途上看，它們是刮削器。

石器的形体所以这么小，主要是由于当地缺乏石料。在大沟灣村上下20公里一带的河谷里，很难找到一塊石头。因此，这里出土的細小的石片，一定是当初有人从远处把石头找来，然后砸碎。当时人类在那里生活，一定在石器的原料上感到很大困难，因而石器的打制技术不易提高，石器的数量也不能丰富。

（2）燒　骨

在遺址的黃砂表面，散布些黑色而破碎的骨片，共采集10件左右，它們可能是小型动物，当时为人类捕杀，用火燒食，于是骨胳变成黑色。

（3）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在遺址砂層的表面上，有許多殘破的哺乳动物化石殘片散布着，它們与石器共存。这些动物化石殘片，有的是犀牛头骨和牙，有几条牛馬类的肋骨，还有些馬牙。都呈暗褐色，很沉重。另有动物腿骨化石殘片数件，成多边形，与那些完整的肋骨形成明显的对照，但上面并無人工鑿打或使用的痕迹。还得到粪化石一件，長約10厘米，最大圓周是18厘米，中間有两条凹綫，重达300克。石化程度相当深。

圖3　篩取旧石器

圖4　薩拉烏苏河調查所得石器

三、滴哨沟灣村河谷中阶地上出土的人骨化石

在大沟灣村的西方約4公里，有滴哨沟灣村，河水从南方流来，通过紅砂岩的天然石桥，北流約180米，折而东流。在河水轉弯地方的西北方，有个阶地，高出大河水面約15米，長約170米。阶地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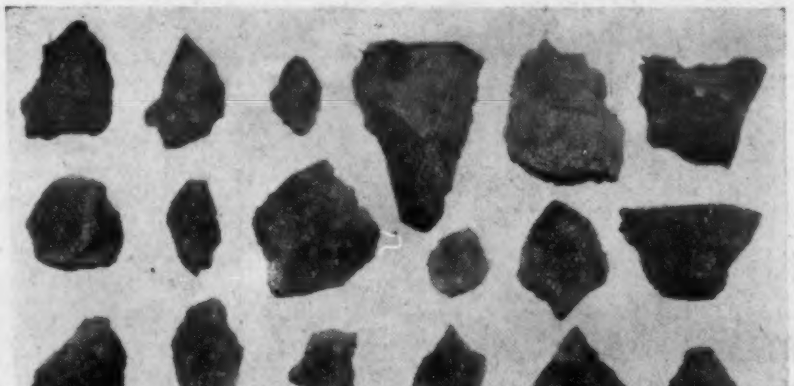


圖5　旧石器和石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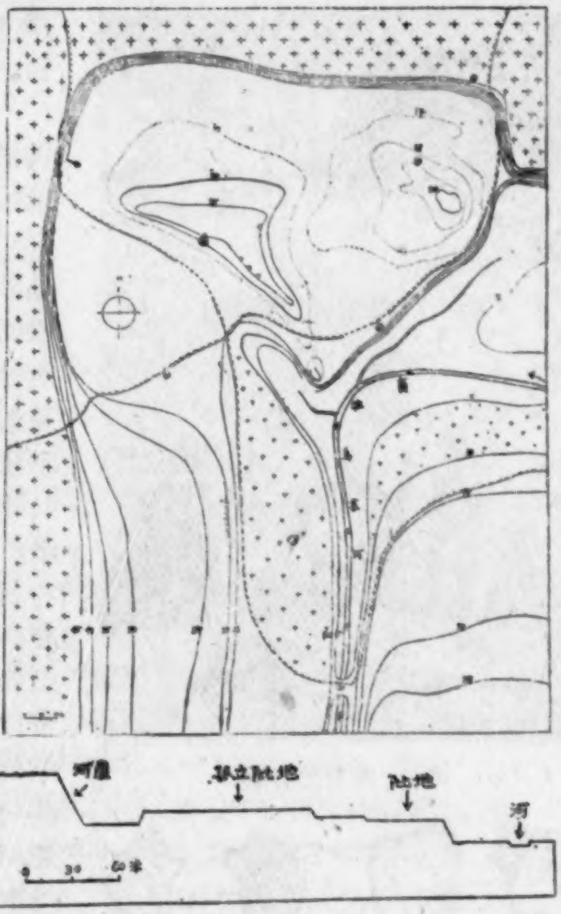


圖6　薩拉烏苏河地形略圖

間有一塊孤立的阶地。它本身的高度約为9米。它的北面和西面是河床，寬約90米。这个孤立阶地的全部地層和它下面阶地的上層，全是由平行的黄砂土和砂結核層相互交替构成，坚硬而致密，是在早期由于流水冲积而形成的。阶地的北面和西面是薩拉烏苏河的河谷，高出大河水面約46米（圖6）。調查时，在当地兒童协助下，得到人頂骨、兽类脛骨和人股骨化石各一件。現在把它們和有关的情况分别說明如下。

（1）人頂骨化石

在滴哨沟灣天然石桥的北方約180米有个阶地，面积南北长达180米，东西寬达280米。它的北面和西面全是薩拉烏苏河上的大峭壁，而东南面有个剖面，长达170米。在这剖面上，有个被雨水从阶地的表面（并非河谷的表面）往下流时所穿成的水洞子（圖8）。这个洞子寬約0.50米，深約2.44米。在它的底部放着两件骨头。其中一件是人頂骨化石，另一件是类兽的脛骨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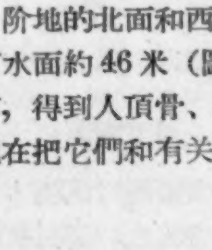


圖7　地層构造圖

这个高达15米的阶地的地層构造，如圖7，由上往下第一層是黄砂土層，厚达2.44米；第二層是砂結核層，厚达0.16米；人頂骨和兽类脛骨化石，出土于这两層之間（圖9）；第三層是黄砂土層，厚1.67米；第四層又是砂結核層，厚达0.24米；第五層是黄砂土，厚0.58米；第六層是砂結核層，厚达0.23米；从此往下表面是由上部塌下来的砂土和砂結核所堆积成的斜坡，而内部是砂層，厚达10米左右。一層黄砂土和一層砂結核，代表着一次冲积。在这个测量点的两旁，砂結核層主要是向西南方伸展着，然而越来越薄，在8米以后，逐漸消失于黄砂層中。向东北方伸展得少，而且很快就和兰灰色的砂層混合到一起了。

这件人頂骨化石，外層和断面都是灰褐色，而里層是暗褐色，与薩拉烏苏河上出土的一般动物化石的颜色相一致（圖10）。它没有磨蝕痕迹。它的重量比現代人的頂骨重些，可見已相当石化。它有四个边，其中三个带着鋸齿形的縫；有四个角，每个角的平均厚度可达6.85毫米左右，这比現代人頂骨厚度的平均数字5.20毫米为厚，而比中国猿人头骨的平均厚度为薄，可見稍有原始性質。这当然不是說所有这么厚的人頂骨都一定是化石。

在頂骨化石的里層，还遺留着血管分枝的痕迹（圖13），从它的位置来研究当时人类智慧發展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2）人股骨化石

發現于滴哨沟灣村河谷中一处孤立的阶地上。这个孤立阶地位于發現人頂骨化石阶地的上面。它东南高，西北低。它的北坡逐漸低下去，而西南面形成剖面。这个剖面，从东南到西北，长約130米。它的东南角尖端部分，距离人頂骨出土地点約6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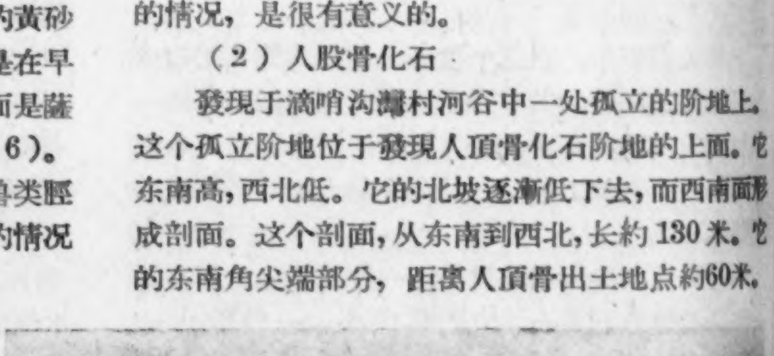


圖8　人骨化石出土地点

圖9 人頂骨化石出土地点（思治宝站的小平台上）

这个孤立阶地西南面的剖面上有四个窑洞，住着老乡。其中，最西北边的一个由汉族人薛升林老乡住着。那塊人股骨化石，埋在他所住窑洞門外右側的土崖子里（圖8）。它的外層呈暗褐色，从断面上看里層是白色，重量不低，相当石化。現存的長度是22.5厘米(圖12)。骨壁厚度可达7.25毫米左右，比現代一般股骨厚得多，也粗得多。

这个孤立阶地的地層，全是由黃砂土層和砂結核層相互交替构成的。有的地方層次分明；有的地方相当錯杂，而大体上是一層一層平鋪着。出土人股骨化石地点的地層构造，由上往下，第一層是黃砂土層，厚达3.42米；第二層是砂結核層，厚0.20米；第三層是黃砂土層，厚达0.30米；第四層是砂結核層，厚0.48米；第五是黃砂土層，厚0.32米；第六是砂結核層，厚0.42米；股骨化石埋在这个地方。以下还有黃砂土層0.35米，便达到窑洞門前的平地；平地以下，有个斜坡，高約8米。斜坡的底部高出大河水面約9米。

四、哺乳动物化石

在薩拉烏苏河河谷的深处，埋藏着許多哺乳动物化石。这种含有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層，下距現在薩拉烏苏河的水面，大体上說，約在7—30米之間。就是說，在水面上7米以下和30米以上的地層中，并未發現原生化石。这些化石可能屬于同一时代，根据过去的說法是更新統晚期。人类与它們同时生存，这是没有疑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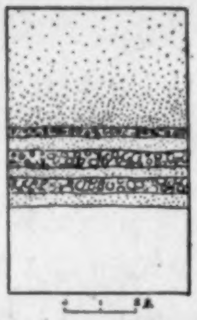


圖11 地層构造圖

当年桑志华等人前往調查發掘时，曾得到納瑪象、披毛犀、水牛、野驢和鹿等动物化石多种，对于当地古代自然与社会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調查时，曾在几处阶地剖面上采集到一些牛、馬和犀牛牙之类的化石殘片。在大沟灣村西方的砂崖上，得到一件殘破的象骨化石。它的头骨，早經打碎；軀干骨骼，保存了大部分；門齿只剩一支，長达2.36米，重达60多公斤，最大直徑是18.5厘米。它的形状与猛獁象牙不同。猛獁象牙弯曲的程度很重，而这支是緩緩地弯曲着。看情形它可能是納瑪象的門齿。古象化石的出土地点，下距薩拉烏苏河水面約30米，是黃砂層。象骨的出土位置，并未扰乱。

圖12 人股骨化石正視

象牙化石出土地点的东方，是一处長舌形的阶地，两旁都是河水。这个阶地中段的北側，有个剖面，高約15米，由黃砂土和砂結核層相互交錯构成，相当混乱。它的中部，夹杂了許多零散的犀牛骨化石。經过采集，得幼披毛犀头化石一件。另由当地老乡贈送披毛犀上顎骨化石一件；它出土于附近的河崖子上。

两次調查期間，幸在当地群众协助下，略有所获，对科学研究可能会有意义。由于業务水平的限制，本文只就实际所得的資料，加以初步的叙述。希望中央主管部門早日前往調查發掘；更期待着在这地区将有更丰碩的發現。

圖10 人頂骨化石側面

圖13 人頂骨化石里面拓本

清水河县和郡王旗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

李 逸 友

近几年来，在內蒙古西部地区曾發現了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包头市东門外轉龙藏附近的細石器文化遺址。1955年春季我們曾加試掘，已有初步报告發表。但对內蒙古西部地区的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混合的情况，过去我們很不了解。1956年7、8月間，在平地泉行政区清水河县和伊克昭盟郡王旗各地，發現了几处这一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采集到一些資料，現將情况簡报如下：

一、棋子峁遺址

棋子峁在清水河县城西北約27公里，西距黃河东岸的喇嘛灣7公里。当地有一条东西横亘的山，棋子峁是指西面的一个圓形小山頂，从峁上到山沟底約有1公里。棋子峁村在峁下的东南山腰。峁上有小庙一座，古文化遺址即在小庙的东南坡。遺址面积南北長約200米，东西寬約100米，地面散布的文化遺物非常丰富。地上有灰土，而看不見灰層断面。当地因陶片太多，風沙又大，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遺址內散布的陶片多是紅色的，大概可分做三系：

1. 細泥彩陶系——这种陶片最多。用細泥，陶土經过冲洗，手制，表面压光，里面也曾加磨压，厚度在0.4—0.8厘米之間，火候很高，深紅色或橙紅色，多在口沿上塗以单調的黑綫条，以花紋簡单为特色。有大口平底的鉢或碗，只在口沿外面塗很寬的黑边；圖六左之1是一个大碗的口沿，陶

圖一

圖一 遺址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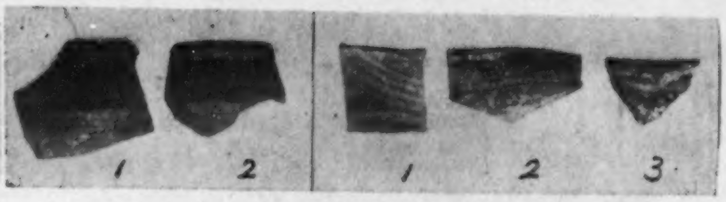
圖二 淸水河各遺址出土的小型石器
1. 双孔石刀2. 石磅 3. 尖刻器 4. 石叶5. 多刃形石片 6. 石环(1—6常家河遺址出土) 7. 尖刻器 8. 刮削器 9. 石核 10. 多刃形石片（7—10棋子峁遺址出土） 11. 酒鋪墕出土的石磅 12. 田家石畔遺址出土的双孔石手鐮

罐在口沿部分有黑边花紋；圖六右之3是一件直頸卷唇陶罐的口沿，口沿上有一圈黑边。陶罐腹部的紋飾，有的在平行綫中加点，也有菱形紋的（圖三之3、4）。当地老乡說遺址內曾出土过完整的彩陶罐。

2. 粗砂紅陶系——陶片数量較少，陶土內羼用大量的石英和砂粒，火候較低，表面發紅色，里面为紅褐色或黑色，厚度0.7—1厘米。器物为大口平底，表面印有斜行的繩紋。推測这种器物是大型的瓮，是一种比較笨重的用具（圖十之1）。

3. 夹砂灰陶系——陶片数量較多，陶土未經淘洗，夹有細砂，火候較高，手制，淺灰色，厚度在

圖三　清水河各遺址出土的彩陶片和灰陶片



圖六　(左)棋子峁和常家河遺址出土的彩陶片
(右)清水河各遺址出土的彩陶片和灰陶片

0.5—0.8厘米之間。一部分陶片上印有籃紋，器形多为罐（圖十之2）；另一部分为素面，有的还压光，大口、折腹、平底，可能为盆类（圖三之2）。这种夹砂灰陶和包头轉龙藏細石器文化遺址的很接近。

遺址內出土的石器有两种，一种为磨光石器，調查时征集到两件有孔石鏟，用細砂岩磨制，表面光滑，鏟的上端为台面，两側有刃，下部的刃有使用过的痕迹。鏟上有双孔，似乎是把石鏟綁在木棒上使用的。这两件石器形状大致相同，其一見圖四。石鏟下端較上端寬，全长17.5厘米。在遺址內采集到磨光石斧一件，已殘破，只剩下少半段了。刃部有使用痕迹。另外还采集到石磨棒一件，粗砂岩質，經过磨擦而損坏了边緣部分，現在只有半截了。另一种是細石器，采集到四件（圖二之7—10），其中有刮削器一件，用石英打制，略呈榆叶形，甚为精致，长2.3厘米，厚0.35厘米。一件为石髓打制的尖刻器，尖端似曾使用过，因而磨損了一些。一件为瑪瑙的石核殘片。还有一件为石髓打制的多刃形石片，未細致加工。

二、田家石畔遺址

田家石畔在棋子峁的西南方，位于渾河流入黃河的合流处北面約2公里，在黃河东岸，屬清水河县管轄。这一帶的黃河，是在山谷中奔流，两岸低处均为岩石；高出水面約30米地帶才是一層台地，上有黃土層可耕种。田家石畔村后的台地就是遺址。

遺址面积直徑約150米，地表多灰土，但遺物不多。老乡們在耕种时，把陶片拾起來堆在地头一角，我們所得的彩陶片大都是从这种陶片堆里揀取的。这里的彩陶片和棋子峁遺址的相同，都是細泥、手制，表面压光，深紅色或橙紅色，火候很高。彩陶紋飾除在器物口沿塗以黑边外，并加点或波紋等。器形有罐、鉢和碗等，圖三之5是一塊罐片，彩繪平行綫并加以波紋。遺址內灰色陶片較多，多数为籃紋，少数为素面，推測器形为罐、盆等。

圖四　棋子峁遺址出土的磨光石鏟

圖五　常家河遺址出土的磨光石斧

在遺址內采集的石器，有殘石环一件，粗砂岩制，現长6.7厘米。殘石手鐮一件，石灰岩制，磨得很光，厚0.4厘米，两面刃，上部穿有双孔（圖二之12）。田家石畔村老乡还送了遺址內出土的两件磨光石斧，一件較扁平，一件較厚，都是青石制的，刃端有使用痕迹。調查时沒有在遺址內拾到細石器，这里的文化性質是否和棋子峁相同，暂不能肯定。

在田家石畔北面約1公里的酒鋪墕村后山上，采集到小石锛一件，下端双面磨出刃部，精巧可爱（圖二之11）。在酒鋪墕村西南山坡上也采集到少数彩陶片（圖六右之1、2），未見灰層。这里的文化遺存可能和田家石畔遺址有密切关系。

三、常家河遺址

常家河在棋子峁东南5公里，屬清水河县解放乡。遺址在常家河村后約1公里，在水沟边的东坡上。遺址內所見陶片都很破碎，可分三类：

1. 細泥彩陶系——数量較少，細泥曾經淘洗，表面和里面都經压光，厚0.5—0.7厘米，器形为大口、平底的碗或鉢，口沿上繪黑圈，和棋子峁遺址出土的彩陶上完全相同（圖六左之2）。

2. 粗砂紅陶系——数量最少，羼有粗砂粒，火候低，手制，表面印有斜行或縱橫的繩紋，大口，有淺唇（圖十之3、4），平底，推測其形制为瓮或大口罐，应为大型容器或炊飪用具。

3. 夹砂灰陶系——数量較多。陶土內含有砂粒。陶片表面印有繩紋的，为輪制的罐片；表面印有籃紋的，手制，器形为罐或鉢，数量較少。灰色陶片中还有鬲腿（圖三之1）。

向当地群众征集到磨光石斧三件，其一見圖五，刃端有使用痕迹。又有小石锛一件，磨制精美，单面刃，长仅3.7厘米（圖二之2）。在遺址內采集到的石器中，磨光石器有殘石磨棒一件，粗砂岩質，双孔石手鐮一件，也是用粗砂岩磨制的，現已無刃

圖七　尔吉奈曼沟遺址出土的細石器

部，殘缺不全（圖二之1）；另有小石环殘片一塊，用白玉石磨制，断面最厚处仅0.3厘米（圖二之6）。打制精細的細石器，有三件是很标准的，一件为燧石制的尖刻器，一件为石髓制的长条形石片（即石叶），另一件为多刃形石片（圖二3—5）。

四、尔吉奈曼沟遺址

尔吉奈曼沟在伊克昭盟郡王旗的东北边境。在东胜县的东南方約45公里。这一带地方全是侵蝕沟谷地带，从地表上看，像是波浪起伏，而基本上是平坦的；要从沟谷的底部来看，像是有重重叠叠的山梁，高度不下80米。这些山梁的下面有紅色土層，上面有黄沙層，沙層的表面有細石器遺址。

尔吉奈曼沟是东西方向，沟的北方有一道很长的山梁，在1公里长的地带內，分布着三处遺址。当地沙層的厚度約2米，沙上长些沙蒿，在沙蒿的中間散布了很多的細石器和陶片。經过一再的試探，没有找到灰層和墓葬。山梁的表面不能耕种，只能放牧，往下距沟底水源約有80—100米。这种情况能說明，当細石器文化存在的时候，当地的地面情况和現在大不相同，这給我們在当地进行考古調查是一种啓發。

遺址內采集的陶片可分为：

1. 細泥彩陶系——数量不多，細泥，有的陶土曾經淘洗，火候高，橙紅色，制作較精細，花紋都是在口沿外部塗上黑圈，器形有鉢和罐。圖八之1、2为口沿略外卷的罐片，圖八之3、4是陶鉢的口沿。并得到大陶瓮的口沿殘片一件，測其弧度，得知它直徑为44厘米，厚度仅0.3厘米，这种薄而且大的陶器，在細石器遺址里还很少見。

2. 紅陶系——数量最多，它們的制作方法和彩陶略同，大部为素面，也有印上繩紋的，这种繩紋不仅細，而且綫条相当稀疏（圖九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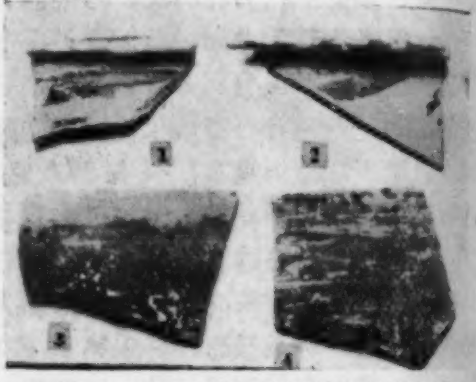
2. 夹砂紅褐色陶系——陶土內夹有均匀的細砂，火候不高，紅褐色，表面印有細繩紋和波紋，器形为瓮或盆（圖九之2、3）。

4. 粗砂灰褐色陶系——陶土內羼有大量粗砂，火候很低，灰褐色，捏制，表面印粗繩紋，圖九之4是陶罐殘片。

此外，还在遺址內拾到一塊灰陶片（圖九之5），厚1厘米，輪制，表面刻有四条綫，并刻有横的人字形紋。

在遺址內采集的細石器，用美丽而坚硬材料制成，有瑪瑙、火石、石英和石髓等，而以瑪瑙石料为最多。遺址附近有大量这种石料，因此取材容易。調查时在地面采集完好的細石器，大約有300件。其中有石鏃、尖刻器、長条形刮削器、多刃形刮削器和石核等。圖七之一是用瑪瑙制的扁平三角形石鏃，色彩瑰丽，精工細琢。另在遺址西部采集到乳白色石英制石鏃一件，晶潔可爱。圖七之2、3为瑪瑙和火石制的刮削器。在遺址西部發現有几处紅土塊，質地很細，在沙里埋着，旁边有紅色石質的研磨用具。石头的一面有磨損痕迹，两旁有用手捏过的凹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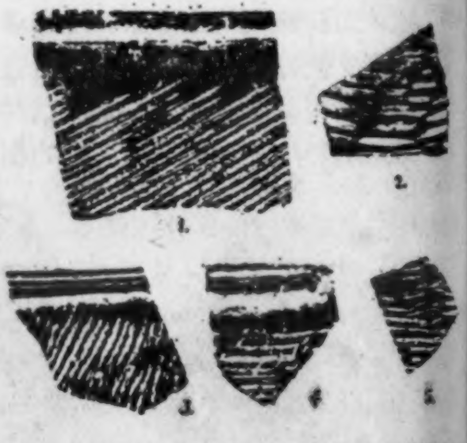
从上述几处遺址的情况来看，它們都含有仰韶文化和細石器文化，反映了当时人們过着定居的生活，經营农業生产兼营着畜牧和狩猎。



圖八　尔吉奈曼沟遺址出土的彩陶片

圖九　尔吉奈曼沟出土的灰陶片

过去，仰韶文化和細石器文化相混合的文化遺址發現得不多，主要只有赤峰县紅山、錦西县沙鍋屯、張家口高家营子和大同云岡等地。其位置都在长城附近一带，大同以西还沒發現过。这次發現的几处遺址，为研究內蒙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遺存，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圖十　清水河各遺址出土的陶片花紋拓片：
1. 粗砂紅陶繩紋　2. 灰陶籃紋（以上为棋子峁出土）　3. 粗砂紅陶繩紋　4. 粗砂紅陶縱横印紋　5. 灰陶籃紋（以上为常家河出土）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

李 逸 友

圖二 蹲踞动物形銅牌

远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間，生活在今天內蒙古地区的匈奴人和汉人，所遺留下来的文物，是历史文物中精彩的一部份。近年来，我們在西部地区进行文物調查發掘工作时，發現匈奴和汉代文物是相当多的。我們在鄂尔多斯地区，在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地，收集到一些匈奴文物，較为重要的是平地泉行政区察哈尔右翼后旗二藍虎沟。

二藍虎沟位于集宁市北約100公里，土木尔台車站西南約45公里，屬察右后旗察汉淖乡管轄。塞烏拉山的一支在这里形成从东往西的一条大沟，沟口在西面。古墓群位于沟北的山坡及平地上，由当地农牧民發現，1949年曾遭到破坏，1950年由旗人民政府發覚制止。1952年冬季前綏远省文教厅曾派員了解，1956年春季內蒙古文化局又派遣文物工作組前往調查。在两次調查中，除向群众了解到許多具体情况外，并搜集了一些文物。

匈奴文物中常見的銅用具是罐，口上有两个方形或圓形的耳，直身，口大于底，有的表面还遺留黑烟灰，由这种情况判断，它不仅可当容器，也可作为炊具。和銅罐同时出土的，往往有圓把和方把的銅勺。銅器中最特出的是飾片，以动物形圖案花紋为主，有鳥头形、蹲或站动物形、群兽形等。飾片有的带边，有的無边，根据花紋来鏤空。（圖二、四、五、六）这四件銅飾为伊盟及呼和浩特附近出土。二藍虎沟不仅出土这种类型的銅牌，还出土几何紋銅牌（圖七、十一）。有的飾片背面有带孔小鈕，可能是穿在衣物上用的。內蒙古各地出土的銅飾片，均为模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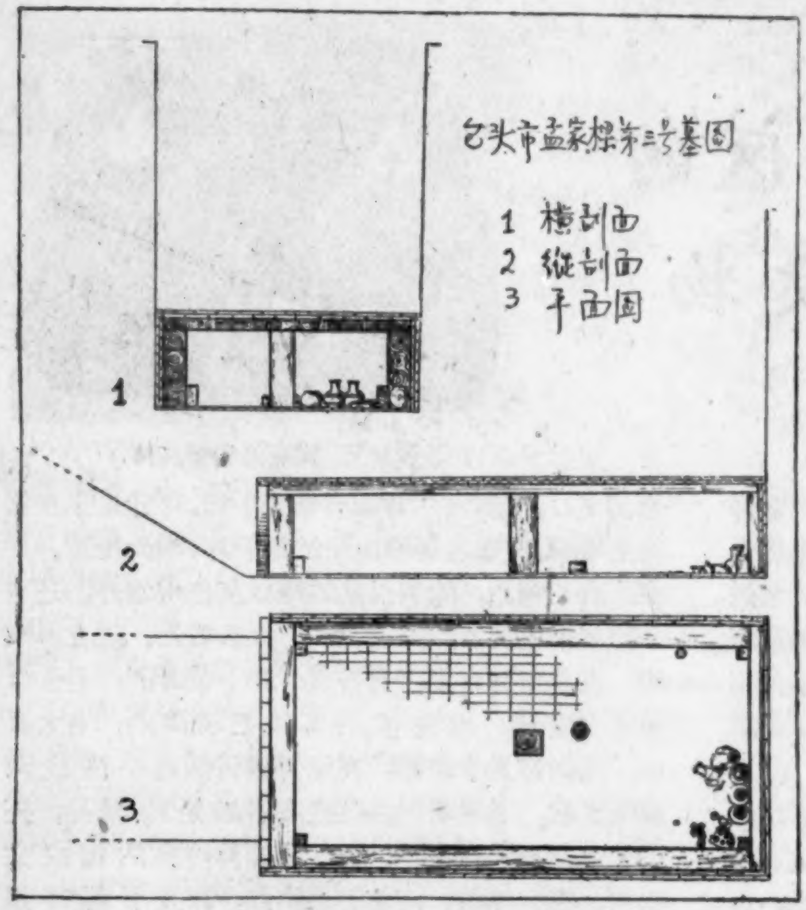
出土陶器，除有汉式的繩紋灰色陶器外，还有一种灰褐色陶器，夹有粗砂，火候較低。现在得到的，有直頸圓腹罐，有带双耳和不带耳的；有侈口短頸大腹罐，也有带三耳和不带耳的；有大口尊。它們都是平底器，在頸部或肩部刻一圈或两圈指点紋，不很規則。这些陶器都是殉葬品，还不了解是否为日用品。在二藍虎沟搜集的匈奴文物內，还有瑪瑙、料珠等装飾品，以及骨錐等用具。

二藍虎沟西南約4公里的克里孟营村，有古城一处，面积长約500米，寬約200米。城墻遺迹高处有二米，有小河自城內穿过，把古城划为南北两部，北部靠山丘，有建筑遺址，地面及地下埋藏有汉式灰陶片；南部一片草灘，地面上沒有陶片。从这座城的位置和所包含的文化層来观察，这和二藍虎沟古墓群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調查时了解到，当挖掘二藍虎沟墓群时，也有人在这一带挖到一些和二藍虎沟相似的墓葬和文物。二藍虎沟位于汉代雁門郡正北約400公里的群山中。据文献記載，汉代在陰山以北筑城，是在五原塞以北，距此很远，克里孟营古城的文化遺存应作何解释，尙待今后發掘研究。

* * *

圖一 古城古墓位置圖

西汉初年起，汉代便和匈奴接触頻繁，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通往北方的交通路綫在文献上記載也較多了。武帝刘徹时，在今陰山的汉代郡县有云中、定襄、五原、朔方、上郡、西河、雁門和代郡等八郡，修筑城池約有56处之多。近年来我們在西部地区調查过的古城中，有21处經我們初步判断为汉代郡县遺址，或曾有一时是汉代的遺址（圖一）。其中烏拉特



圖三　包头市孟家梁第三号墓圖：
1. 横剖面圖　2. 縱剖面圖　3. 平面圖

前旗公庙子和哈德門沟口两处古城，可能为汉代的"城障"遺址。

汉代古城的现存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比較单純的汉代文化遺址，如包头市麻池乡古城、烏拉特前旗三頂帳房古城、土默特旗塔布陀罗海乡古城，以及东胜县城梁村古城等。它們大半有內城和外城两部份。外城地面陶片很少，而內城地面散布陶片很多。陶片为繩紋或素面，并有繩紋磚瓦殘片。城墻都較完全，有的高达5.6米。城內没有晚期的文化遺存相混。第二种汉城，常和北魏、唐或元代等时期的文化相混合，例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是汉代定襄郡成乐县，也是北魏的盛乐城，唐代在此設立单于都护府，可見这一古城的文化遺存的复杂情形。城墙是經过各代修葺或扩建，因而也很难判断那一段是什么时候修的，也就無法了解当时建筑情形。以上两种情况的古城，都有較完整的城址，近百年来才开垦为农田，地層破坏不太严重，大風或雨后地面上露出来的遺物甚多。另外还有一批汉城，保存得比較差些。它們原来的規模較小，或是文化遺物較少，再加上雨水冲刷和風沙侵襲，现今城墙廢址只有一部份，或只有一些陶片散布在地面上了。如薩拉齐县东老丈营子古城便是。

西汉初年，将秦代所筑的長城加以修葺，成为现在所見的汉長城遺址。在狼山、烏拉山和大青山的靠南面的山頂上，汉長城遺址还可以断断續續的看到一些，有的高达五、六米，有的还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夯筑層次。包头市北方大庙村东北的長城，是一处断面，高約5米。沿長城附近，还可以拾到少数繩紋灰色陶片。

在烏拉特前旗沿汉代長城附近發現的两处小城堡遺址，面积都很小，位于長城南面的山麓，通向山后的沟口地方，在交通位置上很重要，可能是汉代的"城障"。

· · ·

汉代古城附近，大都發現了墓群。墓葬形制有土坑墓、木槨墓和磚室墓几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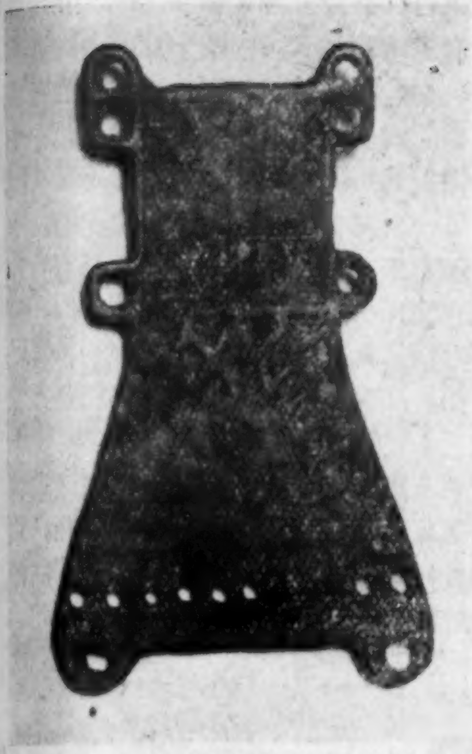
甲、土坑墓　1956年夏，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瓦尔吐沟清理了土坑墓八座。瓦尔吐沟有汉城一座，它的南方和东北方是墓葬区。东北方的土質是黄土。二十年前因雨水冲刷發現墓葬，我們在此清理了四座墓，墓坑深約4、5米，其中有一座的填土經过夯筑。清理时因黄土頹塌，無法了解墓坑的形制。古城南面的墓葬区是沙土，墓葬更容易冲

圖四　群兽形銅牌

圖五　蹲踞动物形銅牌

圖六　群兽形銅牌

刷出来。老乡們在这里拾到許多殉葬的陶罐，因此叫它“瓦罐圪疸”。墓葬都是埋到4、5米深的沙里，形制也沒法了解。这两处地方都是单身葬，葬式除有一墓为屈肢葬外，其余均为直肢葬，沒有使用棺木痕迹。墓葬內尸骨头頂大多数有土龕一个；里面放置陶罐3、4个。陶罐中的平底罐有細繩紋（圖九）和素面两种，高約20—30厘米。圓底罐有双耳和無耳，高約15—20厘米。还有一种長頸瓶、大肚，灰黑色，高約24厘米（圖八）。此外，在城南的墓葬区內还出土陶灶一个，前圓后方，有三个小灶孔。在一墓內出土双耳鉄罐一个，其形制和双耳圓底罐相似，但無紋飾。还有鉄劍一把，長約70厘米，寬3厘米，一面开刃，外附黑漆鞘，出土后即破裂。有小鐸鈴两件，分別在两墓出土，放在尸体胸上，鈴上有小柄。另在一墓內得鐘形小鈴五个。此外，还在四座墓出土五銖錢。从各墓葬形制和出土物看，它們应是西汉时期的。我們还征集到这里出土的銅鼎、奩、甑、印和勺等文物。



圖七 几何紋銅牌（二藍虎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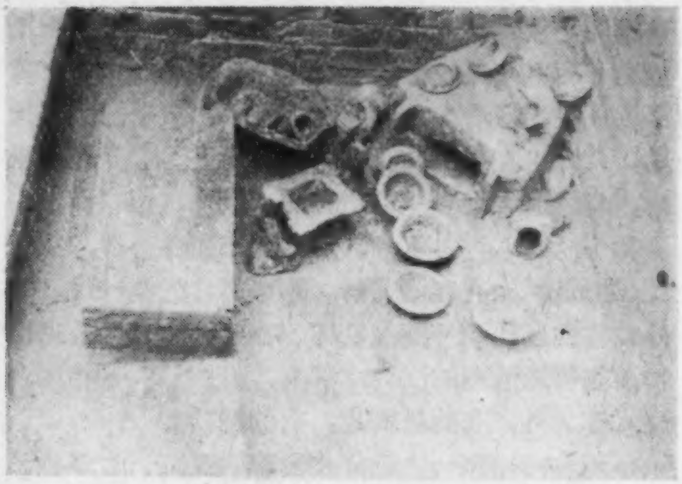
乙、木槨墓　1956年3月，我們配合包头市基本建設工程，在孟家梁村附近清理了汉墓十座。其中有木槨墓四座，以第3号墓为例：墓葬形制为長方形木槨，槨外并加砌墓磚。墓室为正南北方向，墓道在南，長8.7米。室內槨木，在东、南、西三方面，均用32×32厘米厚的木材；北面木槨則用16×16厘米厚的木材。槨內長6.6米，寬3.4米。四角立有木柱，以抵擋四边的槨木，防止下塌。中央也立木柱一根，柱与槨一般高，上面放梁木一根，再在梁上横鋪一層16×16厘米厚的槨板，墓內高度为1.3米。在木槨之外，还使用磚来做輔助材料，四壁的东、西、北三面用两排磚側放砌建；南面用一排磚平放砌建，都堆砌到槨頂一样高。槨頂上平放两層磚，墓底也平鋪一層磚（参見圖三）。此墓早期被盜掘，淸理时槨頂已下塌。墓室南部全被扰乱，人骨仅在塡土內發見大腿骨两根。墓內出土物，陶器有大陶罐一件，鍾形壺四件，灶一件，小盆和小甑各二件，水井、水斗及小壺各一件，倉一件，三足，上有漆繪花紋。銅器有日光鏡一件。此外在墓內还得到一些殘鉄塊。在包头市郊区及烏拉特前旗等地淸理的汉代木槨墓，形制都大致相同。在木槨之外，有的塡陶片，有的鋪磚。

丙、磚室墓　近年来發現的汉墓、大多是磚室墓，分单室和多室两种。

1956年春季托克托县古城乡附近破坏的两座大型多室墓，其中一座共有九室，墓門全用石料，門額及門柱上刻有夔龙紋。另一墓也是九室，平面略似横放的卄字形，墓道在北，正南北向，墓內南北全長13.45米，东西寬13.24米。墓室券頂的砌法，一种是四面起券的穹廬式，用于前、中、后室及側室；另一种是两面起券的船蓬式，用于耳室及墓門。墓的中室及东西耳室壁上繪有壁画（見本刊1956年第9期43頁）。淸理时所得的殘存殉葬品，有灰陶碗、双耳陶罐、大口小底陶罐、朱繪長方形陶

圖八 长頸陶瓶（瓦尔吐沟出土）

圖九 繩紋大陶罐（瓦尔吐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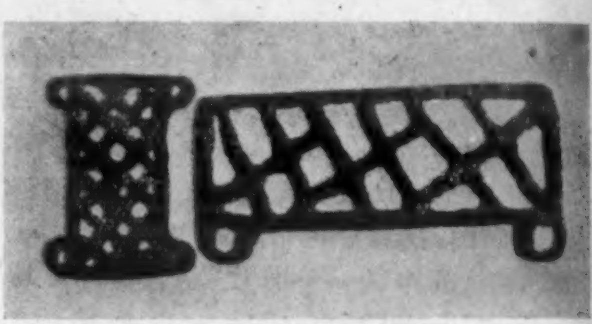


圖十 包头市孟家梁一号墓随葬器物出土情形

盘、素面長方形陶盘、小陶盂、殘骨梳及殘鉄鏟各一件，朱繪陶碟二件，五銖錢三枚，还有一枚小的無文字錢，直徑仅1.4厘米。此外墓內还出土陶罐、灶、房屋、盘、井和碟的殘片，我們初步推測这座墓是东汉末年的。

1956年在包头市孟家梁清理的单室墓有四座，其中第一号墓較为完好。墓室平面作長方形，墓口向西，北偏西9度，墓門外表立面砌成長方形，正中开門。墓頂为南北起券的船蓬式，清理时發現墓頂有早期盗掘洞口，以致墓內堆满淤土。封門磚却很完好。室內長3.9米，寬1.6米。墓內發現人骨两付，系男女合葬，因扰乱人骨散在室內各处。墓室的东北角有一磚台，是放置殉葬物品之地。在磚台下墓室东南角發現殉葬品33件(圖十)，其中陶器有灶、甑、小盆、勺、井、水斗、壶、小桌、有孔香爐、圓管和俑等。陶俑三件：一个左手抱盆；一个左手高举，好像护着头頂上的物品，但出土时头頂物品已失去；另一个左手下垂，右手弯曲向前，手心有小孔，可能原来右手持有工具。骨質品有笄和小圈。銅質品有泡和小圈，根据墓內有殘漆屑，可能是漆器上的附件。此外还有一件滑石制的物品，形像似一只小鴨，高仅5厘米。此墓也可能是东汉末期的。

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物看，內蒙古西部地区的汉代土坑墓、木槨墓和磚室墓，可能时期有早晚，由于目前所得的材料不丰富，还没有明确的分期标准，这須待今后發掘补充了。



圖十一 几何紋銅牌(二藍虎沟出土)

如此"保护"文物

黄 家 忠

在安徽寿县通淝門內有一方石刻，据說是紀念春申君的，当地群众呼之为"門里人"。近来这一方被認为是寿县有名的古迹之一的石刻，受到了寿县文化部門的注意，在石面塗了五彩油漆，石上标一木牌，牌上有几行說明这是古迹的文字。字数不多，抄录如下：

"楚相春申君黃歇，在此被刺，石上乃一劊子手之形象。可能为楚时所刻以紀念黃歇并警惕后人。其刀工虽較粗糙，但就楚物而言，亦甚为难得。"

由这几行說明中我們不难看出，寿县文化部門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在于保护文物和使这一方在光綫暗淡的城門洞中的石刻引人重視。姑不談这个說明是否妥当，但我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保护的古代石刻上面加五彩油漆呢？請看这一石刻上"劊子手之形象"吧，帽子塗以黑色，面上白色，袍塗黃色，靴子赭色，衣帶綠色。特別是在黃袍上又硬加以墨笔的褶痕，这样衬托在橙黃色的底上，使人看去与一般出于俗工之手的丑陋泥塑已無差异。何以要采取如此的"保护"方法，很难使人理解。大概是嫌这一古拙朴实的古代雕刻作品，其刀工"粗糙"吧，或者是企圖引人注目，知道他們是在进行"保护"文物工作呢。

文化部郑振鐸副部長曾說过："我們对于古代文物必須坚決予以保护、保存，必須坚決的防止破坏，防止以任何輕率粗暴的态度来处理、来对待古代文物。我們坚決反对乱拆、乱改、乱挖的現象……"在我們重温这句話的时候，覺得寿县这种使古代石刻面目全非的"保护"方法，是与国家爱护与保护文物的政策的精神完全不符的。

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

內蒙古文物工作組

元朝統治中国时期，曾先后在內蒙地区設置許多城邑，建立各級行政机构。据文献記載，在內蒙地区設置的路，計有上都路、德宁路、凈州路、大宁路、大同路（一部分）、集宁路、全宁路、应昌路和砂井总管府等等。現在以几个路的所在地为中心，对于近年来發現的元代文物，簡略介紹于后。

一、察哈尔盟正藍旗的上都古城

在察哈尔盟正藍旗的黃旗大营子东北方30公里、閃电河北方約1公里，有古城1处。当地是牧区，城址范圍內外到处长滿蒿草。

古城規模龐大，內城东西寬达500米；外城东西寬达1,300米；外城之外有苑城，东西寬約1,800米。苑城之北还有郭，距苑城的北墻約2公里。郭以外不远处还有土墻，墻以外是山丘地带，在山頂險要处所有許多腦包，把古城的形势点綴得很庄严。

郭或土墻的附近一带，現在是草地，适于放牧，沒發現文化遺迹。苑城城址很明确。它的东墻，从东北角往南与外城的东墻相接；它的南墻，由西南角往东与外城的南墻相接。苑城用土筑成，現存高度一般約为1.50米，寬达2米左右。北城墻有城門二，西墻和南墻各有一門，而且每个城門都有瓮城。瓮城一带都有用大塊花崗石做成的础石，足見当年在这一带有建筑物。

苑城之內的外城，方向是北偏东約7度，略成南北方向，用土石筑成。城墻遺迹，比較完整，外側陡峭，而里側形成漫坡。其高度，在东北角約达5米，厚約3.5米。

外城东西两面各有二門，南北两面各有一門。各門都有瓮城，形狀有的半圓形，有的方形。瓮城內散布了許多础石，足証当初也有建筑物。城墻上有敌楼和角楼。

外城內部有些建筑遺址。例如在东北方和西北方各有遺址数处。东北方的遺址，北距外城的北墻約45米，有长方形院墻，高約5米，东西寬达80米，南北长达110米。院墻內部有建筑遺址。西北方的遺址，有数处，但規模較小。在西南角上和西門內部，各有少数建筑遺址。外城建筑物成东西相称，而且地表遺物多为寺庙建筑用物，如大型磚瓦及琉璃殘片之类，因此可以認为这是寺庙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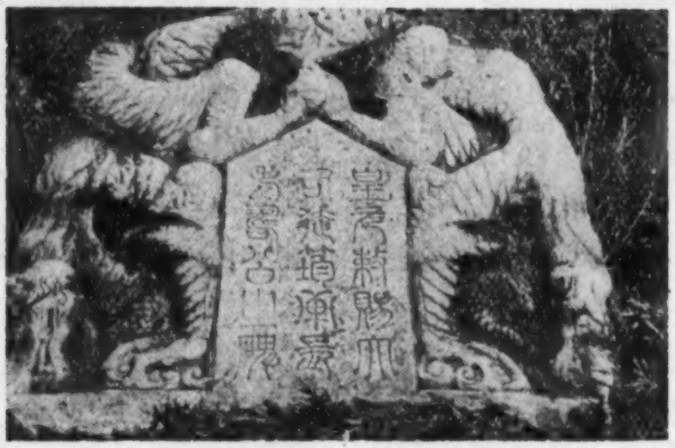
外城之內有內城，而且是这座古城的主要部分。其位置就东西距离来說，約略处在外城的中部；就南北距离来說，距北墻較近而距南墻較远。所占面积約成方形，南北长507米，东西寬457米。城墻高度在西北角約达7.7米，寬达6.7米。全部用磚筑成。

在內城南墻的中部有城門，現在它的建筑形势已經無从推測，只有一处缺口而已。西城墻的中間偏南一带，也有城門缺口的遺迹。东墻的城門遺址比較模糊。

內城的建筑物約可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組，在中部的北側，有一处长方形的大土台，南向，东西寬达160米，南北长达30米，高約7.8米。用

圖一　元上都內城南面断壁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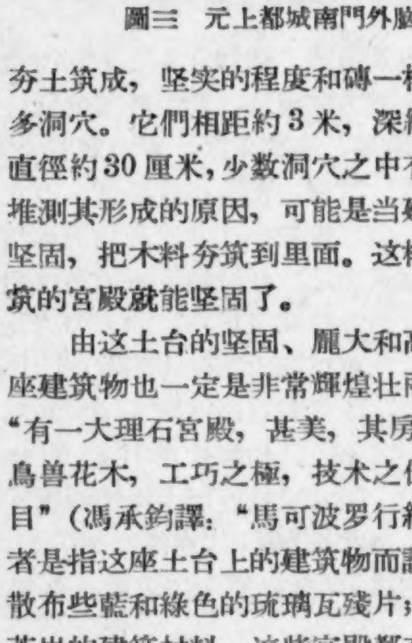
圖二　元上都宮殿遺址的中央东南部



圖三　元上都城南門外腦包前的碑首

夯土筑成，坚实的程度和磚一样。土台的側面有許多洞穴。它們相距約3米，深約5、6米不等，圓形，直徑約30厘米，少数洞穴之中有朽木碎屑（圖二）。推測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当建筑时，为求土台的坚固，把木料夯筑到里面。这样，在这土台上面建筑的宮殿就能坚固了。

由这土台的坚固、龐大和高来看，推知当年这座建筑物也一定是非常輝煌壮丽。馬可波罗所說：“有一大理石宮殿，甚美，其房舍內皆塗金，繪种种鳥兽花木，工巧之極，技术之佳，見之足以娛人心目”（馮承鈞譯：“馬可波罗行紀”上卷，277頁），或者是指这座土台上的建筑物而說的。现在土台上还散布些藍和綠色的琉璃瓦殘片；附近一带还散布石英岩的建筑材料。这些宮殿都有一定名称，在元史中有記載；另外，当然还有許多机关，像上都路总管府等也都要設在这里。因此，在內城內除了中間北部的宮殿遺址外，在东部和西部也有許多建筑遺址。



圖四　元上都宮殿前的石夯

在东部有建筑遺址七、八处；每处面积长寬各約三、四十米。地表散布許多磚瓦，还有些础石。分布情况以东北角遺址較多，东南角較少。西部的遺址較多，分为許多院落。其中面积較大的，东西寬达45米，南北长达35米，有的有圓形土堆，有的有方形土堆，各高二、三米不等。地表也散布了許多磚瓦殘片。建筑遺址的分布西北角和西南角相差不多。

調查期間曾观察当时建筑物的分布状况以及石刻器物的形制紋飾等等；也采集了一些陶瓷器物的殘片。因为这里草深砂厚，一般器物都遭埋沒，所以下面只把所得的很少的一点情况綜合加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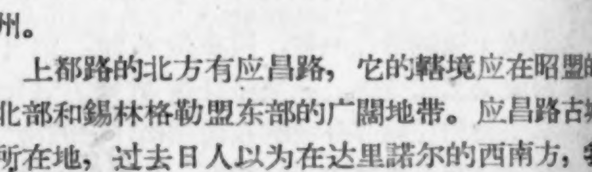
（一）陶器方面以磚瓦之类建筑用材居多。磚多用于內城城墻，有长方形、方形，一般無紋飾。瓦分筒瓦、板瓦。值得注意的是琉璃瓦，胎土紅褐，表面施以藍、綠或黃色釉。形状除平瓦和板瓦外，还有鴟尾殘片。其他日用陶器殘片所得数量不多。

（二）內城和外城都有瓷片散布。其中主要的是淡藍色或深藍色的均窑瓷片，底部不施釉，胎色黃褐，其他部分全有一層厚釉；另一种是龙泉窑的青瓷。形状以碗、盘和碟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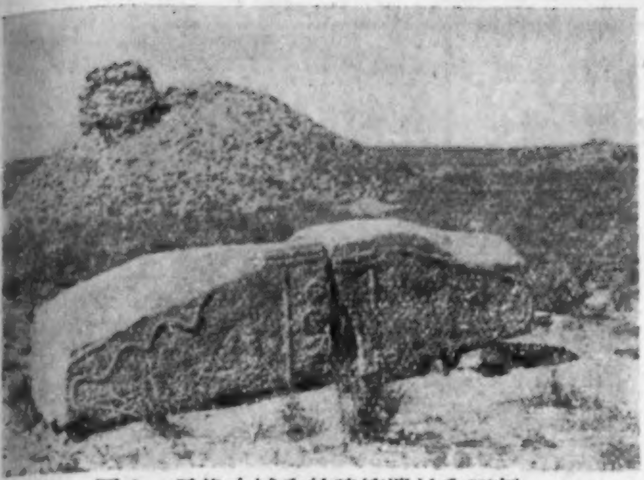
（三）在宮殿遺址之前曾見到石人一个，雕刻粗糙。南門外閃电河边有五个石腦包。乱石附近有許多石刻，其中有碑首一方，上刻螭紋，有額，銘文是“皇元敕賜大司徒筠軒长老寿公之碑”（圖三）。附近还有石兽和浮雕等。另在宮殿前方有打夯石一件，有孔，可能是当初夯筑土台时的用具（圖四）。

根据文献記載，上都路設在开平府，可知这座古城是开平府；它管轄順宁、兴州、松州、桓州和云州。

上都路的北方有应昌路，它的轄境应在昭盟的西北部和錫林格勒盟东部的广闊地带。应昌路古城的所在地，过去日人以为在达里諾尔的西南方，我們沒加調查，不明情况。不过，1956年秋季，曾在昭盟克什克騰旗西部的大王庙区發現元代古碑一座，文为：“应昌路曼陁山新建龙兴寺記”，共500多字，表示为天子祝福祝寿而建此寺，下署“泰定二年青龙在乙丑六月旣望立石”。按泰定二年是公元1325年。这塊碑是我們發現的一件有关应昌路的資料。



圖五　青　瓷　架



圖六　元代古城內的建筑遺址和石刻

二、平地泉行政区察右前旗土城子村古城

在平地泉行政区集宁市西南約30公里有土城子村，現屬察右前旗。村北为平原，东有山丘；村南約10公里有海子一处，蒙語称昂古里淖尔，即辽代时期的鴛鴦濼。辽代帝王曾一再来此漁猎。城北附近有边墙一处，东西方向，是何时遺物不明。

古城墻遺址位于村北，还很明显，土筑，分內外二城。外城的东方和西方都有小河，南流入海子，似乎是当年的护城河。它的面积，南北长約1,000米，东西寬約940米。內城位于外城的东北方，外城北墻的东部和东墻的北部与內城相接。

由地表所散布的文化遺物来看，当时古城內部和南部，都是住戶稠密，而且小工商業很發达，在外城的南門外有大道一条，通到海子的东西一带。在大道西側有寺庙遺迹。老乡在挖窖时，曾得到銅鈴二件，还完整，上鑄梵文字母，为宗教法器。庙南地面上有当时所遺灰烬一处，其中有坩鍋殘片，有銅渣鉄屑，是炼銅鉄的遺址。东門外大道旁，有紙厂所用槽碾和染坊所用碾布的扇形大石塊。

外城內部，在东側为圓形土堆，其上散布許多磚瓦殘片，还有些琉璃瓦殘片，应是寺庙遺址。在外城的西北部遍地有灰烬，常能从地下挖出焦結在一起的大塊煤灰渣。有时可得銅鏃。这里还出現过一些風匣爐灶上所用的爐盘殘片，上面布滿小孔。还有些皮球形的磚球，是風匣上阻隔爐灰的用具。还出現过带有流口的大鉄勺。这些情况說明了当时的冶炼規模很是可观。

內城东西寬650米，南北长750米。城內的东部和东南部，地面磚瓦陶瓷殘片相当稀落。在西部，情形大不相同，陶片瓷片散布很密，而且常从地下出土些完整的酱釉灯碗或酒杯之类。街道的遺迹很明显。老乡們在耕作时，常从地下發現炕洞子，上鋪石板，其下有洞，洞內有灰。房屋內部有木灰渣，有大瓮（水缸）及其他陶器、瓷器、鉄器等用具。有时發現的瓷器数量較一般住戶所需用者为多，或是一处銷售瓷器的店鋪。宋、元时代古錢常从地下出土。城門是南面有一門，北、东、西三面各有二門。北門內东側有小型土堆数处，其中有寺庙遺址。內城內部到处散布牛羊猪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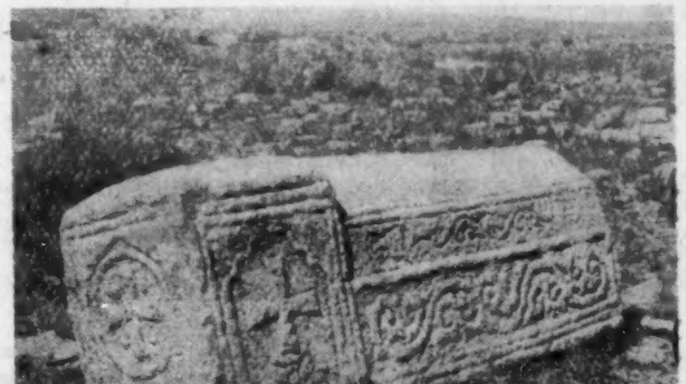
內城的中部偏北有方形圍墻一处，东西寬約57米，南北长約54米。墻高約3米，很明显。南墻有門，門內西側距南墻8.50米处，朝东建立石碑一座，上刻"集宁文宣王庙学碑"，說明当时此地是孔庙。碑身前后两面都有銘文。正面的銘文說明立碑在于表明朝廷"尊师重道"目的，下署"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春正月"等字。后面刻有捐資立碑人的姓氏，并有"集宁总管府"字样，可見这座古城是集宁总管府的所在地了。据元史地理志称："集宁路領县一，集宁"，也說明这就是集宁县。

古城內出土的器物很丰富。当地是农区，古城內部已經耕种多年，老乡們常在耕作时發現陶瓷器物。我們征集到的瓷器有："內府"白瓷高体小口大瓶、黑釉鷄腿瓶、酱釉騎兵俑、青瓷盘、青瓷碟、青瓷架（圖五）、青瓷罐、五彩瓷人头等；陶器有酒瓶和罐，数量較少；銅器有銅鈴、銅幣（有大元、至正等年号）、銅权、銅簪、銅印、棋子等。

三、烏兰察布盟达茂連合旗阿倫斯木的古城

阿倫斯木是蒙語許多庙的意思，在烏兰察布盟百灵庙东北約30公里，有古城一座。牧区的古城有一特点，即遍生蒿草，未經耕作，所以古城內的遺物比农業区容易保存。古城有城墻，南面墻址已很模糊，东西北三面比較明显。东北角所遺城址高4米。东西北三面城墻，正中有城門。城址长方形，东西寬約1,500步，南北长約800步。

古城內的建筑遺迹約有20余处，大小不同，分布地区偏重于中部和南部。每个建筑都在四周有



圖七　"十字紋"石刻

圖八 "武平县尉司印"

圍墻，长短高低不同，最高的不下1米；其中的建筑物遺迹高度可达3、4米，成圓形土堆（圖六）。建筑物遺迹的表面没有陶片或灰烬等物，而只有磚瓦殘片。瓦有灰色布紋筒瓦和綠色、黃色琉璃瓦，磚有长方形和正方形。另有础石，有的刻蓮瓣紋。少数遺址上还有石臼。

古城南部有建筑遺址一处，高約4米，土台，上有夯筑痕迹。四周寬約8米。土台西側放置碑首一件，刻螭紋，無文字。土台北部还有一建筑遺址，比較突出。其底座四周用花崗岩石板砌成，每側寬达9米，方向是北偏西45度，其上有素面础石。另有許多石刻遺物，是在花崗岩的長方形石塊上，在前端的正面和左右两面，刻成十字形花紋，而中段和后部左右两側刻成卷草花紋。前端成正方形，表面平坦；而中段和后部，表面成脊梁形（圖七）。在这遺址的西南和东南方約30米处各有殘磚一堆，是实心的圓形建筑，直徑約3米，可能是塔。如果不錯，便可以肯定这里是一处寺院遺址了。

古城北部建筑遺址的西側，有汉白玉碑首一塊，碑額刻"王傅德風堂記"，篆字两行，碑身已失。在黃奋生所著"百灵庙巡礼"一書中載有碑文。

在百灵庙的东方約100公里，有四子王旗城卜子乡古城，城墻遺址成方形，每面长約800米。城內有孔庙建筑遺址。城西北有古墓一座，墓前立石獅、石羊、石人等各一对。另發現大小銅板及銅印等物。这座古城文物丰富，也可能与凈州路有关。

四、昭盟宁城辽代中京大名城內的元代遺跡

1955年夏，昭烏达盟宁城县境內的辽代中京大名城內發現了一些元代文物。其中主要計有：

銅印一方，上刻"武平县尉司印"六字（圖八）。印方形，每边各长5.6厘米，厚1.3厘米；柄成長方形，高3.3厘米。在印的上面的左右两边，一边刻成"武平县尉司印"六字，另一边刻有"尙書省行部至元二年一月"等字。可見它是元印。根据元史記載，所謂"尉司"是以捕拿盗匪为职的官員。至于武平县的所在地，原来没有一定的說法，日人曾以为或在今阜新县境內。这次發現的这塊印，仍然不足以說明它的所在地，不过，确实証明了辽代的中京城內有些元代文物。

圖九 也里帖木兒祖塋碑文

古城內出土的另一件重要的元代文物是一塊墓碑，正面刻"宣武将軍益都路总管府达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奥魯总管府达魯花赤管內劝农事也里帖木兒祖塋"等字，背面刻八思巴文（圖九）。

这塊碑發現于古城西門外甕城內，可能是原来就埋在这个地方。它証明了在甕城附近一带，尤其它南方的丘陵地带，可能有些元代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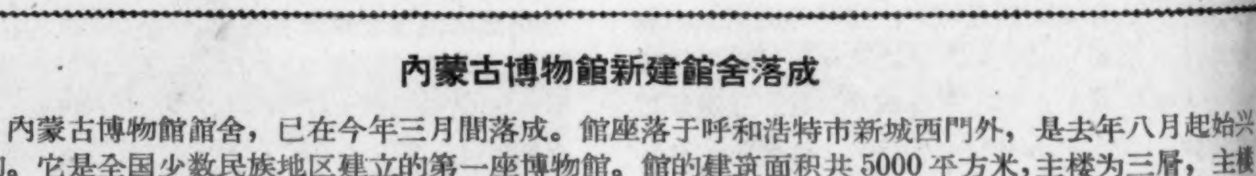
元代时，在东部地区設置了大宁和全宁两路。大宁路的所在地就是辽代的中京，称大宁县。大宁路統轄七县九州，除大定县外，其他不明。

（执笔人 汪宇平）

內蒙古博物館新建館舍落成

內蒙古博物館館舍，已在今年三月間落成。館座落于呼和浩特市新城西門外，是去年八月起始兴建的。它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館。館的建筑面积共5000平方米，主楼为三層，主楼两側为二層，陈列室占全部面积的60%，3000平方米。（圖为內蒙古博物館大楼正視展开圖）

今年五月一日內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紀念时，博物館将举办大規模展覽，总結內蒙十年內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社会主义建設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部展品将在月底布置完成，四月間預展，五月一日正式展出。（內蒙古文物工作組）



西藏的佛教艺術

刘艺斯

藏族同胞是祖国勤劳勇敢并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傳統的兄弟民族之一。在历史的發展过程中，創造了極为丰富多采的本民族文化艺术，是祖国文化艺术遺产中極为优秀的一部分。

藏族人民是信仰佛教的。远在第七世紀，从統一各部落为王的松贊岡布起到現在，1300多年来，劳动人民創造出：康藏高原上数以千計的大小寺庙建筑；用矿物質的顏料画在墻壁和布上的繪画；用石、木、泥、銅、銀、金等質料制出的雕刻品；以及多种多样的工艺美术和用简炼的刀法，表現出剛勁有力、極为精致的板画等各种艺术。这些皆是历代藏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結晶。在这些作品中都眞实的反映了生活，不仅成为历史、人物、故事的形象記載，而且还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

拉薩城是藏族佛教的中心，也是政治、經济、文化的首府。代表佛教文化和汉藏关系的首推該城的大昭寺，相傳是在唐朝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贊岡布在641年結婚后至650年这段时期修建的。寺庙大門的对面有公主柳，为他当时亲手所植，在柳的前面有甥舅同盟碑，系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貞藏王于762年与当时唐朝德宗皇帝所訂立的。寺庙的結构下大上小，內外主要干墻为花崗石造成，門窗戶格也下大上小，很是一致。寺庙的三至五層是平台，平台之上为木質結构的宮殿式建筑，宮殿的屋瓦及四周的裝飾浮雕、园雕等皆为銅質鍍金。一般寺庙的建筑形式；也是如此。如布达拉宮的下部为堡垒式，高达六至十五層，平台之上建有木質結构的宮殿六、七座，內部的經堂和画廊多达數百間，这是西藏建筑形式的最大特点。其他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崙布寺等的构造亦如此。

大昭寺內部二楼的古門及正殿前三面，有近二十根大木柱及斗栱，斗栱上有裸体或着衣的人物、天鵝、牛、羊、鳥兽等造型的浮雕，作品多而精，在刻画形像上除表現得生动逼眞外，在刀法上也是非常精簡和老炼，可看出其造詣之高，堪称古代第一流的作品。四周走廊分內外墻两道，各有大壁画，在画中描写了釋迦牟尼佛及宗喀巴等的傳記故事，以及历代帝王大师的肖像画。其中有相当大的作品六、七幅，和唐代汉画的单綫平塗的作風極相似。可惜已被长久岁月日夜不停的香火、油烟所侵染而变黑發光。兼之历代画工受命重画不只一次，原样早已不存了。但在有些地方还可看出一些来龙去脉。如"賢劫千佛的父母"中的一部分壁画，尙可察出受唐的繪画色彩、勾綫的影响。寺內三楼以上，有六座宮殿式的建筑，非常雄伟和华丽。在各种質料的浮雕、园雕、卷画等艺术中，都可看到汉藏文化交流的痕迹。这个寺庙也可說是汉藏民族在唐代时文化交流的标志。

公元960——1279年，由于教派之爭，社会处在分裂局面，生产力受到了破坏，又受經济物質条件的限制，从整体上說艺术的發展不够旺盛。但是据遺留至今的遺产，哲公寺的一部分人物画来看，也还是有局部的發展，在构圖、設色、勾綫各方面，受汉画的影响仍是濃厚。西藏的画家說："这是汉式画"。实际是傾向汉画作風而富有民族特色的。

作于公元1277——1367年元朝这个时代的，江孜班根曲登寺的"十六尊者"的雕塑，在造型方面是写实的，用刀的表現方法上与唐宋一部分雕塑有相同之处。

公元1368—1643年，由于元末明初各部爭夺政权，战爭时起，兵戈不休，燒毁了寺庙。但当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在明代初年入藏后，开始政教合一，各方面均有很大的革兴，建立了三大寺和扎什崙布寺等若干个大寺庙，在建筑上的創造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繼寺庙的兴建和扩充，繪画、雕塑、工艺美术等一切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普遍的發展了，这是西藏民族艺术光辉的一代。

公元1644——1911年，清朝这段时期中，顺治皇帝曾派蒙古亲王"固始汉"去西藏支持第五輩达賴掌握政权，当黃教掌握政权，成立眞正"政教合一"統一的集权政府时，生产力也因而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發展了，扩建三大寺，重建布达拉宮，1645年开始修建和裝飾內部，經历五十余年之久方告完成。据五輩达賴自傳中說："布达拉宮的壁画系1648年才开始的，集中了画家66个，經十余年

才完成”。

1649 和 1668 年有两个技术高超的画家所作的几百件作品中，以“固始汉与第巴桑吉”和“朝見五輩达賴”等作品最好。其他画中仍以經典傳記为主要根据，一切作品用俯視的方法去画，用色用綫，傾向汉画風格很重。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朵噶彭錯饒杰說：“以往西藏的艺术方面，絕大部分都是以汉族艺术为样本，吸取精华，再以加工而成的”。

西藏民族各代的佛教艺术，都呈現出汉藏文化交流的姻緣关系，尤其近三百年来更为突出。首先是在金碧輝煌、雄偉华丽的各大寺庙的建筑艺术上，更明显的表現了这一点。

藏族人民的佛教艺术的兴盛和衰落，也是随着历代宗教和社会的盛衰来决定的。从唐、宋、元、明、清各代寺庙存留下来的遺产上看，西藏的佛教艺术是一步步往前發展，唐至元系着重点的發展，明至清則由点扩至面了，也是藏族佛教艺术極盛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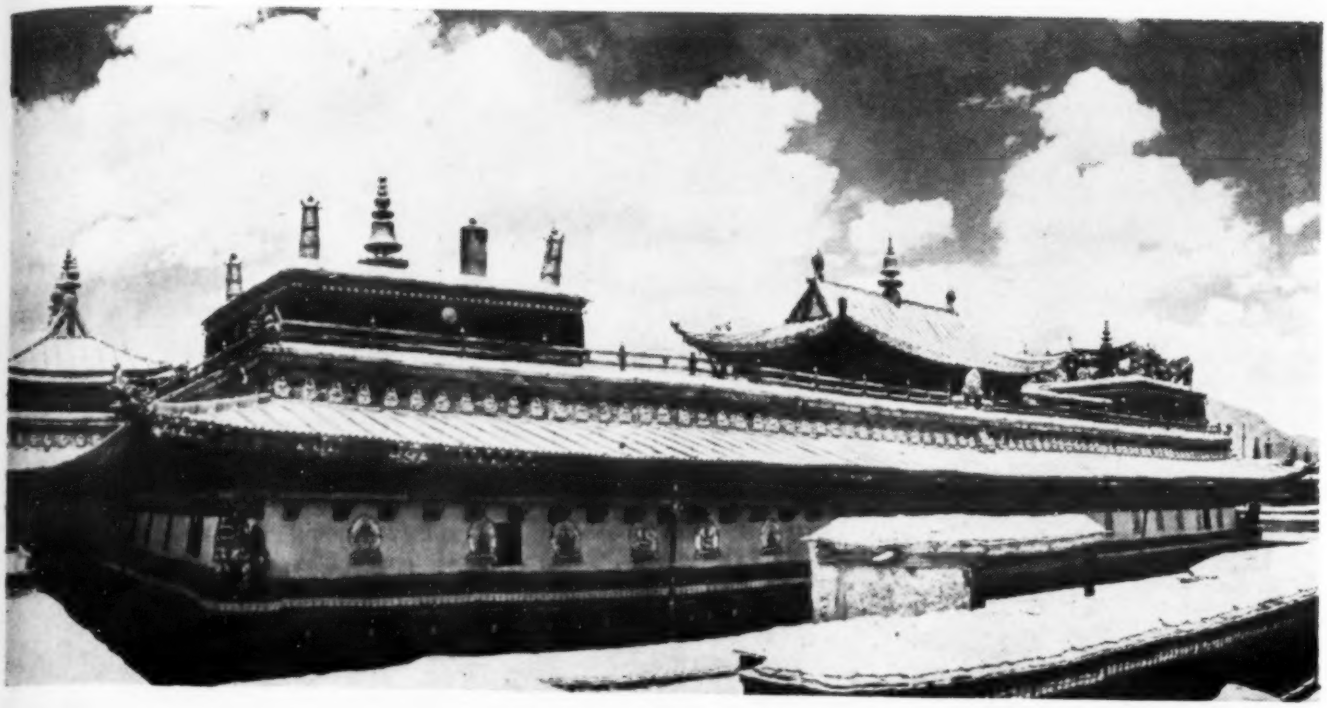
西藏民族各代的画家，由于信仰宗教，是以宗教服务的傳統思想为依归和承受师傅，以临摹为能事。这就限入狹隘圈子里，因而不免是以教条、公式的方法去处理人物和故事的构圖和造型。这样的作品和作者，历代以来是为数不少的。但傾向写实，主題明确，各代皆然，以明清为最，这是極为可貴的。这些画家的特点是根据主題来决定布局，所描繪的人物和背景方面，按其需要来决定大小、輕重、远近，各有不同的变化。构圖有虛实均衡和緊湊，而不是全部对称。如哲公寺的卷画中所描写的“佛”与“王”，作者掌握了“庄严穆肃”的佛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恰如其份，达到技巧的老練和成功，有吸引人的感染力。如“滾却仁拉傳記中的汉王”等幅作品，是受汉繪画的影响較濃厚的，又如夏魯寺的“献礼”、“舞伎”及“胜乐十六天女”等，是接受印度、尼泊尔外来影响較濃的作品，都是傾向写实。其中“舞伎”的舞蹈姑娘等主体人物和左右奏乐者的性格，表現得栩栩如生，使观者不仅看到那輕松愉快的舞姿，仿佛还听到那动人心弦的琴声，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藏族人民的傳統繪画，在构圖造型上有一特点，就是任何人物或故事的繪画，都把主要人物排在正中，占每幅画的最大面积，有关人物的故事其他部分則排在上下左右成对称的样子，一切人物动物和背景都画得較小，衬托出主体人物菩薩的庄严与神聖不可犯的形态。一切布局为平面，且用俯視透視去造型，写实写意，兼备应用，尤在色彩上多用单色、間色、大紅、大綠及金色作画，自由配合，巧妙的大胆应用，不調合中求得合諧与統一，显出热烈明快，金碧輝煌，非常华丽。这种色調是与藏族人民所固有的英勇、坚强、热情、活潑、大方与智慧等特点协調一致的。这是西藏艺术的又一大特色。

大昭寺正殿大門左右两幅壁画，画的是釋迦牟尼佛和巷道壁上的赤松德貞等，每幅的构圖上总是佛像居正中，上下左右四方为侍奉的信徒和宮女在敬献的場面，男女老少都有，人物身份的次序上皆有前后大小适当的布置，背景以装飾性的构圖組成。在刻画釋迦牟尼佛和赤松德貞这样的主要人物都是根据宗教繪画，描写形象傳記的法則去表現的。如佛、王、菩薩的相貌要庄严穆肃，形体較大，面部的标准形式成四方形，其輪廓綫条細銳有力，达到容光巍巍的風度。在侍奉的宮女方面，也注意了均衡的美，而且要表現嫵媚輕盈和秀丽端正的姿态。在头髮上，表現出青色群螺的式样，并按身份性格决定其裝飾，达到娟娟秀色的效果。画家是下了一番工夫去刻画的，他对人物的造型和色彩，虽不采用强烈的明暗渲染而用单綫平塗法，就已能充分表現佛、王及女性等各种性格及不同的肌膚的圓潤光澤。运用簡炼的綫条，在八、九尺高的人物上，勾出肯定的形，却沒有因此而把形体与环境割裂开来，笔气如流水急風的貫徹到底，显出剛勁有力，而且調和与統一。从壁画上看出，虽被各代重画不只一次及被烟火侵染發光，但在造形用笔各方面，亦可察出原有气势和情調与工力。如色彩热烈，笔法老炼而精簡，衣紋勾綫有魄力，有起落、輕重、变化。虽無陰影与烘托，但深厚古雅，富有装飾趣味，尤在色調上或多或少类似唐代作風。

这些都說明，西藏最早的画家，已經不是在渺茫中去摸索，而是已經受过严格鍛炼的具有相当素养的艺术家了。

西藏佛教艺术这样高度的發展，是和当时的佛教盛極一时并与汉文化艺术的交流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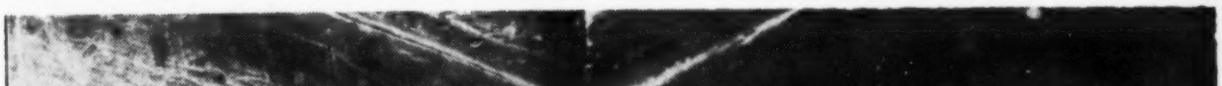
日喀則班禪行宮德庆波章里，有一壁画高四尺，寬一丈，主題系描写“八思巴朝忽必烈元世祖朝庭”去蒙古的一个場面。所画八思巴乘皇轎及其部屬官兵，前呼后拥，威風凛凛，声势浩大的馬队，将到达目的地时，有元朝所派大員持哈达前来迎接，服装道具和風俗習慣，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各方面系按身份地位去刻画的。以山水树木和牛羊駱駝成群的牧区作为背景，一切皆为草原風光的眞实写照，这种題材和內部情节的刻画表現，可知作者有極深的生活体会，表現方法上与其他傳統的繪画也有極大的区别，但与汉画相近。作者借用了这个历史反映出社会的各个阶層各个方面，从統治者到所謂



拉薩大昭寺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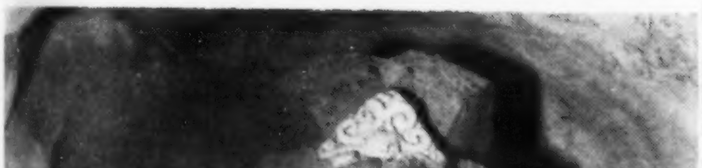
大昭寺廊簷

大昭寺屋簷裝飾——獅身人面(泥塑半圓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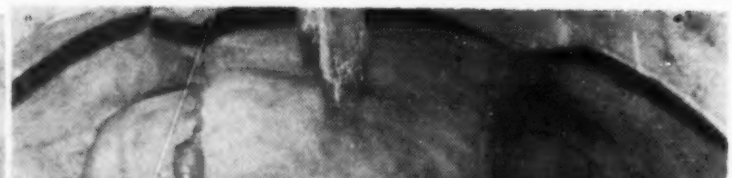


大 昭 寺 斗 栱 之 一(木質浮雕)

藏王松赞冈布塑像 唐 布达拉宫



文成公主塑像 唐 布达拉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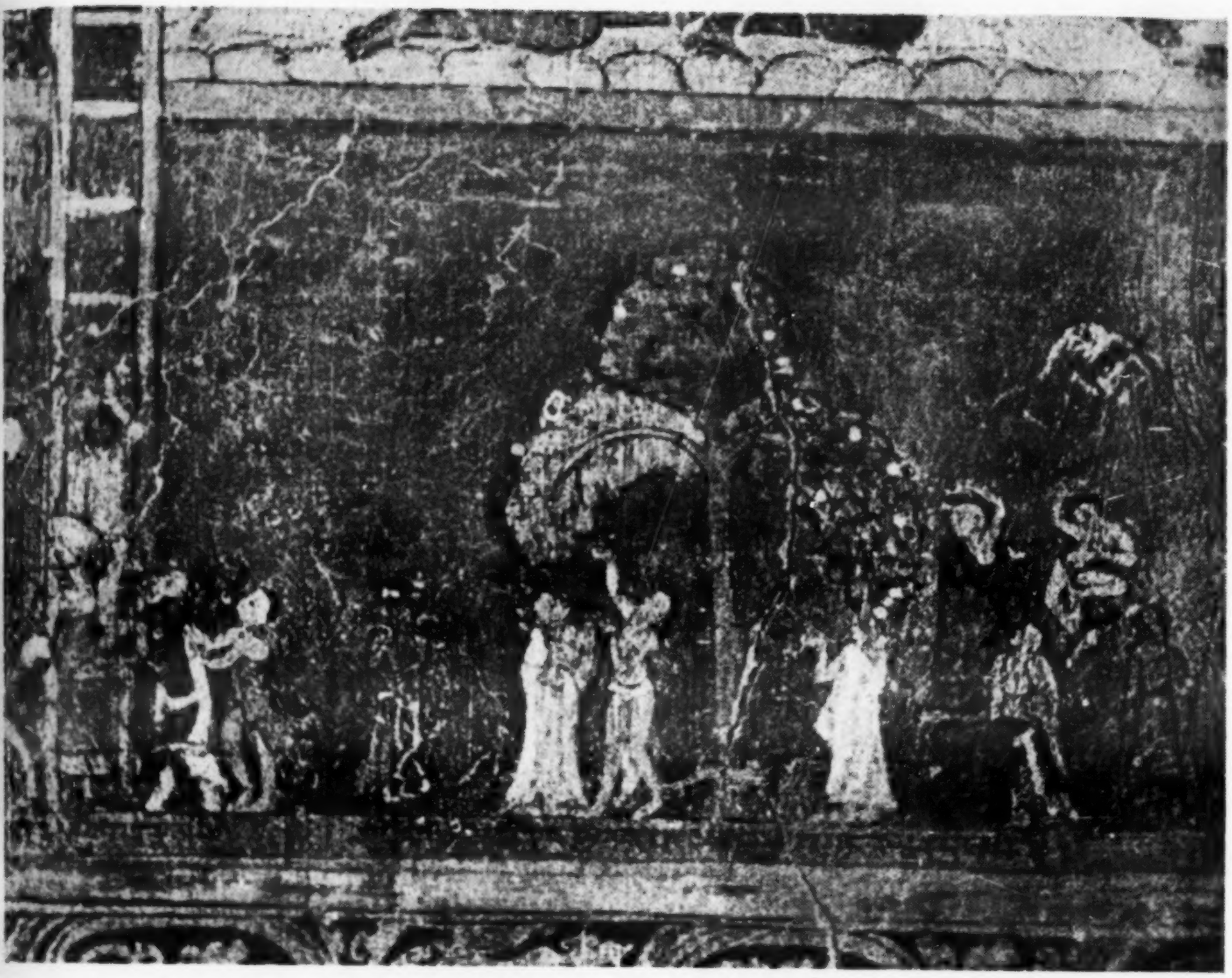
尼泊尔公主塑像 唐 布达拉宫

色拉寺文殊菩薩(銅雕)　明

拉薩小昭寺銅質浮雕釋迦太子乘駒赴清淨塔出家　唐

后藏拉当寺弥勒佛(銅雕)　宋
高 170、寬 60 厘米

哲公寺智明佛母(銅雕)　宋
高 40、寬 30 厘米



壁画　释迦牟尼诞生　拉薩察絨藏复制品

后藏夏魯寺壁画　舞伎　宋

后藏夏鲁寺壁画　群神供养　宋

拉当寺卷軸画 滚嘎吉澤 宋 长150、寬126厘米

唐壁画　無量寿佛右半部
拉薩察絨藏复制品

卷画　白度母　宋　长 90、寬 60 厘米
拉薩察絨藏

"藏民"的眞实面貌。可以看出画家通过現实主义的手法，在上幅壁画的結构中，把各种形象和多样的情节綜合表現在一个画面上。运用热烈又朴素的色調，熟練地掌握了綫的勾描，色彩的支配。对人物形象的表現，画面的組成，已从单純的对称的圈子跳出，逐渐發展到复杂而有条理，且具有虛实均衡的构圖。我們看到这幅壁画，就感到充滿着生命和旋律，給人以振奋的情緒，被那种亲切的神态所吸引。从这幅中可以看出画家極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新風格。說明他不是避居山林的隱士和厭恶人世的苦行者。作者反映了那时藏族与元朝礼尚往来的亲密团結和民族友誼的历史，是現实主义的成功的代表作品。

西藏的雕刻艺术，首推大昭寺簡炼生动的木質浮雕。布达拉宫里聪慧賢淑的文成公主像，夏拉寺的剛毅勇敢的蓮花生及無量寿佛，系唐代泥塑园雕，亦为杰出作品。江孜班根曲登塔的弥勒佛及班根寺的面含淺笑和藹近人的十六尊者，深思苦虑表情的十六尊者等，为明代有代表性的雕塑。

以上各个寺庙的时代，作者虽不同，但作風写实是一致的。那些雕塑在表現手法上与一般塑造方法不同，它打破了普通神像的平板作風，擺脫了一般按照固定規格塑造佛像等的限制，通过宗教題材表現了人性的特点和生活的特点，反映了現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思想感情。各种佛、喇嘛、罗汉"尊者"的情緒，有爱有恨，有悲伤也有快乐，有表現剛毅勇敢的，有表現謹愼沉着和乐观的，种种性格的心理状态都刻画出来。在造型上和解剖透視方面亦合原理，这都說明各代作者观察生活細致而深入，方可能有这样的效果。这些無名的雕刻家，繼承了雕刻艺术的优秀傳統，創造了藏族艺术的新風格。这些作品，艺术風格虽各不同，但是朴实、生动、富于变化是相同的。从創作方法上說，也是眞实深刻而又卓越的艺术創作方法。

藏族人民的佛教艺术，并不排斥外来影响，而且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但始終鮮明地具有自己独特艺术的風格。

上海博物館举办"从廢銅中搶救文物展覽"

上海博物館从上海冶炼厂廢銅中檢选文物的工作，在厂行政的支持和工人們的經常协助下，获得了一定的成績。1956 年內檢选出的銅器，計有一千一百余件，包括自殷商以迄明清时代的文物，造型有的非常精美。檢出的銅器有些已在館內陈列。

这項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在进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如：1.在进行工作时，由于厂管理部門內有个别同志不够重視，使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2.厂揀銅工人中有部分人对这工作不够关心，有漏撿情况，以致仍有时造成損失；3.有少数工人用講条件的态度（要奖品）对待这項工作。

为了使厂的职工認識保护祖国文化遺产的重要意义，使今后工作能够順利进行，上海博物館最近到厂举办了一个"从廢銅中搶救文物展覽"。

展覽的目的和要求是：1.把一年来在該厂所得到的收获，作一总括性的展出，作为向該厂的一項彙报工作，同时讓該厂全体职工們看了后，了解廢銅中的丰富文物蘊藏，从而引起重視，鼓励全体工人关心保护文物工作，在今后积極主动地协助此項工作；2.使全体工人認識祖国文化遺产的偉大和可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对保护文物工作有正确的工作态度；3.通过展出，使工人对文物与非文物的区别上有初步的認識，从而使保护工作得到具体的协助。

展覽內容与方法是：将一年內撿选出的文物选擇有代表性与較精美的65件，攝制成6寸或8寸的照片，加以簡单說明，如名称、时代（包括距今多少年）、用途等展出，另外将撿选出的文物挑出部份完整的以及原来破碎經过修复的附以說明展出。

展出布置是以不妨碍該厂生产及精簡节約为原则，利用該厂飯庁前的露天空地，悬挂准备好的标題、圖片及横幅，利用方桌搭成长条形，排列了各类的銅器实物。又配合了两位管理兼講解的同志，随时解答一些工人們提出的問題。

展出后的反映和效果良好。一位副厂长在看过后表示"今后更須加强对这工作的重視"。有些工人表示："今后我們要更好的帮助你們撿选出好东西来"。有些工人說："原来一年內有这么大的成績，眞值得我們繼續努力"。这些反映，說明了展覽工作是做好保护工作的一环，而保护文物的主要关鍵是：1.要經常做宣傳工作；2.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把这項搶救文物工作做得深入徹底。　（徐孝穆）

記劍川石窟

宋伯胤

石鐘山是石宝山的一个支峰，屬老君山脉，橫亘于云南劍川县的西南沙溪一带。明滇人李元陽的“中溪家傳彙稿”中称石鐘山为“中山”。乾隆元年(1736)甘調元在石鐘寺設館教学，曾刻过一首詩，詩里也說，“假館中山”。现在住在这一带地方的白族人民，称石鐘山为“濤信子”(Wun˥ Sin˥ Ts˪v)，意即中山。

关于石鐘山的石刻，康熙“劍川州志”（王世貴撰）卷二里說：

“鐘山，石宝山南。其中有石龕、石佛、石獅、石虎、牛、馬”。

同書卷十七，又說：

“鐘山石佛在治西南五十里。山中有石如鐘形，名曰鐘山。崖石錯落，有石人石兽之形。精巧玲瓏，工于雕琢，間有断指，百窍皆空”。

志書里給我們的材料只有这一点。徐宏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游旅滇西北时，曾經到过石宝山，但因走錯了路，把石鐘寺忽略过了。他在“滇游日記”里記下当时的情形：

“从岭南行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級，穿門踏蹲，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鐘山也”。（“徐霞客游記”卷七）

李元陽“石宝山記”对石窟有較詳細記載：

“劍川石宝山，緣崖多石像，有观音，有諸菩薩、石罗汉，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处，又皆空洞如乏骨，乃知其为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复辨别，莫究端倪。……嘉靖庚寅予与成都修撰升庵楊公愼来游，……樵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罗汉以百計，榛塞不能入。”

三十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李元陽重游石宝山，才看到“波斯国人”：

“……車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人，虽出人为，然亦前代工也。”

“劍川地理略考”是一个無作者姓名的抄本，似为近代人写的乡土教材一类的东西。其中关于石鐘山的石刻，肯定地指出：

“其中石鐘寺，唐代石刻頗多。有圖騰时代之生殖器石刻，以至开天辟地之神像。唐代大理国王閣罗鳳、异牟寻等壁像。工艺精巧，頗为考古家之癖好。”

这种意見的根据是什么，还没有考察出来，不过把閣罗鳳这个名字和石刻联系在一起来叙述。楊愼“云南山川志”（函海本）：

“方丈山在鶴庆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测，水滴岩下，如方响音。昔蒙閣罗鳳琢观音像于壁，故又名观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劍川石刻中有“南詔王子”，并且能确切知道那一个是“南詔王子閣罗鳳”，那一个是“异牟寻”，在甸头禾和沙溪的广大群众的傳說中是很熟悉的，这一点也值得我們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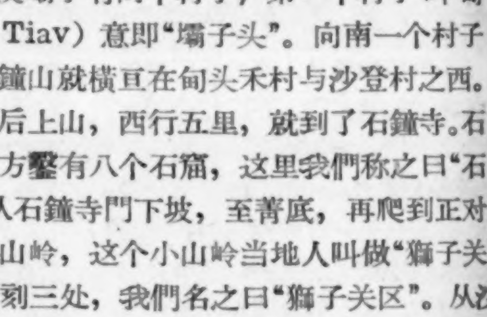
石鐘山的石刻，以它分布的地点看，可以分做三个地区：石鐘寺区、獅子关区、沙登村区。现在我們首先談談这三个地区的地理上的关系。

沙溪壩子有两个村子，第一个村子叫甸头禾（Ta˪ Tiav）意即“壩子头”。向南一个村子叫沙登。石鐘山就橫亘在甸头禾村与沙登村之西。从甸头禾村后上山，西行五里，就到了石鐘寺。石鐘寺側，后方鑿有八个石窟，这里我們称之曰“石鐘寺区”。从石鐘寺門下坡，至箐底，再爬到正对石鐘寺的小山岭，这个小山岭当地人叫做“獅子关”，这里有石刻三处，我們名之曰“獅子关区”。从沙登村西行，沿着两个小山岭的两旁，有石刻四处，名之曰“沙登村区”。顺着沙登村西的深箐向北走，可以到石鐘寺門口。据說，这是通向石鐘寺的一条古道。我們曾經向这条“古道”探索过，結果發現有用石条鋪成的小桥两处。因为箐深草密，無法前进，只好中途停止了。

（一）石鐘寺区

石鐘寺区共有八窟。編号次序見示意圖。

第一窟：窟高 1.34 米，寬 1.70 米。窟正中雕



一“王者”坐像。坐像左近側雕侍者像二人，右近側雕三人，左、右前側各雕文吏一人。座前雕一人，共計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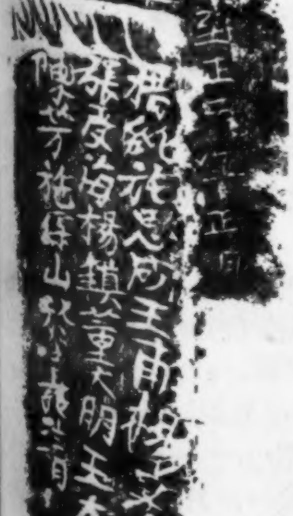
这个窟的外檐，雕成三重。窟門作圓拱形，門周用連珠紋圍成，两側画出磚砌的样子。窟內雕一平座。九个人像就安置在这个座上。平座没有什么装飾，仅前方有后人随意刻划的字迹两处：一处横刻“山高水长”四字，一处直刻：“隆德（？）七年宾川人李成德游此”。

“王者”着圓領，寬袖，偏襟長袍，袖手坐在一椅上。椅背上部刻作椭圓状，两端伸出龙头。椅后树一屏障，屏障周圍用陰綫刻出叶状紋。像前雕一童子盘足坐云座上，右手举一蓮座，座上中間陈設的似为一爐，其左葡萄一盘，其右桃子一盘。

“王者”左近側一侍者像。双手捧一盒状物。身微前傾。他的身后，站一人，手持巾状物。右手执一藤杖，約两人高，杖头鑲有蓮瓣形的罐状物。右近側一人左手执一劍，右手上举至肩部，紧握着卷简册一类的东西。他的身后站一人，左手前伸，紧握着一件壶形的器物。这件壶形器口部侈張、細頸、下腹肥大，底部有蓮瓣紋。右手上举二物，一件是椭圓形的短把扇状物，一件是麈尾。其右側雕一人，双手抱一曲首長劍，劍的曲首部份雕成兽头，鞘上也雕着一道道直綫紋。

王者像的左、右前側，相对地雕文吏坐像各一，状甚严肃。

窟內王者像左側有題榜二，右側有題榜一，均作長方形。其中左側正面一个的外周陰綫雕出卷云紋。榜內都没有刻字，仅左側文吏上方一个題榜內，有墨笔書写的字迹，現在隐約可見。“……开光（？）永年”四字。右側窟壁上，有人用墨笔草書“永历戊戌……”等字。（按永历戊戌即永历十三年，公元1658年）



石鐘寺第五窟左壁外元人題字

第二窟：窟高1.37米。窟的外檐亦雕作三重：第一重雕瓣状花紋，第二重雕連珠紋，第三重雕垂幛紋。其下雕出半卷的幛幔。窟門两側周边和第一窟一样，亦雕着連珠紋。

窟內雕一石座，座上置一椅，椅背上雕有靠墊，椅两端雕二龙首。椅后列有屏障。屏周雕連珠紋，中間相对地雕着連續的弓形紋和日月圖象。屏上窟壁上，雕一四爪龙端立云际，状甚生动。椅前雕一獅一虎，相背蹲伏。王者坐椅上，袍服与第一窟相同，只是冠上的装飾更見华丽和“張胜温画卷”中的“利貞皇帝瞟信画”的“龙冠”（見圖二十五）完全相同。同样地他們的帽带也都是系在頸下，可惜王者像的面部已部份損坏了。

王者像的左側雕有六人：站在最前列，靠近王者的一人，头部已毁，左手握劍，右手置胸前，似持一物。他的身后右方，站一童子，左手抱一劍。童子身后一人，靠近屏障，右手执羽葆。羽葆的样式和前面提到的画卷上的也極相似。他的左側，雕着三个武士，均执大旗。

右側雕有七人：靠近屏障处一人手执羽葆。二武士执旗。前方靠近王者像的地方雕一人，头部亦毁，右手持一長劍，左手把綬带上。他的背后雕一人，手持一物，已毁。右后方雕一坐像，左手执念珠一串，右手作数珠状，头部亦被毁。坐像背后雕一伞。傍有一人，側身前行，双手捧一長頸瓶状物，瓶底雕蓮瓣座。

王者像的左右前側，和第一窟一样，也相对地雕着文吏坐像。面部均毁。

窟外右側崖上，鑿有題榜，似曾刻有字迹，但已模糊得不能辨認，隐約可見的只有一个“當”字。

第三窟：窟高1.49米，寬1.19米，雕佛像一尊趺坐蓮座上，两足踏二小蓮座，有七星圓形佛光，上有黑、白、紅三色彩繪痕迹。

佛光左側窟壁有后人題字两处：一处墨笔写：“宣光三年三月十五日，□蒙鎮撫□知事□实到此”（按：宣光系北元年号，三年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处墨笔写：“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大理□朱福順到此”（按：至元六年，一系惠宗年号，即公元1340年，一系世祖年号，当南宋咸淳五年，即公元1269年，未知孰是）。

第四窟：窟高2.25米，寬2.01米，雕坐佛一尊，身稍前傾，偏袒右肩，赤足，踏二蓮座。背有佛光。左側佛光已全部雕成，右側部份用墨笔繪出，尚未开雕。墨迹犹历历可辨。

佛光左右雕阿难、迦叶二身。阿难面部，用墨笔繪出眉目，尚未雕。其前雕文殊、普賢菩薩。右側文殊菩薩趺坐蓮座，座置象身上。一童子赤足在象后側，双手执一棒状物，高举至象耳部，身稍前屈，作随象前进的样子。象額部及蓮座前部均毁。

石鐘寺第六窟柱中部装飾

左側普賢菩薩仅胸部以上完整，其下均被毁。

第五窟：窟下雕一座，高0.518米，两隅雕二力士，举手扶座，一足下踏至地，一足后跪，看起来好像是不胜重負似的。手足都有筋肉暴起的感觉，面部已模糊不清。

窟的两側雕二圓柱，伏蓮柱础，柱中央雕仰伏蓮。柱頂雕云头，布置得很規矩。額枋上架斗栱。右柱外側后方刻有"至正元年正月"六字，接着又刻："楊純、施思成、王甫、楊×、許、張受海、楊鎭、董大明、王大、陈芳、施保（？）山嘉清"等字。

窟內后壁，鑿成山岩状，上方雕出日、月、云朵，山崖上雕有小徑，有佛龕，有塔，有持杖的長者，有抱琴的乐师，有步行上山的樵夫，有入山修道的苦行者，有童子，有仙鶴，有猴子等等。正中列一巨石，一罗汉趺坐石上，右手置胸前，左手执扇。衣服原是着色的，現在还可隐約看到一些紅色斑点。

罗汉像的前左側雕一石座，一人着草鞋，左足置右膝上，左手前伸，握書閲讀，可惜上半身全毁了。前右側亦雕一人端坐石座上，上半身也被毁。这个窟的左、右两柱外側，各雕一小窟。

左側小窟（圖十）作圓拱状，正中雕菩薩像。左右雕二供养人。佛光右側窟壁上用粉写藏文一行，即"唵阿吽"三字。右側小窟正中雕菩薩像，右手捧鉢，左手执楊柳，左右二供养人，上身均毁。

第六窟：窟長11.636米。窟后壁鑿方柱六，界为五間。柱高2.226米。素柱础，柱中部距柱础0.899米处，雕有花紋。右起第一、二、六柱上的这种花紋还未雕出。柱头施額枋斗栱，坐斗雕作蓮瓣。有的只是把蓮瓣画出，还没有开雕。

正中第三、第四柱之間，后壁鑿成圓拱形。雕釋迦佛一尊，左右雕阿难迦叶二身立像，均尚完整。佛光左右側有二題榜，墨笔写"是無上咒是無等咒"、"泛淡祥光泛淡慈光"。左右四間，分雕八大明王，現在可以看見的題榜有"大聖西北方大笑明王"、"大聖西方馬头明王"、"大聖西南方大輪明王"、"大聖南方無能胜明王"、"大聖北方步擲明王"、"大聖东北方不动尊明王"等，均为后人所写。八大明王殘缺处甚多，有用石灰修补痕迹。

八大明王的左右两側，雕多聞天王、增長天王像。像高1.77米，亦有用石灰修补痕迹。

以上除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二像外，均被雕在一長石座上。座高1.40米，分做三層。底層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方柱，格子里浮雕龙、虎、牛等动物（圖十三）。中間一層亦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圓柱，每格內作壺門，中間雕花瓣，其上雕仰蓮，最上一層雕卷云紋。

另外，这个窟內还有許多題字；"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馬文彬到此"、"浪詔馬泰来于永历壬辰岁游書"（圖十二）、"鶴川知府口师永乐七年高保"等和梵文題字一行。这个窟外盖有瓦房。

第七窟：窟長12.05米。雕菩薩坐像，高1.52米，左手捧鉢置膝上，右手上举，似执一物，因毁不可辨認。胸前被挖小長方形洞。座高0.884米，分作两層，下層鑿成長方形格子，界以竖鈴形柱，上層雕成蓮华座。左右雕二供养人，高1.525米，左立的双手捧一瓶，右立的捧一盒。均尚完整。

佛光右上側窟壁有粉書藏文五行（圖十六）。

窟極西端，靠近第六窟外墻附近有殘石柱一。柱础作蓮瓣，柱高1.525米，中部被打剝掉。距此殘柱东0.64米处，又殘存一石柱础。附近窟壁上刻有"永乐丙申年重造"、"天下第一福地"等字。

第八窟：分做上、下两層。上層鑿四窟，窟門均作圓拱形。正中一窟高0.915米，寬0.64米，深0.7米。窟中雕一仰蓮座，前部剝損。座上雕一椎状物，椎状物与窟壁相接处的两側，留有很清楚的鑿痕。正面中間鑿一深槽，被人手摸得很光滑。深槽两側有一道一道的打鑿痕迹，（圖十八）。这个雕品，傳是"女生殖器"。据我观察，虽不敢肯定不是，但有两点怀疑：第一，它不是原来就雕成的，很可能是蓮座上的雕物被人打鑿掉以后的結果；第二，若果它是原来雕成的一个極有意义的崇拜物，那末为什么要把崇拜物雕得这样粗糙，把崇拜物的座子、石窟两壁以及窟外的装飾又雕得那样細致，这是不可理解的。

这个窟內左、右两側壁上，平雕釋迦佛像二尊，佛光两側題榜都没有刻字。

窟門外上方雕一長方形空額。額周雕着十分美丽的花紋。額上有用墨笔写的字迹，字很恭整。隐約可見字凡九行，可以認識的是：

"盛德四年作口巳口口八月三日記
子……望口元盡后……
……福田無……窮……於……万……
……上口帝……天王……言
……其造像口
……师……仏……情
……渡回……

……遺兰”

盛德系大理国国王段智兴的年号。四年当为己亥，即公元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这比大理国描工張胜温繪的“画卷”还要早一年（按画卷作于盛德五年）。这个發現是这次調查中的一个重大收获。現在这九行題字的上面，有后人刻的“西天(?)”二字。

这个窟的右側窟內，雕一天王像，面、手均毁。左側二窟，一雕天王像，面、手亦毁。另一窟正中雕佛一尊。有二題榜亦未雕。

下層鑿五窟，偏西一窟較小，雕一塔。其右一窟，雕文吏模样的坐像。面、手均毁。再右一窟雕一人側身坐，左足盘右膝上，手中似执一物，上半身毁。再右一窟雕佛一尊，趺坐蓮华座上，头部毁。最东一窟雕一人正襟危坐，足、头部毁。

石鐘寺区八窟的內容大致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地区內，我們还有一个新的發現。前面說过，石鐘寺后有一巨石形如鐘，它的东側就是第一窟。我們从第二窟前的杂草野树中繞到巨石的西側，就發現巨石的西側也被开鑿成一个長方窟的規模，爬上这个長方窟，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窟的后壁上并排地画着五个立像。这五个立像的服飾全是一个样式：头戴方形帽，帽后飄带下垂及地，双手置胸前，好像捧着一件什么东西。足着長靴，身后有佛光，面部模糊。身周繪有六个圓餅，其中有两塊隐約看出写着“春”和“西”字。画像用色鮮明，現在还可看出有紅、藍、白三种顏色。

此外，这一地区內还有明、清人題詩数处，与研究石窟历史艺术关系不大，不在此抄录了。

（二）獅子关区

獅子关区有石刻三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調查所發現的一个新石窟（圖十九）。

七月五日，我們在沙溪調查工作告一段落，晚上开座談会，会上，农会会長說獅子关过来还有一个石窟，他上山打柴常常看到。于是我們就中止了行期，第二天一早跟他再爬上山去。在离开獅子关南去約二十步的半山腰里，鑿有一个石窟，窟上复一巨石作簷，窟前鑿有1.5米的台阶，下面就是絕壁。因为过去到过这个窟的人很少，所以它的附近全長着一人多高的小树杂草，若果没人引导很难發現。

这个窟長1.235米，高0.595米，它的位置正对着石鐘寺。

窟內雕一長座，座后列一屏障，屏障上繪紅、綠色帳幔，中間留有高19厘米、長20厘米的題榜，刻字四行：

“大聖理蹋𡨚口
大王及后妃男女
从者等尊容元
改造像昌宁記之”

笔划內填有黑色。

座上雕有五像：右端王者坐像，袖手执笏。衣上塗黃色。头戴黑色高冠，冠的样式与石鐘寺区第一、二窟所見者極为相似。冠頂毁。王者留滿腮鬚。左端雕后妃坐像。袖手端坐，衣着綠色，戴蓮华冠。

王者与后妃像中間雕一童子盘膝坐。上身裸，左手置膝上，右手上举，似持一物。后妃像左側雕一女孩像，蓄長髮，袖手，衣上有用墨笔繪就的小花朵六处，尙未雕出。王者像右側雕一男孩像。

座前雕一案，上鋪紅色“案裙”，陈設着三件带盖的器皿。

屏障左右两角，雕有二圓餅。右側圓餅上用墨笔画一树，左側画一鳥，均未雕。

座左雕一女侍者，双手緊握一物。座右雕男侍者，腰系黃色带，带上有用墨笔画成的花紋，未雕。左手执書卷，右手执笔。

另外，我們在女侍者像的外側壁上隐約看到一处画像，內容是画着一武士騎馬奔馳，武士手中执一羽葆。惜太模糊，無法拍照。

獅子关附近的石刻还有两处，一刻在獅子关的峭壁上，一刻在从獅子关下来去石鐘寺的路旁巨石上。这个巨石上刻一人，旁鐫“波斯国人”四字。

（三）沙登村区

“沙登”古名“沙退”，云南弥渡小学楊延福同志告訴我說，他在江長坪村背后發現了一塊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墓碑，上面还刻着“鶴庆軍民府劍川州沙退乡”等字。这一点对我們研究沙登村后的石刻有关系。

沙登村后的石刻，分四个地点。

第一地点在沙登村后一里許，俗称“金鷄栖石”。石刻分做上下二層。下層鑿有四窟，第一窟雕佛一尊，趺坐蓮华座上，窟壁繪有佛光，部份着綠色。坐像高1.067米，面、手、足均有損伤（圖二十）。

第二窟雕佛二尊，一高1.037米，端坐石座上，赤足踏一蓮华座。手、足有損伤。一佛趺坐蓮华座上，高0.488米。蓮华座下有一題額。額長0.396米，高0.67米，刻字十一行，全文如下：

“沙追附尙邑
三賧白張傍
龍妻盛夢和
男龍庆龍君
龍世龍家龍

千等有善回
緣敬造弥勒
仏阿弥陁仏
囯王天啓十
一年七月廿
五日題記”

罗膺中先生在“張胜温梵画暫論”中說：“其南無作南无，佛作仏，菩薩省为卄，国作圀，宝作琙，册作冊，亦屬唐人别体”。

天啓系南詔王丰佑的年号，十一年相当唐武宗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从这段題記中，我們还可看出当时奉行“父子連名制”的不仅仅限于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了。)

第三窟雕佛一尊，高1.067米，身后繪有佛光，今可辨認出的有紅、綠二色。

第四窟雕菩薩立像，左手执瓶，右手执楊柳，面部有損伤。窟下平雕一天王像、全身甲胄，現在只能看見一个十分模糊的輪廓。

上層鑿有四窟。雕像矮小体肥，衣着綠色，雕得較粗。

第二地点在第一地点北半里許的路旁一巨石上窟中雕佛一尊，高0.61米。背有着色佛光。右下側墨笔画一立像，是先在石上塗一層白粉，然后用墨笔画像，然后再雕。这个立像的画工甚精。現在还可以隐約看出头后有佛光，手中持杖，着長衣，衣褶自然下垂。上方墨笔題“南无囗囗光仏”六字。左下側仅仅是在石上刷了一層白粉，还沒有画出像来。正窟左右各雕浮屠四座，样式、級数不同，但都鑿有一龕。这八个浮屠仅仅刻出一个輪廓，尚未雕完。另外，正窟左側还有題記一处，字迹剝蝕得很，現在大致認得的有：

“大理圀囗囗长囗妇禪姑人
观音如囗像囗囗囗囗囗囗”

第三地点的石刻亦雕在路旁的巨石上，正中一窟雕佛一尊，高2.074米(圖二十二)，左右二側像被打剝。附近地上堆有許多經人工打琢过的石塊，当时我們曾翻檢了一下，發現有四塊雕有衣服褶紋的殘片，雕工很精。据此，附近的石刻恐怕还不仅此而已。

第四地点，俗称“甲子寺”，其实是沒有什么寺庙的，只是在一悬崖上，山势裂开一縫，很像一个石門，縫寬恰容一人出入，縫內沒有什么修筑的痕迹。縫口左右二側的削壁上雕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像，均系薄肉雕，保存得較好(圖二十三)。这两个雕像和在劍川县城近郊金华山發現的天王像極为相似。

(四) 后 記

关于劍川沙溪三个地区的石刻內容，簡单报导如上。研究这批材料，現在知道的有三种直接有关的資料：

第一种是王奉宗等画的南詔圖傳，第二种是張胜温画卷（圖二十五、二十六）。这两种資料，向覚明先生曾有文評介，載“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南詔史略論”，和我們看到的三个王者雕像比較，和我們看到的几处題字比較，这篇文章的推論对我們研究这些石刻的年代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种資料是劍川县城近郊金华山腰里的“石将軍”像。关于这个石刻，徐宏祖看到过，他在“滇游日記”中曾有記述(見“徐霞客游記”“滇游日記”七)。王逊同志在“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記”中，对这个石刻也有記录（見“文史杂志”三卷三、四期，一九四四，二）。

我們去看过这个石刻(圖二十四)，覚得它和沙登村后第四地点的多聞天王，在甲服、塔式、执戟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王逊同志在同一文里又說：

“如果我們以劍川的毘沙門天王像同不列顚博物館所藏的敦煌遺品中之毘沙門过海圖作一番比較的考察……，我們断定劍川的毘沙門天王像和那幅过海圖，是根据同一时代的粉本，大致是無問題。”

那末，沙登村后第四地点天王像的雕刻年代就可以比較出来了。

另外，我們在沙登村后第一地点發現的那个題記上提到的两个人名也很重要。这两个人名是張傍龍和他的妻子盛夢和。

“白国因由”一書中說的張、蒙二姓禪讓的故事虽不可尽信，但張姓是当时的豪族之一；或者說張、蒙二姓在历史上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却是比較一致的意見。在南詔圖傳里，有題記作“夢諱”和“兴宗王妇夢諱”的。兴宗王系指細奴邏的兒子罗盛炎而言。据此，我們可以断定張、蒙二姓在婚姻上似乎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和“蛮書”中說的“么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詔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詔姻婭”（叢珍版，卷四）可以对照研究。

我所看到的劍川石窟的內容是如此。因为我既不懂南詔，也不懂雕塑，更不懂佛教艺术，拉杂写来，其中錯誤一定很多，希望同志們不吝指教。

（本文題目下的圖案是石鐘山第六窟石座上的裝飾）

圖一　石鐘寺

圖二　第一窟"王者"彫象

圖三　第一窟"王者"象左側彫象

圖四　第二窟雕象

圖五　第二窟"王者"象右側彫象

圖六　第三窟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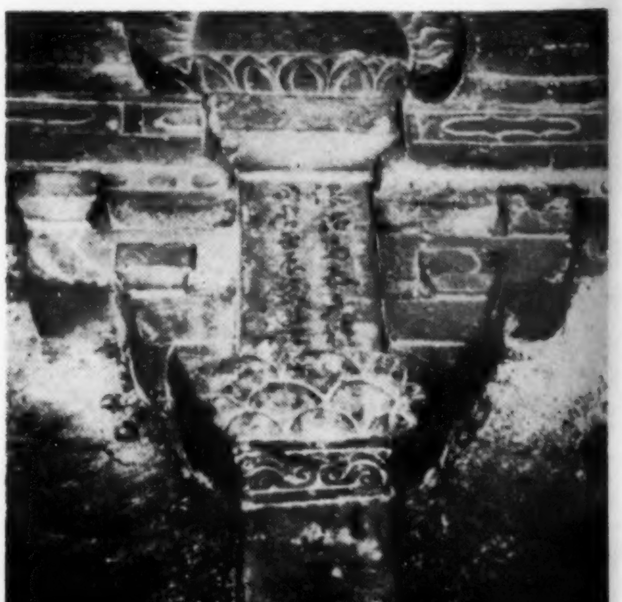
圖七　第四窟彫象

圖八　第四窟赶象人彫象

圖九　第五窟彫象

圖十　第五窟左側彫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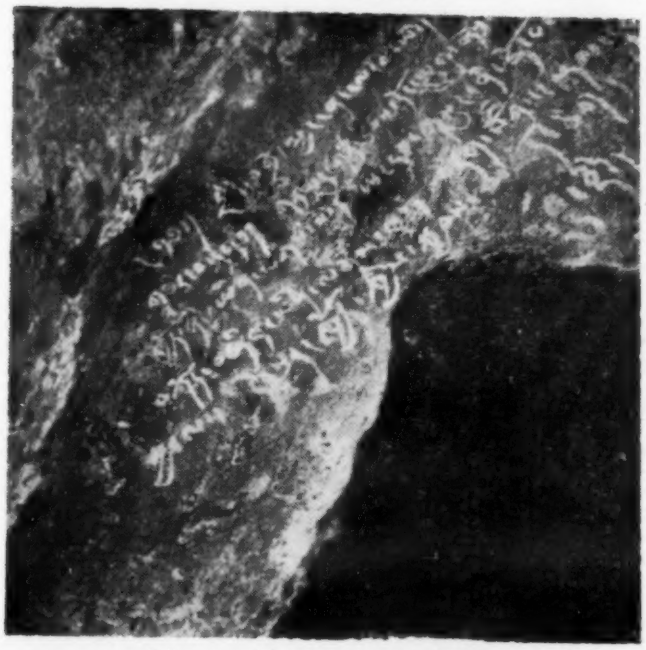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第六窟正中佛象


圖十二　第六窟斗栱上的題字

圖十三　第六窟座上裝飾

圖十四　第七窟菩薩象

圖十五　第七窟菩薩象头部


圖十六　第七窟上的藏文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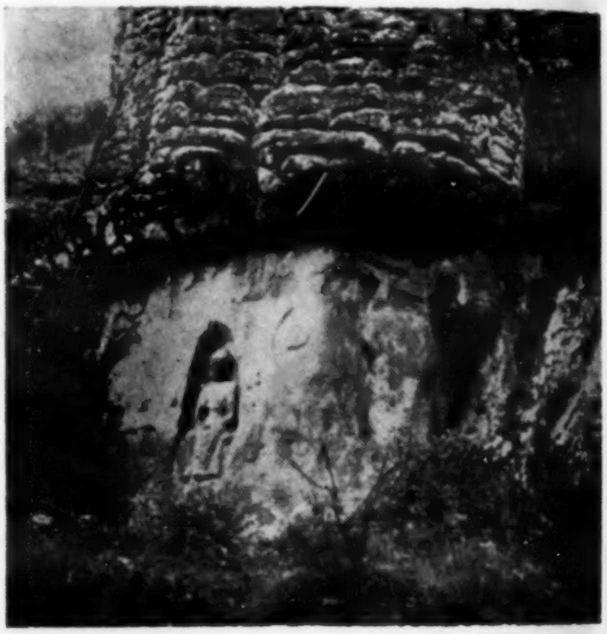
圖十七　第八窟彫象

圖十八　第八窟正中窟全景

圖十九　獅子关新發現的一窟彫象

圖二十　沙登村第一地点第一窟佛象

圖二十一　沙登村第二地点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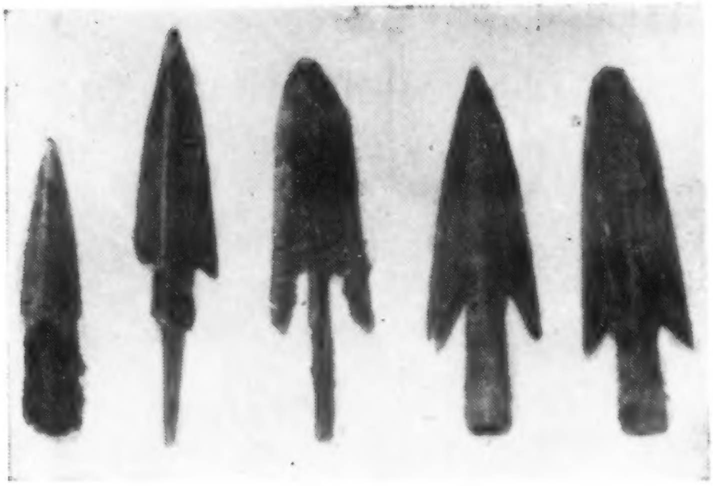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沙登村第三地点彫象

圖二十三　沙登村第四地点增长天王彫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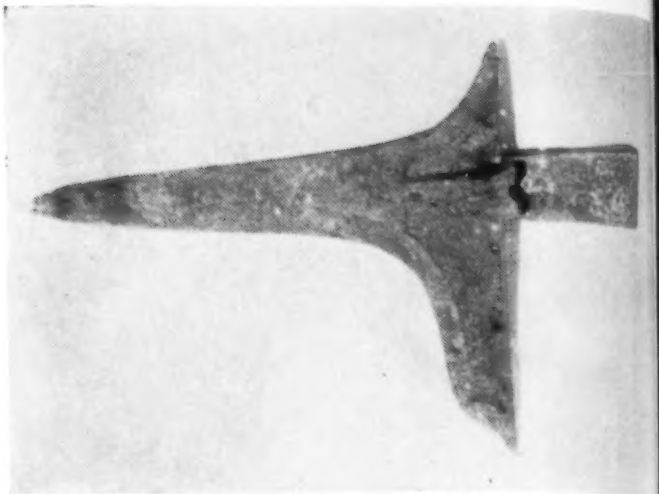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劍川金华山多聞天王彫象

圖二十五　張胜温梵画卷(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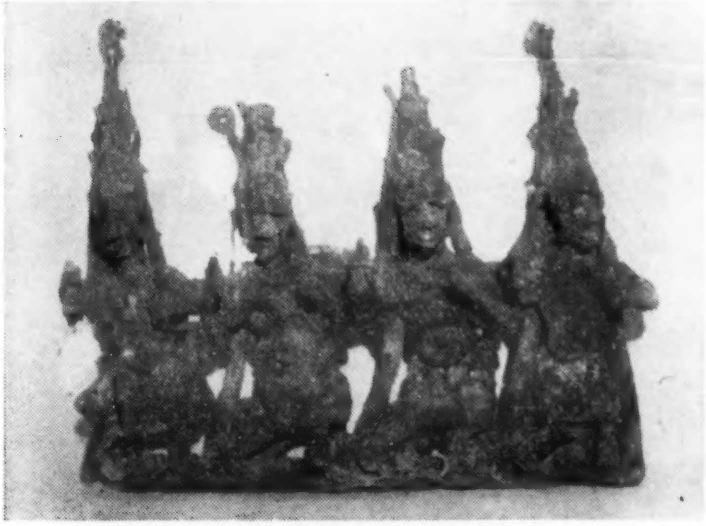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張胜温梵画卷(部分)



石寨山出土銅箭鏃



石寨山出土銅戈



石寨山出土銅四人舞俑

石寨山出土銅騎士俑

石寨山出土銅斧

石寨山出土銅犁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清理初記

陈丽琼　馬德嫻

云南省博物館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到今年一月四日繼續清理發掘了晋宁石寨山的古墓葬群。共清理了十九个墓葬，出土随葬品經初步統計有三千一百余件。

墓葬座向大多数是西向东。結构簡单，与土坑墓相似，但找不出比較明晰的墓坑規則。多数是夹在大石头旁或其当中，好像是依靠天然的石头作为墓葬的范圍似的。尸体与殉葬品之上是筑以原土，或用从别的地方特别运来的鵝卵石与沙泥攪拌的土夯筑。殉葬品有的是放在木漆箱內，有的是放在土中。尸体的部位多数看不清楚，没有一定位置。骨骼腐朽，仅存少数比較完整的骨架。完全看不見棺槨和它的痕迹。器物放置比較有規則，以兵器来看，絕大部分都是东向或偏东；有銅鼓与鼓形盛貝器的墓，都是将它們放在墓的西头，往东就放其他殉葬品。根据出土物的風格、形制及墓葬的分布，其年代有早、晚期的分別。

出土殉葬品以銅器为主，其次是金器、鉄器、瑪瑙、綠松石、陶器、石器、漆器、玉器、蚌器（玉器、蚌器仅有数件）等。

銅器生产工具有：犁、鋤、斧、鐮形器、銅紡輪。兵器有：戈、矛、劍、斧、鉞、刺兵、箭、鏃、弩机、叉、刺錘，这些器物的柄上都鋅鑄有很生动活潑的动物。乐器有：銅鼓、編鐘，鼓的全身飾有奇丽花紋，通体均匀，編鐘的装飾花紋比較粗糙。日常用具有：洗、鐎斗、釜、壶、盂、勺、爐爐、削、案、耳杯扣、鼓形盛貝器（內盛滿当时的貨幣貝壳），盛貝器的盖是圓形，盖上大多数都鋅鑄有立体的各种人物，能眞实的表現生活情景，如战争、狩猎、祭祀等場面。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祭祀場面。盖直徑約33厘米，在这銅鼓上还鋅鑄有一小銅房子，是一楼一底，長約14厘米，寬約9厘米，楼上有十个人，正中的一个坐着，其他都跪着。房內的陈設較簡单，从进門的右面一直到左面，順次摆着十八个銅鼓。在房屋的外面（即是整个盖面上）約有九十余个銅人，装束与其他器物上的銅人一样，不分男女，絕大多数都只穿裙子，赤足，耦髮。在这一百多个人当中，尽管他們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站立的，有跪坐的，有行走的，有手捧祭品的，有敲鼓的，有杀牛的，有正要受絞刑的，但却有个共同的表情，即正在为他們所举行的祭祀而作准备，使人一看，即感覚祭祀仪式的隆重和緊張。装飾品有：手鐲、鎏金帶鈎、銅鏡（其中有一个銅鏡，上有七十二个篆書銘文）、各式护心鏡、舞俑、騎士小銅飾等美术工艺品等。

車馬飾有：銜、鑣、冒、鈴，轡头，扣。明器有：銅房子、銅俑、牛头等。銅房子的結构一楼一底，楼上住人，楼下飼养牲畜如牛、馬等。此外还發現一顆銅印，印文为"胜西印"三字。

鉄器有：銅柄鉄劍、矛、劍、斧。

金器有：劍鞘、叉、珠、手鐲、扣子、墜子等；最重要的还有一顆金質印章，蛇紐，印文是"滇王之印"四字，正方形，边長2.4厘米，通高1.8厘米。还有瑪瑙珠、瑪瑙扣、瑪瑙管、綠松石珠、綠松石扣及石髓珠管等。

陶器有：陶豆、陶灶、陶杯，但多数都破碎不全，仅少数尙能保存。

石器有：穿孔石墜、圭形石墜、石耳环、石环等，这都是装飾品。

漆器有：耳杯、漆奩、漆箱等，均已腐朽，不能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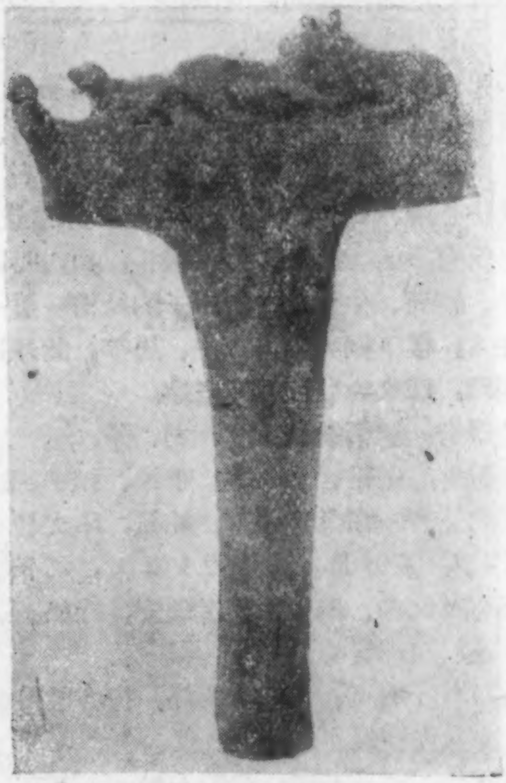
玉器有：玉带鈎、玉璧等。

貨幣有：貝壳、半两錢、五銖錢，貨幣里貝約有数十万顆，五銖錢、半两錢则極少。

根据以上出土的文物形制和風格，从銅器中的乐器及其他各种銅制工艺品看，这个部族在当时的冶鑄技术和艺术装飾已达到非常高度，如兵器柄上的动物虎、豹、兎、鹿、蛇等，不仅形象正确，而且姿态生动。又如盛貝器与銅飾上鋅鑄的舞俑、各种战争、狩猎、祭祀的場面，內容丰富，表情活潑，使人感到这是些極成熟的工艺作品。

这些器物都带有显著的地方的特殊風格，但也有楚文化的影响，如出土的銅鏡、鎏金耳杯扣、銅葫蘆勺、銅戈等，都与湖南长沙出土的楚文物相似。据史記西南夷傳記載："如楚威王时，使将軍莊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数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滇王者，莊蹻之后也"。②因此，受楚文化之影响是有其渊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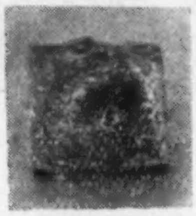
从以上文献及出土文物，尤其是"滇王之印"的發現，我們初步認为这群墓葬是滇王部族的墓葬群，其年代上限可能是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下限可能为东汉晚期或晋初。



石寨山出土銅獸柄戈

石寨山出土銅鋤

关于这批丰富的出土文物，由于时間的关系，还未經过細致的整理研究，这里只能作一極簡短的、粗略的介紹，俟以后整理完畢，再向大家詳細报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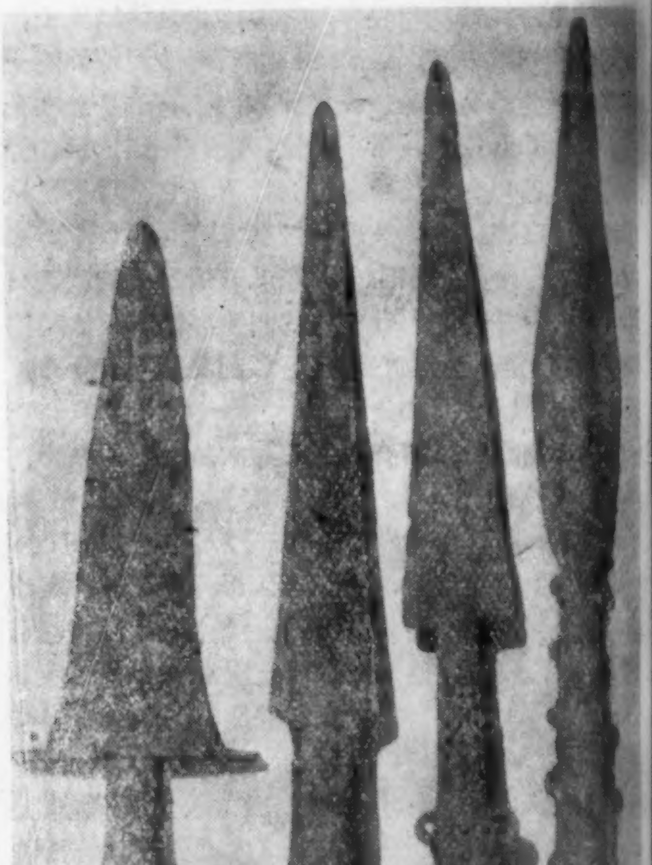


石寨山出土蛇紐金質印章

印章底部

印章印文

石寨山出土銅印印文



石寨山出土銅劍、矛

宁明花山全景

廣西明江左江两岸的古代崖壁畫

黄　增　庆

我們在桂西僮族自治州普查古代文物中，發現三个县有壁画：一是宁明的花山、珠山、高山、龙峡等地，一是龙津的洪山、花山两地，一是崇左的花山。这些壁画都在明江两岸和左江右岸的水流轉弯处石灰岩崖壁上的正面。壁画呈土紅色（氧化鐵），綫条粗獷有力，形象朴素。画像以人像为最多。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只有0.30米。各崖壁上的画像，風格和形象大致相同。为了叙述方便，从形状上假定，我們分它为三类：

（甲）人像：

1.打拳　两膝下弯，脚开"八"字形，手向上伸，不画眼鼻，仅宁明花山有一个人像画眼睛，多数不画手指和足指，有少数虽画手指和足指，而指数有的三个，也有的五、六个。有个别人像，头戴高帽，身挂鐶首刀或長劍。各崖壁的人像，以打拳的形式較多。

2.騎馬　騎馬的姿势是以两脚踏在馬背上，人像的姿势同打拳的形式一样。

3.跳舞　两腿微弯，側着身，两手高举跳躍，有的头戴帽，有的头髮披到大腿。

（乙）物件：

1.銅鼓　大圓圈中間有一顆"★"状的星，我認为是銅鼓形状，因这些物件在人像旁边也有，在人像头上也有，有的距离人甚远，假如是藤牌（見"文参"1956年第12期陈汉流文）应該执在手上才对。

2.銅鑼　大圓圈中套小圓圈的那种物件，它們的位置在跳舞或打拳人像的身边、头上、两腿之下都有，不可能是車輪（見同上文），我認为可能是代表銅鑼，他們是配合銅鼓的。

3.小銅鑼：在許多人像动作中，除了鼓、鑼之外，还有較小圓圈的一种，可能是小鑼。

4.鏃　这种画像仅見一个，它的位置在宁明花山一个最引人注目騎馬挂刀的人像右手下部，这件物叶似三角形，整作圓形，全長47厘米。

5.鐶首刀　画在打拳人的腰部。

6.劍　只發現一个，画在宁明花山一个38厘米高的打拳人腰部，全長32厘米。

（丙）馬、狗及其他：

一般馬的形象好像狗，但因为有人坐在背上，所以我們不能說它是狗。馬、狗在龙津的洪山和崇左的花山都没有。狗以宁明的花山較多，位于人的身旁，比馬略小些。此外，还有比馬、狗較小的动物，在人像头頂上或旁边，辨不出名称。有一件物品也不知它的名称。

这七处崖壁上的画像，現在尚未經風雨剝蝕，可辨識的总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多个。最多的是宁明的花山。最少的是龙津的洪山。各山的壁画，每个画像都是在鉛灰色和銀灰色的崖壁正面，每处画有一、二画像到数十个画像不等。壁面也没有經过琢磨，只較平整的崖壁，容易攀上或便于搭竹梯的地方，画像就在这里較多；也不是"每一幅画的內容都是相銜接的，如像連环画一样"(見广西日报1月10

广西明江、左江两岸壁画位置圖

日梁任葆文)。我搭架摹繪时，仔細观察壁画的綫条以及画像旁边遺留滴下来的顏色水痕，推想他們当时繪画用的工具是竹枝或稻草制成的。

各崖壁画的位置及情况

（甲）宁明县：

1. 花山　位于明江右岸，距宁明县城五十里，隔江对面是耀达乡的芭耀屯，高距江面250米，山势陡峭，壁画就在临江的那面崖壁，向西南方。壁画的画面全长170米，共一千三百余个人物，最高画像距山脚有40米。山脚有一堵长290米，堵高过水平面25至30米。距現在山脚2米开始繪画，而以5至20米高中間畫像最多，最高大的人像有3米，最小的人像只有0.30米，多数的人像是0.60至1.50米之間。人像的旁边，头頂附近或脚下有好多物件和动物，这許多畫像构成了花山全部壁畫。花山的壁畫，只少部分被風雨剝蝕而模糊，多数能清楚看出。整个壁畫的畫面，并不是分为五幅（見"文参"1956年第12期陈汉流文），也不可能将整个壁畫清楚分为多少幅，因整个畫像是連續不断的。只不过壁面平整和較方便的地方，作者就在这个崖壁面上多畫了。陈汉流同志把重点临摹的壁畫，当作整个壁畫的五幅，那是錯誤的。

2. 珠山　在宁明县城东十五里，位于明江左岸，方向东南，距花山宁明县三十五里，珠連乡人民委員会所在地四里。山壁直立，临江的山峰高距水面120米。河岸边的两峰，从山脚到山頂高約100米，整个山长500米，大小岩洞十余个，以右边的珠山和左边的观音岩为最大。岩口高、寬約有7、8米，壁畫就在两个大岩洞附近和临江面的崖壁腹部。珠山洞在山脚，壁画距洞口右边30米，离山脚有20米。只有二个画像，一个像打拳形式，腰挂长刀；一个跳舞形式。两个高約0.50米。临江面崖壁上的壁画，距水面20米，画像三十余个，位于較平整的石壁和一个小岩洞附近。这些画像高40至60厘米之間，多数被風雨剝蝕，不完整了，观音岩洞頂

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之一

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之二

山及附近鉛灰色平整的壁面，距山脚有10至20米高，能够識别画像的有四十多个，最高的人像1.50米。最小的人像只0.40米，其中物件和兽类的画像也有七、八个。

珠山的壁画，不像其他山壁画那么集中，分散作八十余个。

3.龙峡　位于明江右岸，方向正西，距珠山和珠連乡人民委員会住址約二里，耀达乡的花山三十余里，它是一串綿延不断的小山峰正面，从江面到上頂高80米，全长120米。壁画在山腰中部，所占面积，高10米，寬15米，离江面20米，大部分画像已模糊不清，还可辨識的有二十余个，多数是人像，高有30至50厘米之間，在各山壁画中要算最小的。

4.高山　方向正西，在明江右岸，隔江对面是耀达乡的芭頼屯，距离宁明县花山壁画十五里。山有二个隆起小峰，高离江水面300米，全山长250米，山的正面中部有上下两个长、寬約6米的岩洞。下洞在山脚，距江水面高8米。上洞和下洞頂相連接，前面有一条羊腸可走的小壁堵，画像就在兩边石壁，这些画像还可清楚看出每个形象共計有一百十余个。最大的是人像，高約1.5米，最小的也是人像，有0.40米，普通是0.50至1米之間。兽类和物件的画像也占壁画中十余个。

（乙）龙津县：

1.花山　离龙津县城一百二十里，上金鎮七十里，方向正南，位左江右岸，隔江斜对面是棉江乡人民委員会址。山高从江水面到頂120米，长有250米，全山有二个高、寬約5至10米的岩洞，壁画就在岩洞頂上和旁边。山右边的洞距江水面高40米，画像是在洞頂上和右边的石壁，每个形象还能清楚的看出，最大高2米，普通是0.60至1.5米，數量共一百八十个。山左边的洞口距江水面5米，画像約五十个，多在洞口左右两旁，大部分受風雨剝蝕，看不甚清楚。只有人像，没有物件和兽类的画像，人像高約0.50米。整个壁画共二百三十余个，數量次于宁明县花山。

2.洪山　位明江左岸，方向西南，距宁明县花山壁画十五里，上金鎮也是十五里，屬于云江乡。悬崖峭壁，高达250米，长300米。壁画距江水面高30米，位于一个小长形洞口左边，可識别的画像有四个，但每个也不完整。全是人像，高約0.60米。

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之三

（丙）崇左县：

花山　在左江右岸，距崇左县城五十里，龙津县棉江乡花山壁画二十里，方向东南，隔江对面是古坡乡渡国屯。山高100米，长200米，壁画就在临江面的崖壁上腰部，距江水面高30至35米，有画像十余个，全是人像，高約0.50至0.70米之間，多数模糊不清。在画像左边1.2米处有一楷書"魁"字，高約2米，也是土紅色，綫条同画像一样大，笔法与繪画綫条相似，推想可能是繪画者的遺笔。这个字現在还未受到严重剝蝕，仍可辨識，这对鑒定壁画的年代是有用的資料。

壁画年代問題

宁明、龙津、崇左等三县的壁画，民間傳說很多。这些口头傳說已变成了神話，而且对年代的說法也不相同。究竟这七个崖壁上的画像是什么时代的？对这問題还没有足够資料証明，各人的看法也不同。楊成志教授說："对这些壁画，我尙未發現过去的文献有什么記載。根据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大約有一千年到二千年的历史"（見广西日报1956年10月7日）。梁任葆同志說："这些壁画还是屬于中古甚至上古的，而不是近古的"（見广西日报1957年1月10日民族团結第2期）。陈汉流同志說："我認为明江沿岸壁画，也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候，宁明、龙津地区的天地会所制作的"（見"文参"1956年第12期）。此外有的同志說，这些壁画形式太原始，可能在汉代以前就有了。以上各种对壁画年代的断定，只是看了宁明县花山的壁画，而在邻近宁明县的龙津、崇左等县崖壁上也有相同的画

像一样的笔法，所受風雨剝蝕也相差不多，在壁画旁边还写有文字，無疑应是同一时代的。我們認为，这些壁画的年代不能单从画象原始形式来断定，說它是屬于上古（汉代至商朝）的，但崇左古坡乡花山壁画旁边發現一个楷書"魁"字，这个字虽然現在还不知道它的用意，但从我国書法演进过程来看，說它是上古遺存是不对的。說是汉代以前的文化遺存，但人像腰部所挂的長刀，每个刀柄都是圓形，这种鐶首刀在汉代才普遍使用；广西地区自秦汉以后逐漸吸收汉族文化，現在發掘地下文物还没有找到汉代以前的銅、鉄兵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記載这种形状刀是屬于少数民族文物，要說这些壁画是汉代也不合理。要說是元、明两朝代所制作，根据这三个县的县志，关于元、明时代較重大的事情，都有詳細記載，而关于崖壁画像的事却没有說到一句，因此可能性也非常之少。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宁明、龙津的天地会所制作；当时他們流动性很大，武装斗爭很剧烈，不可能有充分时間制作这样大規模的画像。宁明州志（光緒九年刊）說："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騎馬，未乱之先（指太平天国起义），色明亮，乱过之后色稍黯淡。又按沿江一路两岸，石壁如此类者多有"。又說"珠山一名英山，……道光庚子年（道光二十年）崩下一石，其声如雷，至今江路有乱石堆叠縱横，即昔年所崩下之碎石也。……占者，以为再逢庚年必有大乱，果至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义时候）而賊蠭起"。这显然看出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天地会所制作是不相干的。如說与黃巢起义兵敗有关，而黃巢起义是由北到南，在别的地方却没有發現那样的画像。龙津县上金区宝劍山虽傳說有黃巢挂劍，实际这个山岩，"当朝日上升，船經其下，遥望之，有如劍影欹斜在內，土人相傳为王巢宝劍"（龙州县志）这只是一种神話故事，不足以說明这个問題。至于是否和儂志高起兵有关？根据历史文献，儂智高是广源州节度使，广源是屬現在的越南地方。儂智高在宋皇祐四年四月攻破横山寨（田东县），同年五月打下邕州（南宁），文献没有說到他們进軍中經过龙津、宁明、崇左等县，縱使路过这些地方，那么多的画像，而各崖壁又相距甚远，在时間上說，不可能有余力制作这些壁画。

到底这七个崖壁上的画像是什么时代产生的？什么人繪制遺留下来的？由于資料不足，現在还不能作出定論，不过从我所知道的历史文献、画像旁边的楷書"魁"字和画的內容来看，这些壁画可能屬唐或宋代所制作。以唐代社会情况来說，唐代肅宗元年（756）至宪宗十二年(817)間，曾有黃乾耀等少数民族領袖不断的起兵反抗唐朝統治阶級。唐書南蠻傳参通鑒說："西原蠻，居广容之南，邕州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黃氏（黃乾耀）居黃橙洞（宁明、龙津，崇左等一带），謂之黃洞蠻。……天宝初，黃氏强，与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合众二十万，綿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从这看，壁画可能与他領导当地人民起义有关。这个意見也只是作为一个假定罢了。

这些壁画創作的形象有武士、騎馬、跳舞、刀、銅鼓……等，我認为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反映。那些腰悬刀劍的武士的强悍气氛，那些集体舞蹈的欢乐形象，它显示着僮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斗爭的意識和生动的文化生活。从那些色彩鮮丽、綫条粗犷、画面复杂、人物形状生动活潑这些特征，也說明了古代僮族劳动人民已具有高度的艺术創造性，这是当时僮族人民从現实生活中攝取出来的形象。另外，从在各地崖壁上創造这样規模巨大、內容丰富的壁画，也充分表現了古代僮族人民的艰苦劳动精神和集体智慧。

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奖品怎样征集和处理的意見

1957年"文参"第2期李廷儉同志"在征集文物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問題"中談到关于英雄、模范人物的奖品怎样征集和处理的問題，对这問題我个人的看法是：

据有关部門向河北省博物館提出的意見"你們展覽可以向中央去要一份，何必要这份呢？"或"耿长鎖同志是全国著名的农業劳动模范。……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議都要带奖章，可是他的奖章、奖状都給博物館征集去，不給拿回，这不大妥当"。固然这些意見反映出对博物館收藏原物，并通过陈列展覽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但从奖章、奖状有实际使用的意义来看，也的确存在具体的困难。在目前的情况，如果硬性制訂征集文物的条例，是不容易行的通的。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李同志提出在报刊上加强这方面的宣傳。这确是必要的，最好也通过館的陈列展覽，进一步扩大宣傳影响，以便普遍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并使人們思想上認識到将类似奖章、奖状的文物捐給博物館陈列是必要的和光荣的。此外，在征集英雄、模范的奖章、奖状时，必須坚持自願的原則，取得本人同意后，再收归博物館，决不应有任何勉强。同时为解决征集和使用的矛盾，务必設法复制一份給本人。为了經济或避免复制的困难和不眞实起見，最好能向發奖单位說明道理，索取同样一份交給本人或与之交換。这是較好的办法，但应該通过一定手續报請上級有关部門联系协商解决。

·盧少忱·

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認識

吳澤霖

一、什么是少数民族文物

凡能反映各少数民族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基本情况的一切实物，都是少数民族文物。比如有些民族用牛角尖鑲的木鋤耕地，有些民族不用汉族那样的桌椅而用矮几、矮櫈。这些牛角鋤和矮几、矮櫈就是民族文物，因为它們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情况。

有人認为民族文物应当是一个民族中精美高貴的东西，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文物中有精美的东西，但也有些極平凡的物品。

我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常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語。标語我們看得太多了，可能不会引起我們的注意，至少不会想到去收集它們。但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那看法就有所不同了。解放前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处在汉族統治阶級和本民族地主上層双重殘酷的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共产党来了，帮他們翻了身，非但經济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政治上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平等权利。这些标語，正是表达了他們出自衷心的感激，充滿着民族的感情，也标志着民族关系上划时代的轉变。它們不仅是一种革命文物，而且是有关民族关系的历史文物。

各个民族的發展，都有共同的規律。但另一方面在生活实踐里，由于經济条件的不同和特殊的历史傳統，在他們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会或多或少表現出各种民族特点。民族文物旣是反映生活和生活情况的实物，它必然带有某种民族風格的烙印。

二、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有什么意义

收集国內少数民族或国外較为落后民族的文物，在資本主义国家是很流行的。他們的目的，基本上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为資本家、剝削阶級的利益服务的。一方面他們系統地收集有关物产方面的資料标本来說明这些民族地区的丰富蘊藏，以便吸引投資，进行剝削。另方面又从收集落后的东西来强調这些民族的愚昧無知，进行种族主义的宣傳，为殖民政策寻找理論的根据。此外，为了滿足猎奇心理和占有欲，也有个别資本家或他們的御用学者热心于这一类文物的收集的，但这种玩古董式的、夸耀私人財富的活动，对人民是絲毫没有利益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收集民族文物的目的与資本主义国家有本質的不同。我們进行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經过整理，举行展覽，为的是通过直观教育来增加民族間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結，消除历史上遺留下来的一些隔閡。我們的文物工作是为了宣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結合的教育提供資料。通过科学的收集、整理和展出，使各族人民因本民族的文化成就受到尊重而感到温暖，同时因整个祖国文化的丰富多采而更自豪，感到生长在这样偉大的祖国是幸福光荣的。

今天我們的民族文物工作不但是有人民性的，为政治服务的，而且也是直接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各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各民族的社会性質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是很不全面的，有許多問題还亟待解决。通过民族文物的研究也会有助于这些問題以及历史学和民族学上其他問題的解决。讓我們举几个例来說明这一点。

大小凉山彝族中有一种很發达的木制容器工艺。一切飯具、飲具如杯、碗、匙、碟、壶等都用木制，上加油漆，形式上很美丽，也很适用。他們在这方面虽达到了这样高的技术水平，却不懂得陶器的制作。根据社会發展的規律，陶器在新石器初期即已發明。已經發展到奴隶社会的大小凉山彝族，按理不可能没有很發达的陶器工艺。他們缺乏这种知識和技术这一事实，好像与社会發展的理論不一致。解答这个問題，对研究彝族历史应当很有帮助。如果我們把彝族当作在大、小凉山土生土长的，那他們就不可能懂得陶器的制作。如果彝族不是本地的民族而是从别处迁移进去的，那就比較容易解釋。因为一个民族在早期迁移过程中，很可能由于专業人員的死亡流散把某些技术遺忘了。彝族在进入大小凉山的时期丧失了原已掌握的制陶技术，但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需要，發展了木制容器的艺术。这个解釋自然还待进一步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說明从民族文物上可以提出解决一些历史上理論性問題的綫索。

貴州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仡佬族。在苗族、布依族进入貴州时，他們早已定居在那里，因此有人就認为他們是貴州的土著。現在他們的人数已經很少，很多人已不会說自己的語言。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在丧礼中他們还使用一种以泡桐制的蕭，口上有簧，蕭身鑽有二洞，以别音阶。詩經上曾提到这种桐蕭，可知这是一种很古的乐器。貴州盛产竹，很自然各民族都用竹制乐器。仡佬族中的一般乐器也都用竹制造，但在古礼中仍保留着一种非竹制的桐蕭。可見他們的祖先并不住在产竹的地区，而是产竹的更北地区，也很可能是黃河流域一带。这是从文物上推敲出的一条綫索。根据他們自己的傳說，也說他們是从北方去的。这可能不仅是一种巧合，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問題。

中国有一句老話：礼失而求之于野。有些風俗習慣或工艺技术在中心地区早已被遺忘丧失，但在边区或落后的地方可能还保留着原形。許多古代汉族的習俗或工艺流傳到了少数民族，有些随了时代而消失了，有些融化在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中而变了形，有些則基本上保留了下来。比如，流行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尤其在苗族和布依族中的蜡染，就是隋唐时代在汉族中盛行过，但早已遺忘了的蜡纈工艺。又如在藏族中，無論在艺术上、服装上、建筑上或日常用具上，处处都可以看到唐代汉族的影响。这些边区所保留的活的遺迹对我們汉族古代史的研究都很有帮助。实物可以丰富理論的內容，理論有了实物資料的証实，更能加强它的科学性。在这个領域內，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将会有更大的貢献。

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和研究不但是为政治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而且也应該为充实祖国的文化、丰富各族人民的生活提供資料。許多少数民族有精致的手工艺品，美丽的圖案，卓越的編織技术。这些成就，可以供各族人民的观摩采用，使各族人民生活更丰富多采。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下，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匯合，将使祖国的文化發展得更为繁盛。这方面的工作今天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还正待大力开展。民族文物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責任来提供足够的資料。

三、为什么今天要加紧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工作

过去一向被人遺忘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导下，正在以高速度的步伐向社会主义迈进。凡是条件具备的地区，已經完成或将要完成土地改革；凡是条件还不具备的，也都在积極創造条件走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的發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項建設事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族人民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地他們的生活也正在不断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已面临生活改变的高潮，有些地区这种改变已在开始，在不久的将来，新的經济、文化生活必然会以排山倒海的优势，排除代替旧的、落后的生活。經驗証明，有条件使用火柴或电筒时，誰也不願再用火鐮打火或松脂照明；一旦穿得起棉衣，誰还願意縮在麻布套里發抖！一切反映落后生活的东西在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一定会被無情地排斥。所以可以肯定地說：各少数民族中許多物質生活的落后方面，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一去不复返了。有条件来消灭落后，标志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誰都欢迎的，也正是我們党和政府努力的目标；但一切落后的东西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反映社会發展的阶段，反映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我們欢迎落后的消灭，但对即将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一切落后的东西，作为历史的科学研究的材料，我們仍有加以記录的必要。若干年以后，無論学習历史唯物主义或研究中国的历史發展，必然要追溯到带有資本主义以前的昨天，以全面了解發展的过程。但历史不会重复，过时的生活無法回生，这些在今天生活中的極普遍的用品，对后来的人們具有重要的对比参考价值。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在談社会發展史时，除了引証希腊、罗馬、印第安人的材料，还可提供我們自己的有关資料，那么将如何丰富科学的內容，对我們将感到如何的亲切！因此，我們要在落后消失的前夕，尽量記录象征落后的一切。除了記录外，具体的实物就变成具有高度价值的資料了。这是我們今天要加紧少数民族文物收集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应該怎样收集文物

到民族地区收集文物，不論是全面性的或是专題性的，都必須于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全面的收集必須做到通过收集到的文物，可以使人們了解这一地区或这一民族的基本情况。从文物上反映出这一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阶級結构、生活情况、文化成就等方面。专題性的收集必須深入地、細致地把专題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通过文物来解決。所以無論那一种收集都必須于事前明确目标，确定范圍，拟訂初步工作提綱，然后在实现規划的过程中才能展开有計划、有步驟的收集，不致产生乱抓乱收的自流或混乱現象。

从事民族文物工作也和进行任何其他工作一

样，必須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文物的范圍是非常广泛的，牵涉到許多知識領域。有些文物的鑒別和記載要求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知識，有些必須涉及自然科学，更有些有賴艺术家的帮助。我們在收集和初步整理的过程中，必須虛怀若谷，处处請教較为內行的人。从他們的帮助中得到啓發，發現問題得出初步的結論，以供专家作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在收集的过程中，那更应依靠群众。一个人地生疏的文物收集者，只靠自己的两只眼，一对耳朵是發現不了多少东西的。搞好群众关系，利用群众的耳目，来扩大收集的接触面是收集工作的基础。忽視这一环节工作就不免处处遇到困难，事倍功半，甚至無法进行。在接触群众时，应注意吸收爭取对文物有知識有兴趣的当地人参加，并在工作中加以培养。这样，非但提高了这些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正确認識，便利了收集工作的进行，更主要的，事后如需补充收集或充实有关資料时，我們就有所依靠了。

一切文物，少数民族文物毫不例外，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資料或生产資料，也是社会关系。任何一种文物都反映一个民族的生产水平；任何文物都有它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消費过程。許多文物反映出阶級关系和民族特点。通过它，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一个社会的性質和民族的面貌。我們知道，無論那种文物都不是从天上掉下，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在眞空里。每件文物都有它的历史；它和人結合在一起，从它的制作起一直到它的消灭，在人們的生产上，生活上都發生一定的作用和一定的影响。所以，虽然一般文物个别的或孤立的都是死的东西、靜的东西，但从全面的或發展来看，都有它活的一面。因此，我們收集文物时，决不应仅限于具体文物的收集，而必須同时注意它的活的、动的方面。这就是說，我們必須了解它的生产过程和社会作用。只有在这样全面收集的基础上，再經过了系統的整理，对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或宣傳工作才能有积極的貢献。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民族文物收集者就必須在进行工作的那个民族中，居住較长的时間，了解他們的基本情况，体会他們的生活，然后再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准确地选擇富有代表性的文物，才能詳尽地、亲切地記录每一件文物动态的一面。倘若違背了这个原則，没有計划地收集，潦草記录，形式上虽給博物館积累了許多实物，但供作科学研究或宣傳教学的参考时，由于資料的殘缺不全，就無法被系統地利用，实質上变成了廢物。更坏的，有时錯誤的說明或記录一旦誤被采用还会招致事实上的混乱，引起有关民族的不滿以及其他严重的不良效果。

民族地区的文物收集必須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政策的精神办事。只要少数民族知道文物收集是对他們有利的，有助于民族团結的，他們都会乐于合作的，但进行了适当的宣傳教育以后，有时也还会發生困难的情形：有些文物不肯出讓；有的地方不讓照相；有的公物不許搬走；有些方面不願合作。这种情况虽不常見，但并不是个别的現象。面对着这种情境，我們就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意願，不能强迫命令，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滿，影响民族的团結。进行收集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与少数民族群众發生接触，健康的接触可以促进友好的民族关系。如果工作上的接触妨碍了他們的生产，触犯了他們的風俗習慣，那又是違犯民族政策的錯誤行为。这是文物收集工作者应当非常注意，必須避免的。

文物的取得和記录仅是收集工作中的一部。收集記录以后，第二步就須进行科学的編号，整理初步記录进行鑒定分类，提出問題，写成总結报告，在可能范圍內将文物展出請专家审核以便作最后的修正。做到这里，收集工作才告完畢。

总之，少数民族文物收集工作是一种細致的、艰巨的工作，但也是一种富有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工作。尤其在今天，它是一种正待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視和支持。

楚文物拍成了电影

为了对全国人民介紹在文化艺术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楚文物，中央新聞紀录制片厂駐湖南摄影站在三月八日拍成了“长沙楚文物”新聞片。

这次拍摄的內容有战国时代鉄制的生产工具——鐮、鋤、斧鏟、銅錫合金鑄成的兵器——矛、戈、劍、矛鐓、戈鐏，各种不同花紋的銅鏡，古人所用的玉、銅印章，佩带的琉璃璧与琉璃珠。此外还有全国聞名的狩猎紋漆奩等漆器，我国現存最早的毛笔、竹簡、帛画，天平法碼。为了反映考古工作人員成年为文物保护工作的辛勤劳动，摄影师也将室內整理工作情况如文物登記、临摹、保养等程序拍入了鏡头。（吳銘生）

百家争鳴

再論"保存什么，如何保存"

陈 明 达

一九五五年我就当时关于古代建筑保存中的一些問題，以"保存什么，如何保存"为題，提出了几点意見。当时主要的意思可以簡单归納为：

1. 反对"凡古就必保存的傾向"，要保存的只是有益于今天人民生活的。

2. 保存古建筑，必須結合城市發展、国家建設等全面考虑，辯証的解决。

3. 应保存的建筑物，也应按照其历史艺术价值大小、損坏程度分别对待。反对把保存单純的理解为"禁止使用"，或理解为"即时修理"。

4. 一般的古建筑，应充分利用。

5. 古建筑的修繕，目前只能重点进行，一般只作維持現状的保养。

6. 在保护古建筑的工作中，現在应以調查、測繪、紀录等"掌握資料"的工作为重点。

此外，还提出了管理工作的一些具体建議，今天，我对那些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并且覚得还要再补充一点：在反对凡古就必保存的同时，还要反对凡有名气的就必保存的傾向。

在那篇文字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有些辞句仅仅是針对着当时某几个城市中發生的問題提出的，又没有加以詳細解釋，因此是有片面性的。其次所举例証，代表性不明确，或者举得过少，不能說明我的原意。而在辞句上又限于写作能力，往往辞不达意，易于誤解。魏明同志在本年"文参"第二期中就保存什么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我是十分感謝的。但是有一些意見是出于誤解，或者是概念不同，也有一些意見在我看来是錯誤的。討論更能使意見明确和引导出正确的結論，因此再作一些补充。

• • •

关于反对凡古就必保存的一些論点，我們的認識是一致的，問題在于事实。1953年我在大同听到、也看到保存太多，以致临街墻上嵌砌成的不到一公尺大的土地庙，也在被保护之列。各地方請求保护的古建筑，約有半数以上是可以不保存的。北京市旧城圈以內，从拆除天安門左右的三座門开始，到拆除东西四牌楼、地安門、东西长安牌楼、北海三座門、西长安街双塔寺，都有过不少意見，虽然最后没有因保存而影响城市建設，但总还是有些阻碍的。現在也还有人对拆除朝陽門以及其他北京市拟拆除的城楼有反对意見。开封鼓楼的"楼"已經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磚台横在馬路中心，也还在保存之列。所以多保存的思想在事实上是有的。但是只强調这一面，是带有片面性的，虽然我在那篇文字第二段中提出了"不允許任意空閑或拆除"，但不够突出，这就給人以"新建必需拆旧"的印象，而事实上这一現象也是有的。說得全面一点应当是：既反对凡古就必保存的傾向，也反对新建必需拆旧的傾向，更要反对無故乱拆的傾向。

这样一来，不是我和魏明同志的意見一致了嗎？是的，理論是如此，可是实踐起来仍有不同，这是由于对事物的認識各有不同的原故。就以魏明同志的例子作証：

一、龙泉县拆除三座古塔，是在破除迷信的借口下拆塔用磚，他們并没有"新建必須拆旧"的思想，而是不遵守国家文物保护法令的問題，这叫無故乱拆。

龙泉古塔中拆出了不少唐宋經卷，也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無辜被焚。这个作法，使我們文化遺产遭受了痛心的損失。我再重复1955年的意見："在保护古代建筑的工作中，現在应該以調查、測繪、紀录等掌握資料的工作为重点"，再不要只坐在办公室写公文、开会了。有了紀录資料，万一遭到这种損失，还有一份可供研究的記录，而現在如問："这三个古塔到底是唐是宋？""是什么形状？""在建筑艺术上有什么特点？""有没有必須保存的价值？"就只好答："不知道"。因为有这个重要損失，也給保护古建筑的人作了擋箭牌。

二、南京的"三国时代有名的遺迹"石头城，也不是在"新建必須拆旧的傾向"下要拆的，也不是乱拆，那原因是裂縫要倒塌，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我的意見，这类遺迹在正当的理由下是可以拆的。引朱偰同志"金陵古迹圖考"为証：

"……清凉山旧名石头，即石头城之所据也，……建康志引江乘地記云：'山上有城又名石城山'，又引宮苑記云：'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即石头城。城吳时尙为土塢，晋义熙初始加磚累

壁，因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形險固。……隋平陈，于石头置蔣州，唐武德四年为揚州治，尋揚州移治江都，此城遂廢。武后光宅中，徐敬業举兵，使其徒崔洪渡江守石头。建中四年朱泚作乱，江东观察使韓滉筑石头五城。元和二年李琦为鎮海节度使，遣兵修筑石头。……自江漸西徙，水西門至江东門卌十里，淤为平地，而石城故基，又为楊吳稍迁近南，于是山为城隐，無复虎踞之雄矣。……"（字下重点是我加的）

据此，第一，石头城是在清凉山，方圓面积若干無記載。第二，三国吳的石头城是土塢，晋改为磚，唐初廢弃，唐中再建五城，方圓面积，是土是磚無記載。第三，最后又稍迁近南，具体迁至何处亦無記載。1948年我也去找过石头城，有人告訴我說，現在南京城靠清凉山西的一段就是石头城，但是这一段是明代用条石筑的城，与記載对証，既非吳也非晋的石头城。又有人說清凉山上那一段峭壁石紋頗像人工所筑，即古石头城。根据这些情况我認为：清凉山这一带，在古代建过城，其名叫石头城，它的名称虽保存至今，实物早已不存在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古建筑对我們有什么用处？它的历史艺术价值何在？如果說它証明历史上某时期在这里建造过一个名城，那么，自有历史記載在，也不妨恢复清凉山的古名石城山。我看事实上要保存它，只不过因为它有名气，所以我主張补充一条：反对凡有名气就必保存的倾向。

同时也希望不要誤会，这反对，是指有名無实的古建筑，在它妨碍新建設，或有倒塌伤人的危險时，不应当坚持保存。并非这样一反对，就不分清紅皂白，把有名气的都拆光了。

三、北京市拆朝陽門是没有必要嗎？我認为：为了解决北京市东西交通的問題，这里要拓寬干道，增加高速車輛通过量，如何解决拦阻在馬路中心的朝陽門呢？第一是拆除它；第二是开辟广場，把朝陽門位置在广場中心。我的認識是：开辟广場必須有足够的直徑，否則就不能起应有的作用，为此要拆除周圍住房，朝陽門外那个火車站也要搬家，要付出居民搬运費，要为搬迁的人建新房，要新建火車站，又要有多少技术人員、工人、管理人員去做这些事，又要多消費多少建筑材料，并且必須延长建設时間。拆除朝陽門如何呢！仅需付出拆除的工資、旧料运輸費而已。这笔賬很清楚，从經济出發，我們以拆朝陽門为是。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朝陽門有没有历史艺术价值？那当然是有的，但是它并不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也不是建筑艺术上特別优秀的創作，它不过是一般的历史艺术意义，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一般性实物。这样的建筑物是很多的，只要保留一定数量就够了，不必全部保存。当然我也不反对保存得多一些，但要有保存条件。当他没有保存条件时，我是不主張硬要保存，因而造成浪費，妨碍建設的。

例如山海关城楼、嘉峪关城楼之类，当地政府都極力主張保存，它們也不影响当地建設，我們应把它們修得好好的保存。

于是有人会說：你举的这两个城楼，和朝陽門不一样！是的，不一样，可是大同而小异，在建筑艺术上、結构上没有基本的不同。如果硬要从細微末节上去分別异同，只要稍有尺寸之差，就認为这是一个孤例而必須保存，那么全北京市的旧房子一律都应該保存，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将要寸步难行了。

尙有一說，認为分別看来我的看法不無理由，可是朝陽門这个位置将来总是要开辟广場的，何不今天就做，可以一举两得，还多保留一个古建筑。这虽是好主意，但没有考虑目前增产节約对于工業建設的重要意义，忘記了現在建造居住房屋的速度还远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不应当再多拆住房。况且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相应的，彼此联系的，有輕重緩急的，在其主要方面没有發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們就先把不具备条件的次要方面提高至較高級的水平，是脫离現实的做法，必然造成困难和浪費。

这三个实例：一个是乱拆要反对，两个是有理由的拆，不应当反对的。把这种拆除認作是乱拆，恐怕还是凡古就必保存和多保存的思想的反映吧！

• • •

保存古建筑的标准，是一个学术性問題，确是难于解决。我原来把这标准分成三类衡量的方法，为的是在管理工作上的方便，不一定就必須这样分类。事实上不分类，就可以把我的原意归納为：要保存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紀念意义的建筑物；在建筑史、建筑艺术、工程結构上，是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的典型的、代表性的建筑物；在全国范圍內，同一时代同一类型中現有数量已極稀少的建筑物。

今天看来，这个标准还有缺陷，似乎要补充一条：

"从古至今，一直为人民所爱好、歌頌的公共建筑物"。

这是从岳陽楼和黃鶴楼想起的，它們的性質就是如此，由于它們确是人民劳动之余休息的好地方，提起来都十分亲切，1956年修理过。今年还要求徹底

修，这是富有人民性的紀念建筑物，应当保存。为什么我不肯定的加一条，而只說“似乎”呢？以黃鶴楼来說明：它和岳陽楼同一性質，在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拆除了，現在在人民的要求下准备再建一个黃鶴楼，不过地点另换一处。黃鶴楼在历史上焚毁过好几次，重建过好几次，每次新建都和原有形式不同，現在人民也只要求重建，沒有提出要原样，所以只要建就好，至于形式估計是不会有意見的。事实上它既是公共娛憩之处，也必須要考虑到今天生活改变的需要，而旧样也并無可留戀之点。因此，这种保存和我們一向所說的保存有点不同，写在一齐，需要有个分别才不至混淆，不得已暫加似乎两字以示分別，如何才能正确，趁此提出，希望大家討論。

話归本題。保存的标准，照上面那样一归納，問題就来了！具体做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对这項事業很熟悉，就会無法分辨什么是該保存的，而我們又沒有能力只憑文字就能逐条逐項具体写成鑒定条文，就是遇到实物，也还需要运用已知的知識和其他实物分析比較，才能得到个相对的結論。是不是可以想出些簡易的办法，减少一些工作上的困难呢？于是我从中找到有两种性質的建筑較易作出决定，这就是：

1. 唐代及唐代以前的磚石建筑物，宋代及宋代以前的木构建筑物。因为这时期的实物少，現在已知的不过一百余处，我們仅从时代上就可以决定必須保存，在工作中只要具有一些判断时代的知識就可以解决問題。

2. 成組的大建筑群，这个概念是比較空洞，不过按照我原来提出的解釋和举例，也还不至于無法辨别，也还不致于弄不清大到什么程度，这理由只要再看原文便明，無須多說的。

主要是我的原意并不是說除此以外都不保存，以致使人憂虑在四川、云南、广西、貴州等处，沒有宋代以前的木建筑，就会影响到古建筑的生命，而是在茫無边际的标准中，有了这两个較肯定的标准，会給具体工作解决一部份問題的。那么在此以外呢，就只好用第三个标准去衡量了（也就是我原文中提出的第一点）。这是要提出具体实物，請专家来研究評定的，它沒有时代、类型等等的限制，完全取决于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至于我举的例子确实欠考虑，使得它缺乏代表性。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只举了近代的而缺少古代的。我想早至古代長城（它对保衛国家起过重大作用），晚至太平天国諸遺迹（它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遺迹），应当都举出来。而蒲松龄故居是不是在我們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呢？我看不是。聊斋志异是一部好小說，我們对它的作者应当表示相当的敬意，但总不能成为我們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那么，現在的一些名作家、画家，在工業建設上有供献的工程师等等，将来难道都要把他們住过的房子作为紀念性建筑，永久保存下去嗎？

我不否認，这种性質的問題必然会有不同的認識，需要爭鳴，但不是临到發生問題要拆时去爭鳴，而是現在就該开始爭鳴。还有魏明同志看不出薊县观音閣、应县木塔如何能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內容，而我却是看得出的，这也是对于建筑艺术上的認識問題，也是需要爭鳴的。不过，限于文字的性質和篇幅，这两个問題最好另作专题来討論，在此不再多說了。

元代的建筑是不是比唐宋的建筑少，这只要以山西一省的統計就可以說明。在山西省元代建筑有两千处以上，即使其中有些判断不够正确，打个对折也有一千处以上，那是远远多于唐宋建筑的。趙县大石桥、登封嵩岳寺塔、薊县观音閣、应县木塔四項，在原文中既可屬于第一項，又可屬于第三項，确实有点含糊，現在換四个例子如下：泉州洛陽桥、正定料敌塔、定兴慈云閣、万泉飞云楼。好了，例子总归是例子，它不是开列詳細名單。魏明同志对于我提出的評价标准都表示同意，只在所举例証上反对，又沒有提出正面的意見，是什么意义呢？这倒使我有点为难，看了好几遍，才悟出是个数量問題。

原来他計算了一下后，感觉要保存的太少了，他是贊成多保存的，而我反对多保存。在写那篇文字时，我沒有从数量上考虑过，只是提出了一些衡量的标准，如果同意这些标准，就不能在衡量后感觉数量少而不滿意。如果覚得标准不对，我热切的盼望大家多提出些标准来，于是才可爭鳴。况且現在我們还沒有掌握到全部材料，調查工作才在开始，这个“少”又是根据什么統計出来的呢？

苏联和日本，在他們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对于前一代的建筑物，具有不同的保存条件，今天他們保存着古代建筑的数量，是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我們的历史条件既和苏联或日本不同，就不应当从数量上去作比較。我国是世界上一个文明古国，我們为保存着古代文化优秀的物質遺产而感到光荣。我們要繼承遺产，从中提取精华为今天的事業服务，决不是不問好坏，只要保存着龐大数量的古建筑就可以称耀于世界的。

• • •

我所說的街心建筑物是指过街楼、过街塔、鐘鼓楼之类，也还有北京城內的地安門、四牌楼、三座門之类，不过既冠以街心二字，那就必須是拦在馬路当中的。保存它不影响交通就不会妨碍新生活，影响交通就一定要妨碍新生活。現在不影响交通，明天由于都市發展需要增加車輛通过量，就又影响交通。这不是我們想它会不会的問題，而是在一定时間一定地点要發生的問題，拆不拆是由一定条件作决定的問題。照我看，如国子监牌楼之类，到了必需的时候是可以拆的，其一，因为它拦在馬路中心；其二、这样的牌楼多着呢，北海、頤和园、日壇、月壇、地壇等范圍內各有好几个，这些地点都是現在的公园，或是計划中的公园，牌楼在公园中是具有較多的保存条件的。它們足够供給研究牌楼的需要，何必一定要保存橫在馬路当中的牌楼，給城市建設工作增加困难呢！这些牌楼的价值，又从何处可以断定是比頤和园、北海里的高出一等呢！

北京的鐘鼓楼，張家口清远楼（应当是宣化不是張家口），西安鐘鼓楼，聊城光岳楼之类，确实值得考虑，要保存一些。这类建筑真正好的并不是太多，其中有些确实具有代表性。但是也并不需要全部保存，应当搜集全部資料加以研究，确定那些是非保存不可的，那些是在必要时可考虑拆除的。因为保存这样一个建筑物，究竟还是要給都市規划增加困难和負担的，我們要衡量一下两者之間的輕重，不能只从一面着想。在考虑都市中古建筑保存問題时，必需密切的和都市規划工作連系起来，避免片面的、單純的只强調保存古建筑而忽略了全面的利益。

· · ·

关于城墻問題，我那篇文字只是指現在各市县的城墻而言，太簡单太片面了。魏明同志既指出了我的錯誤，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新問題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指的城墻，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不同性質的，而且应当有不同的对待。这就是：长城、現在各市县的城墻和古城遺址。

一、长城要不要保存呢？要的，如何保存，則又須待爭鳴。現在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約三千余公里，加上某些地方有分枝的部份，总計在四千公里以上，它主要是明代所建或修改的磚墻。还有沿着这城主干的北面及嘉峪关以西早期的长城，以及东北境內的边墻，包括不同时代用土或石塊堆砌的在內。我認为都应当保存，因为它是在历史上起过保衛国家作用的重大工程，同时对我們研究历史地理有重大的作用。

然而在具体实行上，对于这样大規模的遺物，是难于全部保留的。它們現在保存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还完整，大部份已是頹墻敗壁，或者殘存的土石堆。如果要全部永久保存下去，势必大加修理。以最近修理八达岭經費計算（这是現存长城中保存得較好的一段），每公里費用至少三万元，四千公里就要花費一亿以上，这个数字可以修建好几个工厂，如徹底修理还远不止此数，相应需要的物力人力更是龐大，以現在的情况說，我認为是不应当这样做。比較确实可行的办法，还是就各时代各类型的长城、边墻，选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段落及主要关城，作为永久保存的部份，其他部份只是一般性的保护，旣不必特地去拆除它，在必需的时候也应当拆除它。

同时，为了保存长城，我認为应当进行一次測量工作。我們至今还缺乏一份精密測量的地圖，这个工作国家必然会进行的，我們应当参加进去，把明代长城和更古的长城遺迹、边墻等等都詳細紀录在地圖上，使它在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上起积極的作用。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較多保存实物更高得多的。

二、現存市县的城墻。全国二千多个市县，没有城墻的寥寥無几，这是我国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产物。現在各城市不發展則已，如要發展，城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而在我們向社会主义發展的过程中，不必怀疑，每个城市都将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只是时間上有先后而已。因此，城要不要保存，在全国旧城市發展中，是一个普遍的、重要的問題，必須寻求正确的处理方法，这是有賴于大家来討論的。我的意見仍然是：“除了有些城楼角楼外，一般說没有特意加以保留的必要，……当然我們也無須特意去拆除城墻。”这里我說的一般，所以并不反对选擇几个典型保存起来，只是在选擇时也必須注意有無保存的条件。

城市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居住、工作、娛乐的集中地，交通是达到上項目的的重要手段，所有城市的功能都是如此。旧的房屋缺乏下水道，衛生条件不良，旧的手工作坊不能安裝新的生产設备，旧的戏院不能容納較多的观众，旧的道路不能适应新的交通工具，以及缺乏自来水、电灯、公园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必然隨着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改造、增加。任何一个城市，只要还有人在城市中生活，就必然發生这些問題，也必然逐渐改变它原有的形式。要想保存一个封建社会典型城市的形式，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城市規划上說，旣然城市不可能全部

保存原状，不能从具体实物中去認識古代城市的形式。那么仅仅保存着包圍它的城墻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它只能說明某一城市的面积是方是圓，或其他多边形而已，这对于古代城市規划的認識和研究，其意义太微小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阻止城市不發展，而城墻这个死圈圈，給城市發展带来的阻碍却是太大了。它本身实在只是簡单的夯土和磚砌工程，这是到处都可找到的，所以沒有保存的价值，至多只保存几个城墻角楼之类就够了。

以北京市为例，将来的北京市要比現在大好多倍，現在的城圈以內仍然是将来的市中心。在这个中心的中心被故宮占据了，它是从十五世紀开始約五百年中的建筑精华，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古代宮殿，要保存它是誰都沒有意見的。仅仅为此就必須建設环繞这个中心的道路（当然还有其他必要的理由），使各个方面的交通能連系起来。是把城墻拆掉利用它的基地改成环道呢，还是拆掉大量房屋新辟一条环道呢？我看拆除城墻是比較有利的。留着城墻另辟环道就会形成这样情况：圜道的临近永远有城墻阻碍着。为了交通当然可以处处打洞开辟豁口。無奈靠近城墻要保留相当的空地，因为靠着它建房屋时，将会有一面永远看不到陽光。所以我說頂多保留几个城楼角楼就够了，而且还要看条件，不是全部保存。

我們不能以苏联和其他国家为例，他們把城墻作为古建筑文物保存，是根据他們自己的历史条件作决定的。我仅仅知道苏联的斯摩棱斯克是在保衛祖国战爭中起过作用，同时是建筑艺术的創作，不像我們的城墻这样簡单，仅此，就比我們具有較多的保存理由了。关于城市，最好的保存方法，我仍然建議多多的保存实測圖紙。

三、古代的城市遺址，这是指早已就被廢弃了的城市。像南京石头城那种性質的較少見到，像曲阜魯国故城这样的則較多。石头城已在前面說过，这里只說魯国故城之类。現今可以举例的还有齐国故城，赵国邯鄲，燕国下都，汉长安等等。它們除了建筑的意义外还有考古学上的意义。从建筑上說，現今所存的都是土城的殘存部份，能看到城圈的范圍大小和散布在城內外的土台——当时建筑物的遺迹。其他的东西是需要經过發掘后才能知道的。就現在所知道的資料推斷，能否發掘出重要遺迹，能否帮助研究古代都市規划諸問題，是把握不大的。因为他們并不是由于天然灾害一下子湮沒下去——像意大利的龐貝城那样，而是人为的廢弃。在廢弃后变为耕地，經过千年以上的耕种，当时道路街坊恐怕不易寻找。而現今存在的土城，在可靠記載的帮助下，尙可指出城門所在（如汉长安就是一例），如無記載或土城保存过少，就連城門位置也不易寻找（魯城、邯鄲城即屬此情况）。而那些土台，恐怕除了汉长安之外，其他各处都不能指出原来建筑物的名称了。

表面观察和推測，当然不能代替發掘的，所以我仍主張保存，但也不主張全部保存。我認为应当保存历史上著名的古代都城和确实能証明保存情况良好的古城。一般的廢城遺迹，或者确实知道地面以下已無足供研究的遺迹的古城，是可以不保存的。以山东一省为例，在經过初步調查之后，他們列出了三百多处古城遺址，是不是全部有保存的价值，我以为应当深入研究再作决定。虽然这类古城没有繼續發展的問題，但是免不了会和工業基地、农業生产發生矛盾的，我們不要讓廢弃了的、在历史艺术上并無多大价值的土堆，阻拦工業建設或拖拉机的道路。

以上关于古城遺址的問題，我仅仅是从古建筑这个角度上而說。至于在考古学方面，是会有更重要的意义的，所以古城遺址要保存那些，最后是要由考古学家作出决定的，我們既是外行，就無从置喙了。

• • •

古代物質文化遺物的保存，对于新文化的建設，有积極的作用，是繼承發揚民族文化的泉源。我們負担着保护古代文化遺物的責任，对于古文物的爱好和希望多保存，是必然的。但是文物也有消極的一面，它对現实生活往往有阻撓作用，發生矛盾。如何使这个矛盾辯証的解决，正是保护文物工作者的主要責任。

在文物中，如石器、銅器、磁器、繪画、書法等等，屬于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或艺术品等类的，它們便于保存，不直接妨碍新生活，只要盖几間倉庫、陈列室就能达到保存目的。而建筑物的保存需要付出大量資金、物资、技术力量，这些物力、人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所最急需的。我們要尽一切力量，增产节約，尽可能快的建成社会主义的工業国，就不能不愼重考虑，衡量輕重。何况一些建筑物还直接阻拦在前进的大道中心。

在古建筑的保存中，我們只应当堅持必要的实物和在現今生活中仍直接有积極作用的实物。除此以外，我們要尽力多保存圖紙、攝影和文字記录。

八年来安徽地区的革命文物征集概况

李　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中国工农紅軍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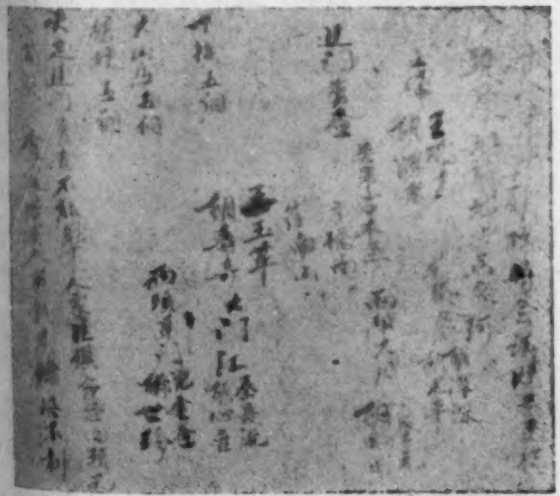
一、八年来的革命文物征集工作

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中国人民經过长期艰苦奋斗以后，获得了徹底的胜利。这一段革命时期是我国历史空前的变革时期，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所保存下来的革命活动遺存，对于今天来說，是特別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紀念意义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革命文物不致散失，特在各地建立革命历史文献实物收集委員会（后改为文物管理委員会），从事革命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工作。几年来，这一工作的收获是很大的。

安徽既然是革命历史悠久，革命活动区域較广的地区，因而所遺下的革命文物和历史遺迹是很丰富的。还在反动政府統治时期，前安徽省文献委員会的工作人員，就通过多种方式，秘密的收藏了不少抗日战爭时期及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文献实物。

解放后，皖北区和皖南区革命历史文献实物收集委員会，以及皖北、皖南人民文物館和現在的安徽省博物館筹备处，担負起革命文物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七年来，除經常性的零星的征集外，并派人深入老区根据地进行調查搜集。1950年6月間，曾



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岳西响腸河地区农民协会会議記录

派两人分往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的歙县、涇县征集；同年冬季和1951年春季配合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在皖南征集历史文物及革命文物，1951年8月、9月，随皖南人民行政公署組織的老区訪問团，又到歙县、黟县、休宁、太平、广德、繁昌、宁国、涇县、旌德等地征集。1953年4月，安徽省博物館筹备处成立后不久，派員深入到大别山区的六安、金寨、霍山、岳西、潜山和抗日战爭时期主要根据地之一的銀屏山区（在無为和巢县境內，新四軍第七师即駐此）；1954年往南陵、繁昌、祁門、休宁、涇县等地；1955年到了宿县、阜陽、太和、渦陽、亳县等地展开了征集工作。在这几次的下乡征集工作中，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們深深的体会到：首先是各級党政領导的重視和支持是搞好工作的关鍵；第二、要掌握堅持革命斗爭的重点地区，尤其是交通閉塞的山区，这里虽然經过敌人残酷的屠杀搜查，但是由于群众政治覚悟高和穷乡僻壤的关系，因而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物还是比較多，尤其是革命遺迹是非常丰富的；第三、在工作进行前和进行当中，必須与曾在該地区堅持斗爭的負責同志以及有关人士取得联系，探求文物綫索。这样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第四、配合中心任务如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老区訪問团以及优撫工作进行搜集，給工作上以很大的便利；第五、征集要与宣傳文物政策法令結合，配合征集举行小型革命文物巡迴展覽，以实物事例教育群众，使大家認識什么是革命文物以及保存革命文物的意义，在进行搜集工作时，就可取得广大群众热情的帮助；第六、征集工作人員必須熟悉当地革命斗爭历史，具备一定的政治水平，并能吃苦耐劳，工作要細心和有耐性，因为革命文物、遺迹多保存散布在較隐秘的地方，不深入革命地区，不深入群众，是难以期望有什么重大的收获的。此外，还应該把科学研究貫串到搜集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这是搞好工作的根本保証。

二、征集到的革命文物

安徽省博物館筹备处所藏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文物資料約五千余件，內容相当丰富。現仅就每一革命阶段的文物資料簡要的介紹一下：

1. 党的成立和五四运动时期文物：这个时期的材料征集到的比較少，主要的有对中国革命运动具有偉大的啓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1—9卷，1915至1921年上海众益書社和广州新青年社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主編的"少年中国"（1919—1920年出版，第1卷第8期載有毛主席和張聞天副外長入会消息）、"少年世界"，北京大学于1919年出版的"新潮"，1920年在杭州出版的"錢江評論"，以及广州人民出版社1921年出版的馬克思著袁讓譯的"工錢劳动与資本"、列宁著李立譯的"劳农会之建設"，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主任为邓中夏）1921年在上海出版社的"劳动周刊"——它是中国职工运动組織的最早的一种机关报，当时对組織和推动工人运动方面曾發揮重大的作用，是一种非常珍貴的革命文献。

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物：重要的刊物有：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中央机关报"响导"周刊（广州国光書店發行）、毛主席主編的国民党机关报（国共合作时期）"政治周报"。前者闡明党的政治路綫和斗爭方向，后者对国民党內戴季陶等反动分子給予猛烈的打击。还有少年国际执行委員会1924年出版的"少年国际"杂志（中文）、惲代英同志等主編的"中国青年"周刊（1924年在上海出版，創刊于1923年）、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的"国民革命与农人"、"国民革命"（惲代英編，1926年中央軍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級"（楊光編1927年印）等書籍。这些書刊曾动員和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使他們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战爭。这些文献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領导正是这一胜利的基石。另外，还有許多"五卅"运动时的傳单，其中有上海五卅慘案閘北后援会的"为上海英、日人殘杀我国工人学生、市民敬告全国同胞書"、"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宣言"，五卅慘案安徽后援会和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等各种声援五卅运动的宣傳文件。这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發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吼声，曾震撼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軍閥的反动統治。

3. 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文物：在文件方面，有岳西响腸河地区的农民协会会議記录及議单（1927年），农民組織暴动的会議記录（1929年），鄂豫皖省皖西北道政治保衛局1923年出版的"支部小报"（討論怎样反对富农）、"工农联盟入会表"（1930年）"皖南革命委員会农民革命团入团表"（1934年）、"中共皖南省委入党表"（1934年）等。这些材料标志着革命斗爭由城市轉入农村，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掀起了翻天复地的土地革命，从而为工农联盟奠定坚实的基础，把革命运动推进新的高潮。还有鄂豫皖省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32年），中国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为中国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等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其他有紅軍第十五軍第四十三师政治部印刷的"劝女子剪髮放足歌"、潛山县革命委員会文化委員会翻印的"革命小調"，这些歌鼓舞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爭情緒，也是值得重視的。圖書方面，有中国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二师政治部1930年印的俄郭范舍著、王伯維譯的"新社会观"和翻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斯徒夺夫著、瞿秋白譯的"無产阶級斗爭之战术与策略"（1928年）等。武器方面，有世代相傳用来自衛的古式长短刀、錐、矛、土槍、抬槍、較新式的自制的手榴彈。工农紅軍就使用这样粗劣的武器，多次的粉碎了以帝国主义为后盾的反动軍队的大規模的圍攻。还有带"中国工农紅軍"、"六安县第六区第十二乡赤衛队"、"第二十五軍十五师"（外面）"皖西北分会独立团"（內面）等字样的袖章和中国潛山紅軍第三师第二团团长王焰青、工农革命軍胡家汉等人的符号。这些东西是老区人民冒着生命危險，保存了近二十年的最珍貴最荣誉的紀念品。此外，还有工农民主政府發行的銀元、銅元、紙幣、公債券、兌換券以及霍山六区五乡工农民主政府土地委員会长木戳等重要文物。

4. 抗日战爭时期：这个阶段由于日寇的瘋狂的侵略和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积極反共，斗爭是十分尖銳复杂的。这从現存的許多文物里也可以表现出来。当时党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展开对敌斗爭。这里有新四軍团长傅秋濤、

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皖西北分会独立团袖章

主任江渭清召集土塘（屬南陵县）防地行政人員和社会人士参加座談会的通知、朝鮮独立同盟总盟和朝鮮义勇队华中支队劝告日軍旧朝鮮士兵投降八路軍新四軍的傳单。其次，党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結有斗爭的政策，击退其反共高潮。表現在这方面的宣傳品，有八路軍将領駁斥陈誠污蔑八路軍“游而不击”的电文，新四軍江北指揮張云逸为反对內战、巩固团結給李品仙的电文，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員会为皖南新四軍被反共軍陰謀聚歼給新四軍将領电报等。再次，党对日伪則揭露其罪恶陰謀、瓦解日伪軍。这方面文件有陆軍新編第四軍第二师师部、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淮南苏皖边区軍区司令部联銜頒布的敌伪軍和伪組織人員来归保护办法的布告，新四軍日文标語傳单（鼓动日軍反战），新四軍第七师告伪四师十二团官兵書，路西联防政治部告日本及被压迫的中国弟兄書等。

在經济方面，为了打破日、汪、蔣三方面的封鎖，自力更生，实行合理負担，并建立了新的賦稅制度和貨幣制度。主要材料有定远县政府1940年救国公粮收据、無为县政府1941—1945年的粮賦串票、皖中財政經济委員会1743—1943年的稅契收据、皖南专署財經分处稅率表(1945年)等。貨幣有江淮銀行、淮北地方銀号、淮南銀行、大江銀行、豫皖苏边地方銀号等發行的鈔票，还有其他机构發行的公債券、流通券、本票、粮票、飯票等。这些对經济流通和發展生产、支援抗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文化战綫上，当时虽然物質条件極端困难，由于党的重視，出版了大量的圖書报紙杂志，發揮了高度的战斗作用。报紙方面，在安徽地区主要的有新四軍政治部和江北指揮部出版的“抗敌报”（分別在涇县和廬江两地出版）、新四軍第四师和淮北苏皖边区出版的“拂曉报”（1938年在河南确山竹沟鎭創刊，以后随部队移动，最后在安徽泗县出版）新四軍江北游击縱队政治部在無为开城桥出版的“战斗”、新四軍第七师政治部出版的“武装”、皖中行署出版的“大江报”等，省外的有在汉口、重庆出版的“新华月报”、延安的“新中华报”、江苏盐城的“江淮日报”等。杂志有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中国青年”，汉口和重庆出版的“群众”，华中局宣傳部出版的“眞理”，八路軍政治部出版的“八路軍軍政杂志”新四軍抗敌社（在涇县）出版的“抗敌”“指南針”（即“共产党人”），新四軍二师政治部出版的“文化与娛乐”，江淮出版社出版的“江淮”“江淮文化”，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出版的“政府工作”等。圖書方面，有毛主席的著作，如“論持久战”“論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論”“論联合政府”，朱副主席的著作“論解放区战場”的各种版本，新四軍抗敌社出版的“論共产党”(1940年印，解放社編)，“抗战二周年紀念册”(1939年)，新四軍政治部出版的“新四軍殉国先烈紀念册”(1943年)、“一年来作战的經驗与本軍的建軍工作”(項英著，1939年印)、“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邓子恢著，1941年抗敌出版社印)，战文社（在涇县）1939年出版的“向敌人的腹背进軍”（丘东平著），淮北行署教育处1944年油印的“中国史話”上册（許立群著），新民主报社1941年出版的“中国現代革命运动史”(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整風文献”（1943年），中共皖浙贛特委翻印的“新党員訓練大綱”（1938年油印），中共盐阜地委宣傳部編印的“1944年減租增資总結”，路西办事处第三次財經会議彙刊等。值得特別介紹的有两本書籍，一本封面書名是“醒世通言补”，出版者是“徐州国風書店”（1945年印）里面內容其实是“論联合政府”；一本封面書名是“浩然詩話”（出版者同前），实际是“論解放区战場”。这些珍貴的文献材料反映了在反动政府的严密統治下，文化斗爭的尖銳复杂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証件、旗帜及其他重要文物，如：新四軍抗屬証明書、八路軍荣誉战士紀念章、苏皖边区临时参議会証章和紅紙粉笔繪制的党旗以及布質墨書的入党誓詞（繪有鐮刀斧头和馬克思、列宁的像）等。其中党旗和入党誓詞是特別值得重視的。

5. 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这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斗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征集到的文物是相当丰富的。主要的有：旌涇太县政府印、績歙旌竹峰乡政府鈐記、皖南財粮局印、涇旌太地区田亩土地登記簿等，这些文物标志人民政权的日益發展。还有新四軍皖南游击部队（洪林同志部）發明的专用来攻敌人碉堡的黃檀木炮，新四軍皖南部队、江淮軍区政治部、黄山报社等印發的布告、标語、傳单，以及华东野战軍政治部制發的中共临时党員証，新四軍軍撫恤委員会的殘廢証書，苏皖边区政府的荣誉軍人証明書等，也都是很有意义的紀念物。

此外，各时时期的烈士遺物和革命遺迹也作了征集調查。烈士遺物有曾任鄂豫皖边区工农紅軍第三十二师党代表陈缺烈士的軍服、武器，有曾任安徽省委的王步文烈士的詩文稿，有曾任中共东滿特委書記的童长荣烈士的家書，曾任皖中行署主任的吕惠生烈士的日記，皖南事变后被捕入獄的休宁吳軍烈士的“獄中日記”等。革命遺迹拍攝照片的有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皖西北道工农民主政府、新四軍和各地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紅軍二十八軍、皖南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新四軍等(下接81頁)

徵集鄂南大幕山区革命文物总結簡报

湖北省博物館革命文物征集小組

湖北南部的咸宁、通山、崇陽、蒲圻一带，为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在湘、鄂、赣三省的边界地区有九宫山脉綿亘着，大幕山雄踞于咸宁、通山之間，其山势雄偉而险阻，西向粤汉綫經高桥街可控制粤汉綫上的重鎮汀泗桥、賀胜桥、横沟桥等地，土地革命时期，在这里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打倒了封建地主，进行了土地分配，当时在湘鄂赣道委的領导下，在大幕山区成立了紅軍独立第三师，地方上普遍成立了赤衛队、兒童团等組織，在这个地区遺留的革命文物是很多的，土地革命失敗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根据地的革命群众，进行了殘酷的鎮压与屠杀，人民群众被迫得到处迁徙，流离失所，革命文物能够倖存下来的已不多，在敌人長期的反动統治之下，根据地数度的遭到敌人和日伪的进扰，房屋被焚燒，到处都是一遍殘垣廢墟，革命文件、印信、袖章、符号等不易保存的文物，大半随之被焚燬，刀、矛、匕首、炸彈等革命武器，都是經过了極其曲折的过程（沉入陰沟、池塘、山洞等处，才得保存下来。

湖北省博物館为了蒐集湖北地区的革命史料，組成了革命文物征集小組（包括繪画二人，摄影一人，革命文物展覽講解員二人），进行了短期的業务学習，其后，以一个月的时間，在大幕山区进行了重点的征集。

在下去之前，首先是作好一切的准备工作，臨时印制了文物登記記录表，革命遺址調查表及編号标签等。到达咸宁县城后，即与党委宣傳部和县人委文化科取得联系，爭取領导的重視和支持，并介紹了当地革命地区和經过情况，以后即展开了一般的宣傳联系工作，散發了有关的宣傳資料，在咸宁报上刊登了征集革命文物啓事，并与在县参加烈軍屬轉業軍人社会主义建設积極分子代表大会的烈屬代表举行了座談，由代表們介紹了他們所能够記忆的当时革命运动的情况和先烈們的革命事迹，并在这个会議上，爭取領导作了統一的动員与布置，动員代表們从多方面提供綫索，广泛宣傳，协助我們的征集工作。这样，就給征集工作造成了先决的有利条件。在县城里停留五天，經过联系，机关、团体、学校捐贈了一批文物。工作組在与县委宣傳部及文化科磋商，征求意見后，决定了下乡的路綫。

高桥乡（即高桥街）是大幕山的出口，为当时赤白区交界的地帶，是当时紅軍的游击区。我們在这个乡經与农業社联系和作个别訪問，征集到通知、公粮票、烈士遺照、革命武器等多种，并訪問了“大屋李”黃永胜同志的故居。在泉山乡調查了桃花尖、飞机墩等地的革命遺址（桃花尖、飞机墩当时均先后是县革命政权所在地），征集到革命武器刀、矛及鄂东兵工厂所制造的炸彈、紅軍歌曲、兒

大幕山岩石下的穴洞，紅軍曾住在这里坚持和敌人斗爭

1927年土地革命时期，泉山乡革命委員会后方保衛組曾設于此

軍团警笛、抗战时期日寇的炮彈（未炸的）以及蒋鴻鈞同志幼年学習所讀的法学書籍等。征集到的革命文物有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爭时期和解放战爭各个时期的，計有文件七十件（包括工农民主政府頒布的宪法大綱草案、紅軍步兵操典、紅色小报、紅色兒童等珍貴文件），照片六件（包括何功偉烈士遺照等），革命武器七十二件，旗頂一个，回忆录十二件，其他文物十一件，共計一七二件，調查了革命遺址七处，另拍攝一部分照片和画了遺址写生画等。

在征集工作的过程中，对征集到的革命文物，要求随时做好科学紀录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編号、登記工作；对时間久远，易于損坏的文件，都随时装进牛皮紙袋，作了适当的保养工作。

在工作方法上掌握得比較灵活，沒有死扣日程和机械的去执行工作計划，而是看在一个地区的工作完成的程度如何，再决定进程。每日白天里分别出發訪問征集，晚間小組彙报，針对每日不同情况，逐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并作好工作日志。在这次的征集工作中，同时也征集了社会主义建設和山区农、副業生产情况的資料。

在工作組所經过的地区，通过了征集工作，与当地的乡干部、农業社干部、小学教师与农村中的知識分子建立了联系，互相留下了通訊地址，以便于今后的联系工作。

在工作中的几点經驗，值得介紹：

1. 在征集工作中，要紧紧的依靠領导与党委的支持，要依靠合作社干部、党团員和积極分子。事实証明，在大幕乡的征集工作中，由于支部書記柴德蓮同志亲自动員，亲自下手协助征集，便很順利的征集到很多的文物，如土地革命时期紅軍用过的軍号和印刷机（零件）等，农村中的青年团員和积極分子是征集工作中的有力助手，他們对博物館的工作和事業，都表現得非常热情，非常积極。

2. 要結合中心工作进行，不能妨碍中心工作。要做到从思想上动員。同时泛广的展开博物館業务性質的宣傳，将博物館的征集、陈列工作与革命群众、革命事迹、革命領袖与革命烈士联系起来，将革命历史与个人光荣結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将博物館的征集工作开展为一个具有群众性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3. 要反复宣傳为什么要征集革命文物，解除一些群众的思想顧虑，如在高桥乡"大屋李"征集了黄永胜同志的有关文物（照片与信札），他的弟弟黄叙元已經将文物贈交給征集的同志，并塡写了正式的收据給他。征集的同志出了門，走了二里路，他的哥哥又怀疑的从后面赶上了来詢問道："到底为什么要将老弟的照片和信拿走了，拿去有什么用場"？像这样的情况，都足以說明我們在征集工作中，宣傳工作做的是非常不够的。

4. 在征集工作中，同时也要考虑到陈列、設計、布置、装飾等多方面的問題。如这次征集了土地革命时期鄂东兵工厂的修械員陈明哲的回忆录，因为考虑到陈列布置的需要，就給他拍了一張照片。征集到日寇进犯大幕山所投射的炮彈（未炸），就結合将經过日寇炮火焚燒的灣村尙未恢复重建的殘垣断壁也拍了照片。将来在陈列时就可以将实物与照片对照的陈列起来，这样就更具有說服力。其他对大刀、矛子等革命武器的征集，也考虑到陈列的需要与方便，还要考虑到文物本身的代表性。

在这次征集工作中，也存在着很多問題和缺点，因为这个地方的山路崎嶇，灣村分散，所以感觉征集面和所联系的群众不够广泛，工作不够深入，只是檢几个比較突出的重点，进行了訪問征集，对地面上散存的文物，就难免有所遺漏。由于工作人員对厂史知識的缺乏和語言口晉不同的障碍，对当时全面革命活动情况掌握得不够，所作的科学記录也不够系統。今后拟再写信給当时在这个地区領导革命运动的有关同志联系，請他們写出回忆录来，对当时的情况，給以較有系統的介紹，以弥补这次征集工作之不足。建議今后，通过了征集工作，要与广大群众、乡干、社干、小学教师建立經常的組織联系（如發展博物館之友等），对博物館征的征集工作，将起到一个有力的組織保証。

一·把·椅·子

延安革命紀念館去年收到延安城关乡68岁梁書妮捐贈的一把式样簡朴的罗圈椅。

梁書妮的爱人吳汉章是个教員，1936年毛主席到延安时，曾經住在他的窑洞里。1938年毛主席搬到楊家岭时，把一些用具和这把椅子贈給了吳老先生。1947年胡宗南匪軍进攻延安时，搜去了这些紀念品，吳老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險从敌人的营房中把这把椅子夺了回来，藏在一个窑洞里。現在吳老先生已經去世了，他的爱人梁書妮珍重的把它捐贈給延安革命紀念館以作为永久的紀念。（延安革命紀念館賀宝賢）

积極准备条件为加强博物館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奋斗

——黑龙江省博物館傳达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精神总結报告——

黑龙江省博物館

黑龙江省博物館从1956年6月30日开始，至7月20日，集中用十二天的时間傳达了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精神，学習了陆定一同志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报告，同时根据会議精神联系館的工作进行了檢查与討論。

(一)傳达全国博物館会議精神的学習收获

通过这次傳达对全館干部有很大的啓發和帮助，主要收获可归結为以下三点：

1. 全館同志对博物館事業有了进一步認識。由于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館的性質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工作的方針和任务，从而提高了对博物館事業的了解和热爱，認識到了博物館事業是社会主义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向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科学研究提供資料的有力工具之一，同时也看到博物館工作的美好前途，大部分同志，特别是説明員同志为博物館事業服务的决心增强了，工作更加愉快和安心了。

2. 加深了对地志博物館工作任务和性質的認識和了解，进一步明确了地志博物館的發展前途和应努力的方向。大家一致認为博物館的各項業务工作都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作，或者就是科学研究的工作。清楚的体会到博物館工作的基础是科学研究，搞好博物館的科学研究是改进和提高博物館質量的中心关鍵，同时也明确了在博物館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針、原則和它的任务。

3. 在学習过程中作到了發动思考，發揚民主，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对館的主要工作及問題大胆的提出了意見，加强了各部間的互相了解和关怀，干部的工作积極性和学習积極性也有所增长。

(二) 对几年来工作成績及問題的估計

我館是在旧的博物館和黑龙江省博物館籌备处的基础上改造發展起来的，五年来，館的陈列內容不断在充实、更新。根据地志博物館的需要基本上完成了館的地方自然之部、历史文物之部、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設之部的基本陈列并配合地方的經济建設和中心工作，会同有关部門举办了第一个五年計划、反对美国細菌战等較大型展覽及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深入市县的巡迴展覽。館內共陈列出展品三千四百余件，其中社会主义建設之部最主要的三十件展品都是取得有关部門制作贈与的。五年来共搜集历史文物、資料、标本二万八千余件，其中历史文物一万八千件，革命文物二百二十件，自然标本八千件，社会主义建設与改造的資料二千件，現藏品共达到十万余件，圖書、杂志八万余册。大部分的文物初步的进行了登記、分类及鑒定。群众工作方面，对来館观众作到了殷勤的講解、导引和主动的組織工作，截至1956年6月末止，五年来共教育观众1,150,000人次。在科学研究及为科学研究服务方面除对館的各項計划、展品、陈列进行了研究外，完成了动物标本的整理、鑒定工作，建立了具有我省主要树种的植物园，發表关于地方自然界調查研究报告及論文六篇，并为50余个单位提供資料2000余件。

工作成績归結起来主要有三点：

1. 宣傳了党的政治路綫、各項方針、政策；向人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及文化科学知識的普及提高工作。在配合社会主义經济建設及各項政治运动上起了一定宣傳教育作用。

2. 为地方的經济建設提供了若干比較重要的文献及資料，在为科学研究服务及教学研究服务上也收到了一定的成績。

3. 进行了征集工作，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及組織陈列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础。

根据全国博物館工作会議精神，按省地志博物館的工作任务来要求，就檢查出来的問題来看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 就原有基础来看，突出的一个問題是館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的很不够。几年来对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也考虑和注意的不够。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的思想障碍是：首先在对科学研究的認識上存

在神秘化的观点，如認为館的科学研究工作仅是館內苏联专家的事，对我們一般同志来講科学研究則是高不可攀的。其次是存在片面性的理解，如認为陈列工作是研究工作，其他工作不是科学研究的工作，或認为博物館的工作就是摆希奇古怪的东西供大家娱乐欣賞；有的認为群众工作沒有甚么科学研究，把說明稿背会就行了。对研究的內容上也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認識，有的認为社会主义建設之部不能进行甚么科学研究。这些認識严重的影响了館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科学研究的工作中也存在某些科学研究和業务需要脫节，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缺点。如有的同志对科学研究和当前業务需要結合的問題認識不足，不能針对業务中的問題努力学習，刻苦鑽研；有的同志認为整理标本和鑒定文物不是科学研究工作。

2. 現有的藏品資料缺乏整理鑒定和翻譯，滿足不了陈列及研究的需要。各項資料也未能充分加以利用，發揮其作用。

对近百年史、少数民族以及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資料还缺乏应有的征集，如不抓紧进行将为今后的充实陈列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資料造成很大困难。

一个比較严重的缺点就是对过去博物館遺留下来的科学資料是不够重視的，甚至是存在某些粗暴的态度，对它在科学研究及經济建設上的作用和意义估計不足，我們接管以来对于这批資料采取积極措施不够。

3. 陈列內容还不够充实，有的陈列部門还比較貧乏。如历史之部的陈列还不能达到表現我們地方历史的要求，特别是近百年史还是个空白。現有的古代文物的陈列亦是停留在罗列文物的阶段，陈列品大部都是全国性的，地方的文物不多。在社会主义建設之部，缺乏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这个主題，对我省比較重要的林業建設的成就表現的不够突出，劳动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陈列还仅系圖表，沒有实物及模型。在自然之部，在各陈列部来講是比較充实的，但其中的某些室还比較差，有些內容与社会主义建設之部重复，表現改造自然及自然界的內在联系也不够。在陈列方法上运用景观法还須要作很大的努力。

在整个陈列中主題与主題，陈列品与陈列品之間的有机联系还差，特别是表現地方与全国的結合及少数民族問題是很不够的。在陈列形式及表現技巧上还不能完全适应陈列的需要，感染力不强，陈列品过于拥挤，光綫太暗。

4. 干部的数量不足，特别是質量不高，組織机构也不能完全适应新任务的需要。

总之，通过这次学習与檢查，一致認为館的潛力和积極因素还没有充分發揮出来。我們有信心在上級党、政的領导、关怀下，克服缺点，發揮一切积極因素，把館的工作提高一步，逐步解决上述問題。

（三）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基本措施

根据地志博物館的性質，地志博物館作为地方的科学研究的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地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及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室，它的任务是在以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关于地方的科学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蒐集藏品加以科学記录和鑒定，为科学研究提供資料；配合向文化科学进軍和党的中心工作举办关于地方的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設的陈列和临时性展覽，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識。結合我館的具体情况，館的当前工作应該是：在館內深入开展肃反学習及审干工作，貫徹“百家争鳴”的政策，規划事業远景，大力进行清理、鑒定藏品工作，为加强館的科学研究和扩充陈列准备条件，逐步的把館的工作納入科学的軌道，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

为完成上述任务，在下半年应进行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措施：

1. 成立規划小組，学習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規划和山东博物館的工作經驗，研究拟定我館以开展地方的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設的研究为中心的1956年——1967年的十二年远景規划。

2. 聘請、組織館內外的力量，开始对館內藏品及圖書資料进行清理、鑒定，逐步进行編目、分类、記卡等工作，确保藏品的安全，作到“妥善保管，取用方便”。

3. 結合对藏品的清理、鑒定和对文献資料的研究，对容易散失的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資料、革命文物、近百年史資料作有重点的征集，同时組織进行考古發掘工作。

4. 在加强說明員業务研究的基础上扩大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研究改进講解及导引工作質量，增加对观众的服务設施。

5. 为适应加强館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調整館的組織机构，拟定干部工作的长远規划，結合業务实踐加强干部的培养提高工作。

6. 結合工作認眞的学習和运用国內外兄弟館及苏联博物館的工作經驗，开展先进工作者运动，总結經驗，提高業务質量。

（四）对几个問題的意見：

一、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問題

1.要依据"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消除干部的思想顧虑，根据博物館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針和原則，对学术研究問題及業务学習問題提倡大胆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刻苦鑽研，逐漸树立在学术研究上業务学習上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風气，在領导上要經常的給以鼓励和支持，但也要注意浮躁、夸夸其談、不切合实际的缺点。

2.对館內苏联专家及老年同志要加强团結教育和尊重，努力学習他們的长处和經驗，也希望他們大力扶植和培养青年力量。

3.应該把館过去的資料当作宝貴的科学遺产繼承下来，首先要掌握这些資料、文献，有批判的有选擇的进行整理、鑒定，加以利用。

二、各項業务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問題

根据全国博物館会議提出"科学研究是博物館全部活动的基础"，"博物館的科学研究就在于博物館的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它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收藏文物标本工作而且在采訪、搜集、考古發掘的工作里，在整理、鑒定、收藏保管的工作里，在陈列說明的工作里，那一个工作是不需要科学研究的"，我們的体会是陈列計划的拟定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工作，其他如主題的确定，研究現有藏品，开展探查工作，征集資料、标本，編著科学报告等也都是科学研究的工作。征集工作要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去进行。要为館收藏的任务服务，从征集品来看其工作有：关于陈列所需要的展品的征集；对科学研究有价值的資料的征集；应該收藏保存的文化遺存的征集。

保管工作，在收藏文化遺存上負有特殊的任务，但也必須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如清理、鑒定藏品、資料，对文物資料进行科学的紀录編輯出版藏品目录等。經过这一系列的科学工作才能使藏品为館內外的科学研究提供資料。

群众工作在完成館的文化教育任务上負有特殊的任务，它是文化教育工作的最前哨，但它必須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很好的对外进行宣傳，对观众进行講解。

三　館的組織机构問題

我館的現有組織机构在适应新的方針任务需要上是有一定缺点的，根据館的人力条件，从便于集中力量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和为了根据任务需要便于培养提高干部出發，我們的意見按着苏联博物館的先进經驗部份的采取陈列、征集、保管、說明四位一体或者是陈列、征集、說明三位一体的办法有它的优越性，我們的意見把原有机构加以改組，把陈列部改为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設三个陈列部，把群工部暫时撤消，其人員并到各陈列部去。另外聘請館內外的专家組成館的学术委員会。

四　組織館內干部学習問題

在培养提高干部方面，中央要求在十二年內把現有高、初中水平的干部基本上提高到大学水平，大学畢業的都应有不同程度的成就。在改进学習方面的意見是：

1.学習和業务实践的相結合，学習和工作需要相結合。

2.学習內容、方法及規划是：

（1）加强馬列主义基本理論問題的学習，注意防止只重業务忽視政治的偏向。

（2）高中以下程度者主要在文化上提高，为进一步学習科学基础知識打基础；高中以上程度者学習专業知識。

（3）在業务技术学習上对博物館学大家都要学。对于具体的業务技术則根据不同室、部、每个干部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学甚么，不能过于强求划一。在学習業务技术的时候要注意業务基础理論的学習。

（4）組織俄文学習班。

其余如上夜余文化政治学校或大学旁听，到館外参观、考察，組織講演报告，专家傳授、带徒弟，閱讀文件等，都是可行的。

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博物館建立了"博物館之友"

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博物館筹备处，为了加强同群众的連系，活躍群众文化生活，有利于促进博物館事業之發展，先后建立了"博物館之友"。凡热心博物館事業，对历史、考古、民俗等有兴趣，愿意与博物館取得联系并能扩大联系作用的，由本人申請，經当地所屬机关（或党、团組織）証明后，都可以参加"博物館之友"。参加"博物館之友"后，可以参加他們所举办的各种学术講座；优先参观举办的各种专題、专室的陈列；閱覽圖書館的圖書等。同时他們也要帮助博物館做一些工作，如：宣傳博物館及其陈列的展覽活动；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見；宣傳文物政策、法令、保护文物；动員群众捐献文物；搜集一些所需要的陈列品或資料等。

（周愷）

記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館
（續）

李 文 信

16. 拉哈底城艺术館

拉哈底城在赫尔辛基东北方約一百一十华里，居民五万余，系新兴的一个城市，仅有五十年的历史，但都市規划建筑都是現代化的，市內只銅石雕像就有十五处，可見它是个年青而美丽的城市。該城有三个博物館：历史博物館正在筹备，民俗博物館还不健全，只有艺术館久已开放。該館有陈列室六大間，陈列品仅繪画雕刻两种，多十八、九世紀以来芬兰人作品，外国作品很少。陈列的繪画不到一百幅，多中、小幅，油画最多，有不少十九世紀芬兰名画家作品。其中有苏联大画家列宾的小幅油画和水彩人物画稿两幅，很受重視，雕刻品比繪画少，也多小品。該館九月曾举办了一个小型中国艺术展覽会，展品百余件，都是芬兰現代版画家杜赫格先生去年訪問我国时的搜集品和中国朋友們贈他的紀念品。計有战国、汉瓦当，汉画像石、空心花磚等拓本，清版芥子园画傳，荣宝斋各种版画，也有清代刻花銅爐、端硯、礼墨和近代雕漆瓶、白玉爐、竹雕花插、竹根酒杯、芙蓉石雕刻人物像等多种。这个特展在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幕，开幕典礼很隆重，邀請我們远道来参加，杜赫格先生也很热心的亲自前往。开幕时有拉哈底市副市长亲自参加，共有文化、艺术、新聞界人士四十余名，該城艺术协会主席致开幕詞，唐兰同志在会上也說了話。这个特展的規模虽不大，內容也較差，但却很能引起芬兰人民的重視。在招待我們的宴会上，艺协主席和博物館长都表示願搜集一些中国古代艺术品在博物館中陈列，請我們帮助他們实現这个願望。同一天，在芬兰北部另一个較大的城市里，也举办了一个与此相似的中国艺术展覽会。这都說明了芬兰人民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爱好和中芬友誼的不断增进。在几万人口的城市中，有这样一个艺术館，它又能随时作些特展活动，已經不錯了，若是历史館和民俗館相繼健全起来，这个城市的博物館事業的前途就更远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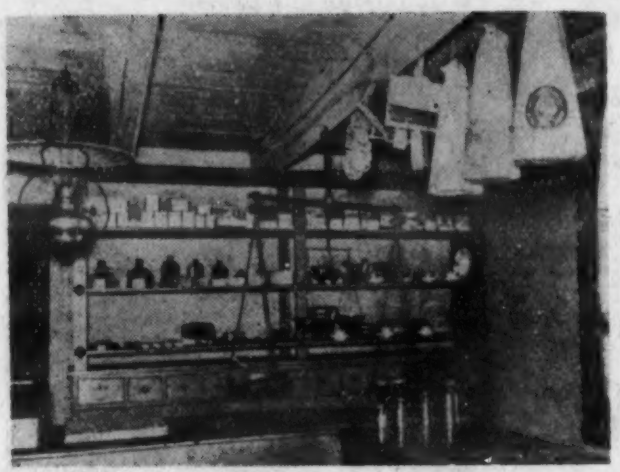
17. 土尔庫城教堂博物館

土尔庫城在芬兰西南端海岸边，是芬兰的旧首府，也是赫尔辛基以外最大、历史文化最悠久的都市。这座古城有各种不同性質的博物館五所，限于时間我們未得参观艺术館，古船博物館也仅在旁边走过两次。这是非常遺憾的事。古尔庫教堂在該市中心区河东，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經过后世扩建，規模是很大的。堂內保存了原来的一切布置形式和雕像、器具，原壁画还保存一部分，鋪地石用的不少刻字古碑，也都加意保护。教堂的二楼上是教堂博物館，陈列了有关这个教堂發展的一些資料和文物，其中有模型、圖表、宗教法器、仪飾、僧侶冠服、經帙、雕像等百余件。这里面包括了一千多年来的織染、刺綉、金銀鑲嵌、鍛鑄、繪画、鏤刻等技术文化，各項陈列品都有或长或短的說明文字，任人参观。导引的芬兰朋友說，看他們的教堂就是看他們的历史、看他們的文化，这話是不錯的。能利用这种宗教条件，給群众一些历史、技术和爱护文物的知識，也是个較好的办法。

土尔庫旧城博物館外景

18. 土尔庫旧城博物館

在土尔庫市中心区河东的一个小山上，是1827年土尔庫大火灾仅存的一小部分市街，后来保存下来，作了一个博物館。据說那次大火是斯堪狄那維亚古今唯一的一次大火灾，把土尔庫市街全部燒光，不得已才把首府迁到現在的赫尔辛基。这个大火没有燒掉的小街道，共存有完整的院落九个，不完整的院落七个，每院住有两三戶到四、五戶不等。大都是手工業作坊和家庭手工業者的住宅。这个一百三十年前的小巷，原模原样的摆在那里：低低的木板房、小板院墻和鏤花鉄件的木板門，天然石塊鋪的走道和台阶，一家接一家的拥挤在一起。从巷口望进去，可以先看到木柱上挂的方形路灯，也可以看到各戶門首高高悬挂的皮靴、鐘表、面包等各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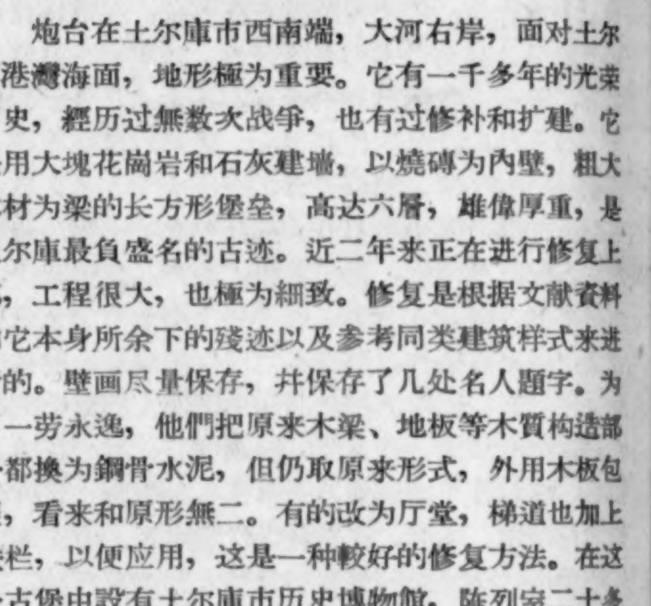
旧城博物館杂貨店一角

样生意的招牌。我們初到这条小巷里，几乎忘了它是一个博物館。其中住戶好几十家，主要的小商販和手工業有：杂貨鋪、木匠、鏇匠、印刷、装訂、釉陶、織布、薄鉄、金銀器、鐘表、彩花壁紙印刷、縫衣、皮鞋、面包等作坊。此外还有一些民宅和一个大学生的单身宿舍。每一戶屋內都保持原样，外部有必要时就按原有形状和質料及时加以修繕。在杂貨鋪里擺着貨架，貨窗上面罗列着上百种的各样商品，屋梁上也悬挂着各种貨色。帳桌、錢箱、各种賬本和賬中記載的年月、貨色、价格以及墨壶、羽笔，無不完备。屋梁上挂悬着大型天秤，柜台上放着五种大小不同的法碼。天花板上高挂玻璃灯罩，說明夜晚还在营業。金銀器作坊的工作台上可以看到几百种大小不同的工具：举凡熔金、展板、拉絲、捻綫、鑿花、透刻、鑲嵌、点翠、鍍金等工序中必要的工具都有。只制造金銀器用的內外花模型就有好几百件。产品的原坯、半成品和成品也都保存了不少。鐘表制造作坊器具更多，碓、錘、銼、鑿、刀、鑽、鉗、卡以及各种半机械半手工的器具，多不知名称，有的極为細小。墙上、桌上有各种挂鐘和坐鐘，柜匣有各式怀表。未完成的鐘表零件如發条、牙輪、針、摆等数量更多。在一般民宅中可以看到：厨房里的面包爐、鉄鍋、食桌、杯盘等食器。寢室里的有各种衣帽鞋袜和佩飾品，也有花毯和長絨毯；床帳、壁橱、桌椅、灯烛以及小孩搖籃，也都位置自然。待客室多有刻花木椅、柜橱和暖爐，壁上挂有像片或玻璃画幅，烛台和坐鐘常常在一起。这些手工業作坊在一定的节日里，都有年老的老工匠来表演一百多年前怎样制作釉陶器、織布、鏇木器、印刷版画和書籍等等。仅举这几个例子，就可以十分了解到这个博物館內容是如何丰富，如何引人了。該館印有成本的介紹說明書和圖片，各院有管理人兼为观众說明。这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博物館，也是一个善于利用特殊条件創建博物館的典型。

旧城博物館木工作坊內部

19. 土尔庫炮台博物館

炮台在土尔庫市西南端，大河右岸，面对土尔庫港灣海面，地形極为重要。它有一千多年的光荣历史，經历过無数次战爭，也有过修补和扩建。它是用大塊花崗岩和石灰建墙，以燒磚为內壁，粗大木材为梁的長方形堡垒，高达六層，雄偉厚重，是土尔庫最負盛名的古迹。近二年来正在进行修复上部，工程很大，也極为細致。修复是根据文献資料和它本身所余下的殘迹以及参考同类建筑样式来进行的。壁画尽量保存，并保存了几处名人題字。为了一劳永逸，他們把原来木梁、地板等木質构造部分都換为鋼骨水泥，但仍取原来形式，外用木板包鑲，看来和原形無二。有的改为厅堂，梯道也加上扶栏，以便应用，这是一种較好的修复方法。在这个古堡中設有土尔庫市历史博物館，陈列室二十多間，分別陈列有关土尔庫市历史發展的一切資料。这些資料都分类按年代先后陈列，主要的有：历史人物、宗教遺物、生活器具、衣飾、織綉、陶瓷、



旧城博物館皮鞋作坊工作台

旧城博物館制陶作坊內部

雕刻品、繪画、建筑殘件和少數考古材料；其中有不少是外国的輸入品，也有一些清代初中期的青花和五彩瓷器。陈列品的布置比較密集，柜架朴素，电灯照明，标題解說也都簡要。并發行圖片、說明書和关于古堡的专篇論著。堡下層有茶点服务部，游客可随时入內休息吃茶。这个古堡中的茶点部使用的木桌、木凳、火爐、橱架、鉄制花枝式烛台都是古代形式。女侍的明艳衣服也是十七世紀土尔庫城妇女們日常穿用的形式，眞是古香古色，参观者仿佛是进入了古代的土尔庫城。

参观了瑞典和芬兰的一些博物館后，我人發生了个几个感想：

1. 瑞典芬兰博物館中大多有外国文物艺术品的搜集和陈列，像瑞典人类学、远东、埃及三个博物館又是专門搜集陈列外国物品的。因此想到我們若为了不孤立的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給大、中学校师生外国史教学上的参考，备艺术家，建筑师的創作观摩，把我国历史科学研究領域扩大，就有必要早日考虑成立搜集陈列外国文物艺术品的博物館，或在有条件和必要的博物館中，建立外国文物艺术的搜集陈列部門。

2. 瑞典芬兰的博物館由形式、性質到內容陈列方法等，都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經营管理上有国家、城市、学校、工厂、教堂之別；形式上除一般博物館外，又有露天、旧城、古船、古堡、炮台等多种。在搜集重点、主題表現、資料組織和美术加工等工作上，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其相同处有理所必然的道理，并非互相抄襲，有特点的也不是标新立奇、譁众取寵，又能抓紧一切有利条件和机会，因地制宜的發揮每一博物館的优点和特点。

3. 在陈列展出上，他們一般都采取固定陈列和临时特展相結合的方法，来适当的解决陈列組織不能常变而群众又要求內容常新的矛盾。陈列方法多种多样化，也是解决这个問題的輔助办法。

4. 从他們的陈列資料具有很大的时代系統性、地域完备性和科学性，可以充分看出，他們的陈列展出是在有計划的考古發掘、資料搜集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有計划的發掘搜集研究工作，值得我們注意。

5. 瑞、芬两国对古代文物和古建筑保获工作非常重視，古堡，炮台在不断修繕，百八十年的一片里程碑要迁入博物館保存，旧風磨、古鐘楼都加意保护。現在我国农村不断發生破坏古墓葬和遺址事件，通都大邑也有拆除古代建筑和毁灭文物的新聞。过去北京市曾把西长安街两座保存完好的元代磚塔拆掉，这种磚塔若留在街心作为史迹保存，可給北京市增加很大历史光彩，是全世界都市發展史上从所未有的好条件；但我們都市計划部門和文化部門却作了这样惊人的处理。不久前北京市又把景山門西明代一組好典型的建筑拆下，还不知将作如何处理。我們痛感到我国文物保获工作需要加强，大力宣傳，防止破坏；不得已需要拆毁的也当愼重考虑，以免古代文物和建筑紀念物遭受不应有的損失。

（全文續完）

（上接第73頁） 在墻头所写的标語和繪的画，工农紅軍和新四軍为保衛革命政权歼灭敌人所筑的工事，当年組織暴动和坚持游击战爭的隐身之所——山洞（有的至今洞內墊草犹存）。通过这些遺物遺迹，使我們深深的認識到革命斗爭的艰苦和許多优秀的共产党員、革命工作者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高貴的品質。新中国是他們的血和汗培养成长起来的，他們偉大的英雄事迹，深深的激动着人們的心弦，将永远为人們所紀念。

• • •

总起来說，安徽地区八年来的革命文物征集工作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若与安徽革命历史的悠久与革命斗爭地区分布的广大来比較，这些收获还是很少的。主要原因是，征集工作还不够深入細致，宣傳工作也做得很不够，我們相信一定还有不少的革命文物散布在各个地方，尤其是老根据地人民和革命老同志保存更多。为了使我国人民民主革命斗爭的光輝的历史更加充实起来，为了紀念革命先驅者的永垂不朽的丰功偉績，为了以实物来教育广大人民，我們应該把所有的革命文物調查征集無遺，以供研究陈列，讓它們鼓舞、教育着我們永远前进！

文物工作報導

上海市　在廢銅鉄中發現明、清时代銅鉄炮

上海市文化局文物整理倉庫最近在閘北区广肇路收售廢鉄商賈偉卿处發現大鉄炮两尊。炮每尊重1400斤，上面鑄有"大明崇禎十六年二月吉日造紅夷灭虜大将軍"及"山海关"等字样，上面所鑄陽文，因銹得很利害，須仔細剔刷才能辨識。另外还有清代的鉄制火槍"大抬桿"一百余根，除去給上海历史与建設博物館筹备处挑选了二十根火槍和两尊旋風炮、江苏省博物館筹备处挑选了三十五根外，其余均在上海市文物整理倉庫保存。

該庫于1956年在有色金屬回收局上海倉庫的廢銅中，还檢出一尊清代嘉庆年鑄的大銅炮（重799斤，口徑19.7、长149.5、腹圍80厘米）上面刻有"嘉庆元年歼除苗氛委員监鑄"，"边疆永鎮"，"奉委监造炮位署(?)云南龙兴(?)胁右营"，"三司把总胡傑"，"四川炮匠韓怀錦尚登榜"五行文字。这是一件清代統制王朝鎮压苗族的重要武器。該銅炮已由上海市文物整理倉庫調撥給北京历史博物館保存。

（孙桂恩）

河北省　贊皇县城东廢墟上發現古塔

贊皇县城东南十里嘉应寺村西嘉应寺廢墟上，發現古石塔二座。配置方法与房山云层寺北塔相同，較大的八角塔居中，两座小方石塔在八角塔十米处东、西相对峙，相距約十二、三米。

贊皇八角塔

八角塔立于石台基上，分三層，約高十八米。台基以上为磚砌的須弥座（似后人所砌）。由須弥座的破坏处露出部份石座上刻花紋（即原来石座）塔身四面辟券門，另四面下部为直欞窗，上部雕有群佛。石塔完全做木結构，石柱、椽、飞、替木等皆有卷刹，三層塔簷皆剔出瓦飾，斗栱为六鋪作出三抄，一、三跳偷心，三跳华栱直托替木以承塔簷。二、三層塔簷基本相同，三層塔身正面有門半虚掩的假門，二、三層塔身上还有平台，下層平座已殘。三層簷以上有似露盘、宝瓶和宝珠。

两座小方石塔皆为六層，約高2.5米左右，下辟壼門，門两旁和上檻以上雕有兽面、盘龙和坐佛，可能是隋、唐遺物。

从建筑手法及县志記載嘉应寺（治平寺）为隋开皇三年建（距今1373年），隆庆五年碑文記有（为圖記治平籃石塔經兵火灾伤"……来看，塔早于明代，是否为隋唐原物尚待专家們研究。（馮秉其）

积極協助蒐集革命文物的王佐民同志得到省文化局的奖励表揚

河北省文化局奖励了一批对保护文物有显著成績以及积極捐献珍貴文物的人員。中共河北省委財貿部副部长王佐民同志，是这次受奖人之一，他曾积極协助热河博物館进行承德地区山区老根据地革命文物的蒐集工作。

王佐民同志，在抗日时期曾任兴隆县县长及县委書記，1953年冬热河博物館建立后，开始对抗日时期的革命文物进行征集，但当时对这一工作毫無經驗，王佐民同志在工作繁忙中，毫無拒絕而热情的答应了博物館的請求，共同研究討論了征集重点与綫索，开了数十封介紹信，請当时在無人区坚持抗战的干部与群众对这一工作給予帮助。

二、三年来，博物館征集工作人員在王佐民同志的多方面帮助下，征集到抗日时期革命文物千余件，其中極为重要的有：夜战九神庙杀日寇近百人的大刀、抗日英雄槍、炸死敌人廿多人的石雷殘片、1940年—1945年各时期党的各种文件、路条、粮票、通行証、西北峪（兴隆县境內）炸彈厂的炼鉄爐、黃土坡（兴隆县境內）坚持無人区的生活用具（木盆、木碗等）、戳記、公章及当时各种抗日用的土造武器、彈藥等。还收集了大部分抗日史料。1956年初，承德原热河省博物館曾进行了革命文物展覽，收到很好的效果。該館与河北省博物館合并后，已将这批文物运到河北省博物館，并将在今年內組織展出。省文化局为表揚王佐民同志这种爱护革命文物，积極协助征集革命文物的精神，特增送了奖状，以示表揚。（楊新生）

山西省

天鎮、陽高、陽源三县的农民大肆挖掘龙骨

今年一月間，山西云崗古迹保养所据雁北专署文教局电話通知："最近天鎮县有部分农民大肆挖掘龙骨情况"。保养所当即派員往天鎮县調查，据調查，在山西省天鎮、陽高以及河北省陽源三县的部分农民以挖龙骨为冬季副業生产。主要挖掘地区在侯家畔（屬陽源县）、油房畔、李二烟（屬天鎮县）一带。这种風气，已形成热潮，群众認为这是搞好冬季副業生产的唯一門路。在藥材公司大批收購下，每斤龙骨由一角四分增价到二角。据不完全統計，仅天鎮县藥材公司去年十二月一个月多的时間，即收購到四万余斤。在該藥材公司倉庫內，見到的动物骨胳化石有古生物头部、腿部和各类动物牙、角等化石。其中有一种动物头部化石，沒有牙齿，重23斤，其余多已殘破。据說陽源县陽塔村一个青年，曾因鑽洞挖掘，不愼被压死。

根据国务院1956年4月分發出关于在农業生产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精神，古生物化石是保护的对象，农民大肆挖掘，药材公司大批收購，是違背文物政策的。虽然我国蘊藏的古生物化石丰富，但是这样長期不断的挖掘，勢必造成不可弥补的損失。因此建議上級对乱挖龙骨的現象，采取緊急措施，加以制止。（山西云崗古迹保养所）

内蒙古自治区

凉城县發現古城及汉魏时代古墓群

凉城县三区左尉子村东北一里多，有东西长約八百多米，南北寬約三百多米的古城一座。現城址已成耕地，仅南面还殘留一段高約三、四米的城墻，其余各面城墻可隐約的看到殘迹。城北及城东南有滿汗山山脉及广闊的河流远远的圍着古城，城西南为坡形台地，数十里以外是土默川平原。城中出土完整的陶器仅有灰色小陶壶一件，陶片很多，有表面打印繩紋反面方格紋，表面細繩紋反面方格紋，附加堆紋并加連点的及青灰色弦紋陶片的，还有水藻紋的瓦当头。銅器有长約3.5，寬2.7厘米、上一面带"塵世紛华元，丹台姓字新，只应功行滿，归作玉皇臣"詩句，另一面有星官人物云朵等方形銅牌；带"男女降精，斩妖除邪，辟神佩之，永保貞吉"的八卦黃銅园牌；直徑4.5厘米，中有园孔，上带十二屬相的八卦銅园牌；双兽紋圓形銅牌各一件。有鉄扁鏃及三棱銅鏃，其中有带鉄柄的全长23厘米的銅鏃，有方形篆文銅章及人形銅垂飾器等。

古城西北一带为汉魏时期的墓葬群，出土以陶罐、陶罕为主，有灰色細泥質侈口磨光陶罐，口徑12.5、厚0.5、高18厘米，火候很高。同时出土的有"大布黃千"的篆文貨幣及"五銖"等。

上述銅牌形状，似与南北朝时代所盛行的压胜錢相仿，其文字似与道家語气相近。再就城中遺物情况及城西北一带被破坏的古墓出土物来看，断定古城年代可能是汗魏或隋唐时期的。（張郁）

吉林省

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宣告成立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員会，經过一年来的筹备，已于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

在召开首屆全体委員会議上推选了省人民委員会付省长徐寿軒任主任委員，宋振廷、靳云汗、于省吾、崔松亭等为付主任委員，并通过了組織条例和本年工作計划。

在会上委員們对省文物工作作了广泛的討論，提出了四点工作意見：1. 貫徹国务院"关于在农業生产建設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在全省范圍內作好文物普查工作，以掌握我省文物古迹分布情况，确定保护单位；2. 貫徹"重点保护、重点發掘"的方針，对省內重要古文化遺址、古建筑、古墓葬、碑碣不但要求作到登記管理，并要积極創造办法作好保护工作；3. 有計划的开展文物征集工作，特別要对伪滿皇宮遺物、抗日联軍的遺物和遺迹，应尽快征集，以免流散和毁坏；4. 大力开展宣傳工作，貫徹国家的保护文物政策法令，取得有关方面的重視，并教育广大群众热爱祖国的文化遺产，开展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徐汗煊）

陝西省

西安西郊發現唐代磚瓦窰址

1956年11月間，陝西省文管会在西安西郊任家口和二府庄的南边，發現了十余座唐代的磚瓦窯坑。窑坑大部分都被后来的水井、滲坑和墓葬所打破，經清理出較完整的有三座。

窯的排列有单独一个的，有两个并排的，也有三个相連成品字形的。窯的中間有一个坑，坑底与窯門底部平行，并有一斜坡小道通向坑底。窯的頂部距地面不到0.5米，已有部分遭到破坏。

窯的立面略似馬蹄形，其結构分窯門、火堂、烟孔和烟道。窯床高于火堂，底部平坦，窯床与烟道相隔一道墻，墻下有五个长方形烟孔，与烟道相通，窯墻周壁及底部呈硬灰色，外面有一層紅燒土，上面为自然土。

窯室內出土物有殘瓦片，表面平光，里边有布

紋，还有未經燒过的瓦坯殘片、長方形殘磚、表面印有一道繩紋等的遺物。这种形制的窯，1955年在东郊韓森寨某工地也曾發現过一两座，这一發現，对研究唐代的磚瓦業生产上提供了参考資料。

（唐金裕）

青海省　省文管会举办文物展覽

青海文物管理委員会配合省科普協会主办的科学普及展覽会，二月間举办了文物展覽。观众約一万多人次。

展出的文物，共計二百二十多件，有"从猿到人"模型；本省發現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陶器、石器和骨器；汉代的石碑、弩机、貨布，和海晏县發現的汉瓦；明清时代的瓷器、版本、盔甲；廢銅中拣出的关羽騎馬像等。此外，还展出了古生物化石和展出了追回的为帝国主义份子盜窃去的本省出土汉代陶灶、陶豆、陶碗、陶壺等文物。

展覽主要是向群众宣傳保护文物政策和普及文物知識，因此着重这两方面向观众进行了講解。

（赵生琛）

江苏省　省文化局召开全省文物单位負責同志会議

三月十一日，江苏省文化局召开了全省文物工作单位会議。出席的有四个省、市文物保管单位和三个博物館、院的負責同志。会議目的是研究各单位如何在工作上联系协調，明确分工，充分發揮潛力，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会上交流了各单位今年的工作計划，展开了討論与研究。大家認为要达到协作，必須思想認識一致，过去的工作上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由于过去在某些地方配合得不够，使文物工作的开展受到一些影响；同时也批判了过去妨碍协作的一些本位主义思想。会議并对省文物工作上的几个主要問題作出了如下的处理意見：(一)文物保护工作：到3月份止，有八个市已普查完畢。由于省內文物很多，今年內要提出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各文物机构具体分工，划分地区和本身的調查發掘工作結合可以事半功倍。

(二)清理發掘工作：秦淮、太湖流域及大港一带和治淮工程中的重要遺址、古墓的發掘，由南京博物院負責。苏州市与苏州专区，由省博物館与苏州市文管会清理發掘。松江专区，由省博物館和上海市的历史与建設博物館配合清理。南京市原則上由市文保会負責，其他单位支持。(三)文物征集工作：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文物，一般均应集中在紀念館为宜。其他館需要的，可由紀念館复制原件代替。

(四)文物保护宣傳工作：文物保护的宣傳，要依靠群众，發动群众共同来做。应利用一切机会，对国家干部和群众，普遍的展开宣傳教育，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最后，会議認为今后文物工作任务繁重，大家应本着精簡节約的精神，少用錢，多做事。同时要求通过各級政府、各界人士的合作支持，使文物得到保护和保存。（江苏省文化局　周　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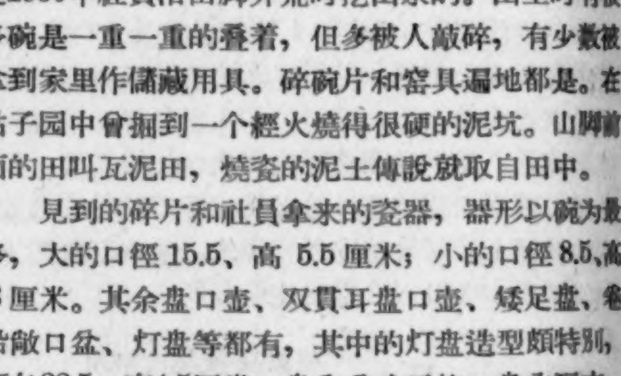
浙江省　肖山县石蓋村發現古窯址

1956年浙江肖山石蓋村發現一处古窯址。

窑址在永兴河之东村子西北面的黃家山支、桔子园、馬鞍山之陽，在沿山脚長約一百米、寬十米的地方都散乱着瓷片和窑具。据农業社周社長說窑址是1956年社員沿山脚开荒时挖出来的。出土时有很多碗是一重一重的叠着，但多被人敲碎，有少数被拿到家里作儲藏用具。碎碗片和窑具遍地都是。在桔子园中曾掘到一个經火燒得很硬的泥坑。山脚前面的田叫瓦泥田，燒瓷的泥土傳說就取自田中。

見到的碎片和社員拿来的瓷器，器形以碗为最多，大的口徑15.5、高5.5厘米；小的口徑8.5、高3厘米。其余盘口壺、双貫耳盘口壺、矮足盘、卷沿敞口盆、灯盘等都有，其中的灯盘造型頗特別，徑長22.5、高4.5厘米，盘內分成三格，盘內竖立一口小下大高6厘米的直管，管下部有四小孔和盘相通。

窑的瓷胎都呈灰白色，青釉多不到底，器物下部有一圈胎骨外露，器底微向內凹，并留有窑具的印痕。窑具多屬圓盆底凸足式。另外拾到如圓錢紋的带釉陶片及乁形紋、小方格紋的印紋陶片各一件。有一碗片，內壁划兰花，平底稍外凸，釉色淡青近乎白色，很像宋代的。由于未經發掘，这些碎



燈盘　口徑22.5、高4.5厘米

釉陶片殘长11.5厘米

片尚不能作該窑址所燒或时代上下限的依据，不过从石盖窑絕大多数的瓷器的釉色、器形和窑具都与上董窑一样，而且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来看，它們是在同一时期燒造瓷器的，也就是說都是晋代的越窑系統的窑址。

浙江是我国古代青瓷的主要产地，1956年就發現了窯址十几处，大的有肖山县进化区临江乡茅湾里等地印紋陶窑址，上虞县窑寺的吳越官窑窑址，其他金华、德清均有新的古窑址發現。这对研究祖国的陶瓷史，特别是印紋陶文化和青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些重要窑址和石盖窑一样，由于农民不懂它的重要性，因而遭到無意識的严重破坏。

现在又正当农民开荒和兴修水利的时期，我們呼吁各地文化、农業領导部門、各乡人委党支部貫徹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業生产建設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的精神，在农村結合当前中心任务开展保护文物的宣傳工作，并加强农業部門和文化部門的联系，使古代文物和遺迹不致再度遭到过去的無法弥补的損失。（沈树芳）

广东省

潮安县陈桥乡發現古文化遺址

1957年1月8日，潮安县第一中学学生黃家年、丘乐英、黃孝鎮、王侨生等在陈桥乡后人家村农民挖开的貝壳層里發現古遺址一处。出土遺物很丰富，有石器、陶器、骨器、人骨，及其他动物化石多种。出土物几乎全都出在农耕土下黑色粘土層和貝壳層里面。石器以磨制的为主，較多的有斧、锛、刀和礪石等。陶器大致可分夹砂灰陶和夹砂紅陶两类。

有較完整的小杯一个及盆、罐类的殘片。紋飾除划紋、印紋外，間有表面磨光的。骨器种类复杂，主要有刀、錐、針和叉等，此外，还有一些半成品，人骨很多，大都零碎不全，而且早已失去它們原有的位置。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股骨一支，上下顎骨各一塊。在顎骨上面还有門齿四个、犬齿二个、臼齿五个。

当他們發現这些遺物后，曾把情况报告潮安县文化館，并在现場进行照相，采集了标本。（摘自潮安一中报文物局簡报）

編者按：如上所述，这一遺址似很重要，潮安一中同志們在發現后，能够把見到的情况記录下来，向有关部門反映，这种重視祖国文物是值得表揚的。不过处理一个遺址，使它不至减少或失去应有的价值，并不是一件簡单的事情；因此，希望今后各地如遇有类似情况發生，最好先請当地行政部門通知农社暂时停止挖掘，保持遺址的现状，迅速报請本省文化局或文管会处理。

李誦剛先生将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故址捐献給国家

广东省广州衛生学校秘書李誦剛先生最近將一座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建筑捐献給国家。

李誦剛先生一向热爱祖国文物，当他从有关辛亥革命文献中知道他的祖居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黃花崗之役）时指揮部旧址时，便写信給市人民委員会要求把这幢房子献給国家。經市文化局和市文管会、市文史館研究鑒定，証实确为广州起义时故址后，由市文化局接受了这一捐献。这座房子座落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是三进深的旧式古老房屋，有大小厅房十余間，面积約有三十多市井。

现在文化局計划把这一革命旧址辟作“三、二九”紀念館，并进行复原工程，准备在館內布置陈列。

市文化局为了表揚李誦剛先生重視保护文物、化私为公的精神，已报請中央文化部及市人民委員会給予奖励。（笛）

广东省第一期文物干部訓練班开学

广东省文化局举办的省第一期文物干部訓練班已于三月八日开学。学員为来自汕头、惠陽、佛山、湛江、韶关五个专区县市的文化干部35人。訓練班要求学員在短期学習后初步掌握田野考古的一般知識、方法和步驟，并能运用这些知識去从事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工作。課程由省文化局苏怡付局长及中山大学商承祚、容庚等教授和省、市文管会、市博物館、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同志担任講授，訓練班将在五月中結業。（莫稚）

讀者·作者·編者

要采取积極措施，消灭破坏文物事件

（一）

本年1期"文参"中所發表的武当山和龙泉县破坏文物的严重事件、西岔沟古墓群被掘、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遺址被破坏、赵鳳山"讀文物参考資料所感"一文所反映"土城子"遺址破被坏及文物消息內"四川温江专区地下文物普查小組归来"一則中所說：有些乡的农業生产合作社，用各种方式組織和發动社員挖古墓取磚料等等，这一連串的坏消息，使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些事情的造成，并不是出于一般群众，而是由于县行政領导机构中的秘書、科长和乡村干部的發动和带头，这就可見目前机关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文物法令是漠視的，有些主管文物部門和工作人員，对文物保护工作也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風，沒有以严肃認眞的态度对待目前的工作。虽然国务院、中央文化部及时發出了保护文物的通知，并要省的有关部門采取有效的措施；但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农民的鋤头行动得快，而我們的措施不仅迟緩，甚至对当前的严重情况竟拿不出具体办法。即使做了一些布置，也限于单干。

对于目前如許严重的問題，我以为不能讓它长此下去，要积極設法消灭破坏文物事件。我認为：我国的古代物質文化遺存，几乎普遍地埋藏在广大地面下，在工、农業建設中随时随地都有遇到的可能，所以只有把这一工作發动到成为群众性的工作时，問題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省、县到乡成了有机的領导体系，使每一农業合作社或建設工程中，成立了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組織，对应該保护的坚决保护，对發現的情况迅速匯报，有历史意义及科学价値的由省派专門人員清理發掘。同时，应联合工、农業的所有領导部門，共同貫徹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爭取地方报刊多登文物消息，發表社論，号召大家重視。关于这一点，过去做得非常不够，甚至沒有做过，今后必須加强注意宣傳保护文物工作，如果缺乏思想性和战斗性，是不会收到預期效果的。我希望全国文物工作的同志們，大家积極設法来消灭破坏文物事件。

四川省博物館　楊有潤

（二）

看了今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資料"报导的几处文物遭受严重破坏的事件以后，感到很痛心。因为已經造成的那些損失不只是無法弥补的，而且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破坏事件中竟有文化主管部門干部带头参加（如武当山銅造象破坏事件）和博物館負責干部的"直接負責"（如吉林"土城子"發掘事件）。这些事件难道可以由某些人拍拍胸膛說一句："一切責任由我来負"就算全事了么？

必須严肃处理这些文物破坏事件。同时更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破坏文物事件的繼續發生。

几年来，在防止珍貴文物出口，制止私人盜掘、盜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于一些公开的、似乎是"合法的"破坏，却沒有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虽然早在1950年前政务院就頒布了許多保护文物的法令，从一些事实看，对这些法令的宣傳很明显地还远不够普遍和深入，执行的也不够認眞和全面。

目前各地已先后公布了文物"保护名单"。無疑的，这是文物保护工作一个新的重大的步驟。但是为了做到如郑副部长所說的，使"人人都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那么，把什么是文物、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和怎样保护文物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講清楚，使他們眞正懂得并实际接受，編写一些生动活潑、通俗淺明、多附些圖片的小册子是很需要的。如果能适当地运用电影这一宣傳形式，收效那就更好。

在向广大群众宣傳保护文物的同时，从文物工作者本身認眞貫徹执行文物政策法令是非常必要的，遺憾的是关于这一点过去注意的似乎不够。赵鳳山同志揭發的事实就說明了这一点，可能他說的也并不是絕無仅有的例子。

文物工作者的粗枝大叶和責任心不强等作風，往往給文物带来等于破坏的損害。有些对考古發掘工作中片面地强調多和快，忽視質量的好。南京市北陰陽营遺址第一次發掘（1955年初）就比較粗糙。在我整理这些陶片时，發現甚至在灰坑出土的陶片包里，也混杂一些后期的陶瓷磚瓦等碎片；1956年3月我在發掘坑边的出土堆里还檢到一件大致完整的磨光石斧；特別是有一个墓葬只作了一半，另一半因在發掘坑外就被留下来了，說是为了"按时完成"工作計划。

提高文物工作者的技术水平和理論水平是迫切需要的。拿田野考古發掘来說，不同时代、地区、性質、情况的遺址和墓葬，在不同要求和条件下，可以灵活地采用不同的發掘方法。但是方法尽管不同，总不能离开科学依据，总应該有明确目的。如古遺址發掘，一般說采用全面揭露比采用探沟式發掘要好得多。全面揭露（或大面积揭露）要划分方格网，按方、按層發掘。但是单单划分方格网，决不能算是全面揭露，也决不能达到全面揭露的目的。有些遺址的發掘（如1954年11月至1955年上半年的郑州二里崗遺址的發掘）把發掘地点划成10×10平方米为一单位的方格网以后，就先从第一个方逐層下掘至生土，再开始掘另一个方；而不是从几个方同时按層揭露作全面考察。这实質上是探沟的面积扩大和形状改变（由长变方）。根据这样大面积方坑的四壁記录下来的剖面圖，对于遺址的文化層堆积情况自然很难作比較确切的反映。这样，除了遺物以外，建筑和其它遺迹的分布情况、相互关系就不容易考察到了。这給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带来了困难。划分这样大面积的方格和上述的發掘程序，据我看来，既找不到理論根据，也沒有实际需要。因此采用不正

掘的方法，对考古工作說，不能不有所損坏。

为了使我国文物工作健全起来，我們要赶快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强文物工作的监督管理。

吴　震

（三）

我国的文物工作，自从解放以来取得很大成績，这是不可否認的事实。就拿出土的文物来說，六年發現了重要的二十多万件。博物館由解放前的几所增加到五十余所。所有这些，都說明了文物工作在党与政府的深切关怀下，逐漸發展壮大起来，这不能不使我們欢欣鼓舞。遺憾的是，就在大力提倡"宝爱民族遺产，保护文化古物"的号召下，破坏珍貴文物的事件仍不断地發生着，怎能不令人痛心与憤慨！这种破坏行为如不馬上糾正，我国幅員虽大，历史虽久，文物宝藏虽丰富，恐怕也会很快地摧殘殆尽。我們試看今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資料"所反映的破坏文物事件就知道情况的严重。在这些破坏事件中，有两起是县領导干部發动的，如龙泉县与武当山。西丰县破坏古墓从表面看是农民搞副業挖坏的，实际就是由于領导的官僚主义，在思想上根本沒有重視文物保护工作所造成。这能不算我国文物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問这些文物破坏事件的責任，到底应該由誰来負？除直接破坏者外，似乎省文化局与县人民委員会亦不得辞其咎。因此我提出几点初步意見，也許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些好处。

1. 加强省文化局的領导作用，它必須經常的向县一級貫徹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使县級把这些政策法令下达到乡一級去。只作一般号召沒有具体的指示是不妥当的，并且要經常檢查。

2. 宣傳教育的方式要徹底改革过去的片面性，要糾正某些有关文物工作干部的思想作風，多印些文物通俗性小冊子或刊物，利用报紙与广播机关大力宣傳文物政策。在农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各乡村多設立了收听站，我認为这是个很好的宣傳机会。

3. 發动积極分子，組織社会力量，組成一个强大的文物保护通訊网。这个通訊网应以省文化局为中心，組織省內各中、小学校的教师为通訊員。这批文化大軍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估計的。

4. 建立奖懲制度并严格执行。如武当山、龙泉事件，直到現在似乎还沒有看到司法机关作的适当处分。为了教育全国干部、全国人民，这种破坏事件，是应該严肅公开处理的。

黑龙江省肇东县师范学校　王修治

（四）

讀了本年第一期报导武当山銅造像、龙泉古塔、西岔沟古墓群等發生严重破坏事件，令我非常憤激。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之一，照我个人意見，因为一般群众，認为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如寺庙古建筑、綫装書本、神佛造像、墓葬碑刻，都含有封建迷信毒素，应該摧毁，故此解放后不断發生破坏文物事件。

旧社会是有許多坏处的，尤其是反动統治者的貪污、殘暴、剝削、压迫应該徹底打倒。但是屬于先代劳动人民創造的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东西，則未必都是不好，要是沒有选擇地一律消灭，那就大錯。今后最好由有关部門，就这个問題在全国报紙上公开發表談話，主要就旧社会所留存的东西加以分析，說明那种是好，那种是坏。文物这个名詞太抽象，群众覺得陌生，应該具体的指出它的种类和名称，举实物来說明，方能使得人人知道和理解，才会收到效果。

胡吉甫

兰亭八柱有下落

我看到本年度一月号"文物参考資料"上面楊宗榮同志写的"兰亭八柱帖"一文，其中有一段話說："至于原刻八石柱，并未發現，或在圓明园被焚毁时早被破坏了！"这是不确实的。兰亭八柱現在北京中山公园社左門內，并未焚毁。在一个夏天，我曾見到这几根方柱倒臥在社左門內，外面用鉄蒺藜攔着，我曾把头鑽到鉄絲網里辨認石上的刻字，确实是"禊帖"無疑，因为我記得我看到的是"張奎界奴上进本"（絹本現在故宮）。我最近为了想証实此事，特意再去看看，是否以前看錯。但見社左門已被改为儲物室，里面放了很多灰包挑筐之类，这石柱可能还压在底下。我想假如花錢不太多，建議市人民委員会可以把它們再树立起来，免得年久剝蝕了。因为定武一片石早巳不在人間，这八柱应該是現存惟一的兰亭的精刻了。

端木蕻良

接到端木蕻良同志来信后，我們請原作者楊宗榮同志到中山公园了解。兰亭八柱确在社左門內，長約二丈，方形，每面寬約尺余，平放在地面，因上面滿堆洋灰木材，無法看到刻的文字。据該园管理处刘同志談："这确是兰亭八柱，但不是与石屛一齐运来的。石屛早在 1917 年即运至园中，而八柱則在敌伪占領时期才运来的。当时曾計划在园內唐花塢前复原，后因故作罢"。据說有两柱已損折，另外还附有八个石础。刘同志还說园里有拓片，等有暇时当檢出看看。我們已把这个情况通知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請加以保护。

編　者

·編·者·的·話·

在本刊接到的来稿中，有些因字数过多，限于篇幅，經常無法及时發表而积压住。过去接到的一部分长文，可用的我們正設法逐步整理刊出。

因为今年紙張供应困难，本刊頁数不能增加，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們希望能多提供一些資料，能使同志們有机会多發表意見，目前唯一的就是要求作者把文章写得簡短些。对于今后来稿字数我們暫不作硬性規定，但三千字左右、而又能充分說明問題的文章，讀者是比較欢迎的，这情况提供作者参考。

另外，今后除附有圖片的来稿，本刊不用时負責轉往其他刊物或退还外，一般的两千字以內的来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新書預告

博物館学基础

博物館学基础是博物館学中的一部經典性的著作，內容共分六章：包括博物館及其特点；博物館的搜集工作；博物館藏品的登記、鑒定和科学記述；博物館藏品的保管；博物館的陈列工作；博物館的群众工作。

全書共約三十万字，并附有插圖、圖版，是研究博物館学及博物館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讀物。

苏联博物館科学研究所主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博物館藏品科学編目法

本書扼要地說明了博物館藏品研究和科学編目的任务，各种藏品的科学編目方法与編目工作的組織，并且列举了各种文物科学編目卡片格式和編目的实例。这是一本博物館工作者的必备参考書。

苏联A・M・拉艺克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万里长城——居庸关　八达岭

这是一本介紹我国古代偉大建筑长城的导游性小册子，用五十开本道林紙印，內有彩色及单色圖版二十余幅。書內对古代长城的重要关口——居庸关和八达岭做了詳細的介紹，是游覽的指南。

罗哲文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文物参考資料

（月刊）

第四期（总80号）

1957年4月27日

編輯者　文物参考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四头条4号
電話4局1440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东四头条4号

总發行处　邮电局北京邮局

預訂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售处　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1.50元
半年六期	3.00元
全年十二期	6.00元

平邮在内　挂号費另加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彩色插頁文物出版社附屬銅版印刷厂制版印刷

本刊第三期出版3月27日

印数：1—8,500